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为什么说不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第一章 对中国实行新冷战？

1. 中国人来了

今天，大部分有识之士在不同程度上都强烈感受到了如下趋势：亚洲太平洋时代正在降临。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的焦点已开始聚向亚太地区。同时，当今世界正在被一个事实所震撼：沉睡了一百五十年的东方巨龙——中国——已经苏醒！

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促使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且又广泛的变化。中国迅速崛起的经济地位、庞大的人口规模、所处的战略地位、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使中国的未来走向对冷战后时期的世界和与秩序、东西方文化关系、南北经济秩序、美国的经济利益、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关系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设计的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先导的中国经济改革，首先切中了贫穷中国的要害和根本，成功地改变了计划经济的支柱——人民公社，建立了以农户家庭为经营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使了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尤其是成功地吸纳了一亿两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但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贡献了将近一半的全国生产总值。农村经济改革的初步成功激励了中国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促进了社会资源和劳动力的流动，推动了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非国有企业产值几年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同时，城市国有企业部门不断加大改革力度，试行了租赁制、拍卖制、破产制、股份制，推动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化。股份制改革迅速进展，到1994年为止，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已达两万六千家左右，其中工业企业占百分之四十八，商业企业占百分之三十一；同时，全国城镇股份合作制企业累计达到十三万多家，农村乡镇企业也广泛推行了股份制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终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70年代末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促使中国经济初步融入了世界市场，尤其是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和设备的重要窗口。而且，中国低廉的劳工成本，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政策与局势的相对稳定，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中国。自1979年至1995年间，中国累计利用外资总额达2500亿美元，包括1200亿美元外国贷款和1300亿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帮助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1994年中美贸易总额已达五百亿美元左右，中国玩具、鞋类、服装及电器开始占领美国市场。根据美方计算，美国对中国的存在争议的贸易逆差额在美国对各国贸易逆差额中居第二位。中国市场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开始对世界市场供求产生影响，中美贸易成为影响美国旗业界、消费者利益及民众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政策相结合，共同成功地带动了中国的经济从国有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非国有经济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价格体制改革之后市场价格体系基本形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评价格已经放开；大

多数商品的供求已由市场来决定；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已经出现。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中国政府开始承认经济活动多元化、非垄断化、经济决策分散化的必要以及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很显然，计划控制手段向宏观调控手段的改变、经济的初步自由化、非国有经济的扩张、要素市场的出现，都标志着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

十八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使中国经济出现了跳跃式成长，国民生产总值以百分之九点五左右的年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居同时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速度之首，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准有了很大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五百美元，12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中国可望跨入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世纪。

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首先，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青年一代在择业时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倾向于实现自我的现实主义。在“致富光荣”的口号下，越来越多的人在运用自己的特长想方设法赚钱。另外，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开辟了中国社会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为封闭多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80年代以来，二十余万中国学子留学海外，学习西方现代文明和科技，再反馈回国内，深深地影响着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改革过程中，港台同胞与侨胞的投资、探亲 and 旅游活动亦成为一股推动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巨大动力。过去十几年里，中国旗请的大量外国专家学者不仅带来了技术和知识，而且也扩大了民间交流。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近年来中国的立法与司法也有相当大的进步。面对外资大量进入，私人经济活动全面铺开，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与公营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人口大规模流动、经济犯罪、企业破产、证券金融业快速发展、知识产权纠纷等），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律成为调节经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法制建设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今天的中国，经济走向自由化、市场化，社会日益多元化。可以预见，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及人的现代化将一定能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今年初，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又一本“大趋势”——《亚洲大趋势》出版。人们立即发现，其中一个重点正是“亚洲大趋势中的中国”或者是“中国大趋势中的亚洲”。作者预言，世界轴心将由西向东，亚洲必将成为全球经济中心。在这个亚洲重心中，龙头是中国。

中国人来了用多久的时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2. 美国人说不

正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建构新体制、不断与“国际惯例”接轨之际，正当中国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以更加坚定的信心争取实现几代中国人共同追求的理想——民主富强的中国之时，一种刺耳的声音从美国的舆论界传出：美国要带头“遏制中国”。

1990年前后，苏联和东欧的政权体系相继解体，二战后形成的整个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同时又感觉到自己也在衰落。宿敌的瓦解促使美国着手寻找其冷战后时代的新的国际战略，包括重新考虑其对日关系，对欧关系，对俄关系，对东亚的关系和对第三世界的关系。纵观美国政府近几年的对华政策和美国舆

论，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中国的不断进步和现代化，美国才企图围堵中国。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曲折跌宕，大体可以概括为三大时期。1949年至1970年是全面对抗时期，美国在麦卡锡主义影响下把新中国和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不仅拒绝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断绝了一切经贸往来，对中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而且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边境。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中美关系由解冻到建交到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发展基本是顺利的。自1989年起，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时期。两国关系时好时坏，摩擦多于合作。对美国战略界来说，前苏联的阴影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使他们深感不安。1990年前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就开始对中国的国力作出重新评判，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成长为世界的第二位或者第三位，从那时就有舆论开始谈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90年代以来，美国的战略界对中国的考虑日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实际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强大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的日益突出。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这个现实非常敏感。在他们看来中国也是一个天然的世界大国，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大国，她更真实的表现为一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大国，越来越像是一个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综合性大国。所以在西方战略家看来，中国越来越真实，已不是原来他们所想象中的贫穷落后的中国。西方的决策层在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现在越来越着眼于中国实际的地缘政治影响。在他们看来，这种影响不仅仅改变中国的特性、刺激中国扩张的冲动，同时也在改变亚太地区原有的有利于西方的均势格局。美国现在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即世界经济和世界发展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亚太地区被认为是一个对21世纪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区。所以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角度来讲，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参与和渗透能力，发挥它一定的影响，进而掌握和控制这一地区的走向，作为角逐21世纪的战略砝码无疑是头等重要的。所以它必然会注意到在这一地区总体背景上中国的角色。

第二个方面，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问题仍然是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很多学者和战略家认定中国是在专制的意识形态之下，一个专制的、共产主义的、且不断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大国的中国，在亚太世纪的总体背景下的复兴，让他们感到恐惧和不踏实。

美国对华政策渐带“遏制”色彩基于以上两点考虑，美国90年代以来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倒退性的转折。中国已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外交关系顾问们认为是美国的潜在敌人。因此，遏制中国以及极力破坏污毁中国的国际形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特征。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正是在此问题上，美国政府极不尊重12亿中国人民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紧锣密鼓地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以达到其牵制中国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1982年中美发表了八一起公报，美国承诺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经过一段时间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在1992年之前，美国基本上遵守了它的承诺，台湾海峡也维持了10年的稳定。然而就在这一年，先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台湾出租军舰，接着美国政府又决定向台湾出售15

0架 E—16 战斗机。这是冷战后美国调整对台政策的开始，自此台湾海峡的和气稳定便日益成了问题。

1992年12月美国贸易代表希尔斯访台，打破了14年来不准内阁官员访台的禁令；1994年9月美国政府允许台湾在美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升格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悍然宣布允许李登辉到美国进行所谓"私人访问"。

美国的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鼓励了台湾当局对内允许分裂活动合法化，对外采取双重承认的政策，为台独创造条件。随着台独势力的扩大，台湾海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了。

同时美国在外交上支持台湾的"扩大国际空间"政策，帮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至少在客观上鼓励了台湾当局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活动。1994年美国宣布"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并寻求在一些国际组织中能够听到台湾声音的机会。"为帮助台湾重返国际舞台，美国还支持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美国的这种外交支持鼓励了台湾当局的所谓的"务实外交"、实际上的"银弹外交"活动。

除此之外，美国1992年以来不断扩大对台军售，包括舰用火炮系统、反潜装备、巡航导弹防御装备、反导弹防御系统、战斗机、战斗机电子设备、预警飞机、攻击直升机、坦克等武器，总价值75亿美元。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军事支持助长了台独的野心，使他们低估台湾一旦独立导致海峡军事危机的可能性。台湾当局也狐假虎威，近几年来多次宣布："台湾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台湾安全"。

美国支持并鼓励台独连美国的新闻记者也直言不讳。美国《时代》周刊上曾有一篇报道这样写到："无论是出于蓄意与否，美国已经鼓励了这样的（指台独）想法，比如去年允许李登辉踏上美国国土，今年初向台湾海峡派遣一支海军，以及允许对台湾的支持成为一个国内政治问题等等"。美国防部部长佩里（William Perry）在决定派遣两艘航空母舰群驶往台湾海峡时威胁说："（中国人）应当知道，虽然他们是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在西太平洋地区第一位的军事力量是美国。"美国依仗着它的"世界上最好的海军"（佩里语）扬言要全世界"都要记住这一点"。美国的狂妄和傲慢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美国要调整对台政策，挑起台海危机？其关键在于台湾海峡适度危机符合美国冷战后的国家利益。这一地区出现紧张局势可以拖延中国统一进程，减缓中国崛起速度，有助于美国保持并加强它在东亚和西太平洋上的军事存在，并企图达到以台湾来牵制中国的目的。

美国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其根本原因是它害怕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这个冷战时代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必然衰落。这对美国的反华势力来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确保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防止世界上出现对美国霸权地位可能形成重大威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是美国在冷战后时代的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之一。尽管越来越力不从心，美国政府仍然不肯从"世界警察"的交椅上下来。近年来克林顿政府在其许多重要文件特别是每年都要发表的国情咨文、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报告中都反复强调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美国不愿见到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免直接威胁到它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出于对中国的极大误解和偏见，美国尤迫害怕经济上发达起来以后的中国会走上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依靠强大的经济力

量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扩张。但是对中国来说，她要解决近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吃穿住行以及其它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其经济腾飞已刻不容缓，其现代化进程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类最伟大的一项试验，也是一项浩大而持久的工程。中国要崛起，亿万中国人的福祉系之；美国要遏制，事关维护它已经习惯的霸权地位。这将是一场以多种形式展开的、由美国发起的而中国被迫接受的国际较量。

在这场国际较量中，台湾是无法置身事外的。它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它必然是一颗棋子，但又是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基本上，台湾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回归中国，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参与抵御西方的遏制和气压；要么依靠西方，尤其是美国，作为反华阵营的尖兵。应当指出，台独和国际背景的联系不仅仅是间接的。台独思潮从出笼到泛滥一直都是得到了西方和日本反华势力的直接鼓励和支持的。二百年前的拿破仑曾告诫西方列强让中国这头狮子沉睡吧。现在这头狮子醒来了。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西方世界忧心忡忡，于是有了所谓的中国问题。他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肢解中国，让中国四分五裂。这是西方搞垮前苏联的重要策略之一，现在他们希望故伎重演，而台湾分离的局面正好给了西方以可乘之机。如果西方对此不加以利用，一旦台湾统一于中国，那么中国就会更加如虎添翼，就会更快地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在西方看来这是威胁它们的既得利益。有鉴于此，西方对台独势力给予各种各样的鼓励和支持。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培植出了李登辉这种政客，千方百计地满足国际反华势力的期望。他之所以有恃无恐，恰是因为他明白他背后有着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他所不能完全把握者只不过是西方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支持台独罢了。

因此，今天的台海危机决不仅仅是历史上国共之争的延续，也决不像有些人希望我们所相信的，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对抗。从根本上讲，它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反抗列强压迫和遏制、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新篇章。

美国舆论："遏制"中国如果说近几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有"遏制"的色彩，那么美国的舆论界和战略界则公开宣扬"围堵中国"。美国舆论越来越把中国当成一个对美国最具潜在威胁性的敌手，中国与美国之间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的对立都在被突出。只要看一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时代》周刊等美国主要报刊，便可以发现，特别是最近一两年以来，以相当的敌意来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军备问题等的文章大大增加。《纽约时报》上曾有一篇专栏文章认为中国是继纳粹德国、苏联、伊拉克等之后的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五个敌人，美国要像对待前四个敌国一样以军事的和综合的手段把中国打败。《时代》周刊上刊登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的那篇题为"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的文章彻底反映了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心声。该文把中国比为"19世纪晚期的德国"，一心追求权势。同时不惜编造事实制造"中国威胁论"。该文还提出了一个遏制中国战略的具体内容：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延长美日联盟等等。最后文章提出"现在是施加压力并保持压力的时候了"。这种露骨的、敌意强烈的文章既误导了美国公众也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公愤，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起消极的影响。1996年3月4日的一篇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LY)以中国为封面故事，内文则以《不受约束的巨人》比

喻中国。

文章一方面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震撼着世界，还指出“人们往往容易夸大中国的经济威胁。其实，直至今日，中国虽有惊人的出口，但在重工业和尖端科技两大类，都仍未形成威胁。”另一方面又表示“对这样一个庞大的、不受约束的、不按固定规则行事的经济巨人，在世界贸易中可能会带来的冲击，使得西方分析家们大为震动。”同时在学术研究上美国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在各种场合向他们的读者与听众们描述所谓的来自“中国的威胁”。1996年4月，设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外交研究所的亚洲部主任在一所美国大学做了一个有关中美关系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对美国的世界第一地位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按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中国将会在201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没有一个已经处于世界第一位的国家会甘心情愿地眼见自己世界第一的位置被别人取代。所以，报告认为美国不能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视而不见，必须采取行动，包括支持台湾的独立，从而达到牵制和削弱中国的目的。

这种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在美国大学讲坛上也颇有市场。美国中西部一座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曾做过一个题为“在21世纪美国是否仍能保持世界第一”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冷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都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如果美国要在21世纪仍然保持和发展这些优势，它必须尽早认清并战胜“四大挑战”。该教授认为这“四大挑战”将考验美国能否继续保持它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包括三个外部挑战和一个内部挑战。三个外部的挑战分别来自欧共体、日本和中国，一个内部挑战来自“美国国内的腐败势力”。来自欧共体的挑战主要是经济上的，但不是不可调和的威胁，因为欧共体和美国有着“相似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自日本的挑战也主要是经济上的，因为日本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和市场，只要美国施压，日本一般都会让步。该教授认为唯有来自“中国的挑战”是最严重的，因为中国和美国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十分巨大。

更广泛地说，像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这样大的结构性理论的提出，也给“围堵中国”的舆论提供了学术上的背景、刺激和支持。亨廷顿是哈佛大学教授，1993年夏他发表了一篇引起世界反响的论文，题目叫《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在该文中，亨氏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当今世界中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巨大的分歧以及冲突的决定性原因将是文化的。虽然民族国家仍将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冲突将出现在不同文明的国家以及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支配世界政治”。作为美国的一名战略家，亨氏把这种文明之间冲突的主要表现概括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就是“正处于权力顶峰的西方与具有日益增强的愿望、决心和实力的非西方对抗”。

亨氏对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也直言不讳。他说，“在联合国安理会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所做的反映西方利益的决定被当作反映国际社会的利益来提交给世界。西方常用的“国际社会”（the world community）这个词本身也已变成了一个婉语性的集体名词，为实际上反映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行动提供国际合法性。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气

它一些国际经济组织，西方一方面促进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时将西方认为对自己合适的经济政策强加到其它国家身上。实际上，西方正在通过利用国际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经济资源，通过保持西方的支配权、保护西方利益和促进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观念等方法来掌握世界。

亨氏还为西方提出了一些可供近期和长期采用的具体手段来确保西方的优势地位。他认为西方在其内部应加强合作和团结；将那些与西方文化相近的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纳入西方范围；促进并保持与俄国和日本的合作关系；防止文明之间的局部冲突上升成为文明之间的战争；限制儒家文化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减缓西方军事力量的削减并保持西方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军事优势；利用儒家文化国家以及伊斯兰国家内部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等等。总之，亨氏认为非西方的现代文明在实力上正在日益接近西方文明，但是因为二者在价值观念和利益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所以要求西方在与非西方的关系中要保持必需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保持其利益。

姑且不谈亨廷顿用“文明冲突论”来概括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冲突的性质是否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该观点在西方战略界颇有影响，特别是用西方和非西方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待国际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认同。他们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和最大的敌人，就是现在非西方世界的反西方的思潮和行动的复合体。

对美国传媒上近一两年来有关中国的剖析，一位华人评论家这样写道：“此中既有对可能失落的忧虑，也有故意制造的中伤，发出无可奈何花将落的哀叹，更有你这贫穷落后的国家怎么竟成了强劲的对手的酸意。自然也少不了岂可让你跑到前头的霸气”。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观点近期，在克林顿政府对华举止失度以及美国媒体的一片“遏制”之声中，中美关系成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探讨的热门。

1996年2月初，美国贝克研究所在休斯顿举办了题为《中国、美国和亚洲：美国政商界面临的挑战》的讨论会。美国前总统布什、前国务卿贝克、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洛德，以及密执安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里伯索尔等相继发表意见。

3月29日，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华盛顿共同召集研讨会，就中美关系和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参加讨论的有美国政策官员、国会议员和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助理国务卿洛德、众议员佩洛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外交学院院长哈里·哈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康纳布里等知名人士。

4月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首都华盛顿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分析今后中美关系。哈里·哈丁、前中央情报局长威廉·科尔比、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纳德蒙·塔帕托等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在短短两个月内举办的这些重要级研讨会说明，美国朝野深感正确处理中美关系已是迫在眉睫。大部分专家认为中美关系已到了危机的边缘，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和足够的重视。今年4月11日发表的由外交关系委员会组织一百多名专家研究撰写的题为《恢复平衡：美国与亚洲的接触》的报告中指出：美国没有能够认真地处理与冷战结束后的亚洲的关系。“美国在这一地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适应中国日益兴起的大国地位。”报告建议美中首脑每年举行一次会晤，并提出美国政府和国会台湾问题上应异口同声，态度一致，

"绝不能让受雇于人的游说集团来决定美国的政策。"今年4月2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文章。

文章指出,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美国如果想遏制中国,这将超出美国的能力,耗尽美国的财富、无论美国如何对待中国,都无法阻止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国不应该轻率地处理美中关系。

基辛格还指出美中关系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六届总统出于维护美国利益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美国将敌视中国定为长期国策,大部分亚洲国家将认为美国是无事生非,应当为挑起对中国的冷战负责。

在这些讨论会上,不少专家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美国不应插手,不要企图在台海危机中捞好处。中国问题专家塞力革·哈里森认为台湾问题是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不应插手。只要有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就难以解决。美国坚持所谓的"不岂不倚"的政策,实际上是完全站在台湾一方。1994年,美国允许政府部长访台,给台湾一种暗示:美国欢迎台湾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地位。1995年,允许李登辉访美,对康奈尔大学进行了一次充满政治动机的访问。1996年,美国又派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附近游弋。这一切不但破坏美中关系,而且加剧了台海危机。他认为,美国应立即停止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主动向中国重申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决心,并且表明在一定时间内停止对台出售武器。

不少专家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模糊、混乱和错误叠现,是造成美中关系紧张和陷于危机的主要原因。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认为克林顿在对华政策上再三失策:一是先把贸易最惠国待遇同人权联系在一起,后又脱钩;二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几乎没有进行过高层接触或对话,缺乏高层交往;三是1994年对台湾政策的修订,本末倒置,不得要领。他强调,"中国人看美国的台湾政策不过是要看美国到底是支持台湾独立还是中国统一,或是有其它什么目的。"哈里·哈丁还要求克林顿政府停止这种模糊的对华政策。

多数专家认为美国应该用长远眼光来看待美中关系,奈斯比特在他的《亚洲大趋势》中作为一个美国人也忠告说:"如果美国对待亚洲目光短浅,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尽管如此,也有一些人仍然为偏见所囿,比如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就是极力鼓吹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偏袒台湾的一个代表。另外,我们仍应该看到,尽管某些专家能够做较实际的判断,提出较可行意见,但他们所维护的依然是美国的利益。

3. 一个根本问题

对美国而言制定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将牵涉到一个根本问题的估计,即一个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是好事还是坏事,是祸还是福?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应该修正其错误的心态,不应该把中国大陆力量的兴平视为对美国必然的威胁,并且批评中国"老是占美国的便宜"。应该指出的是,这几年中美之间出现大大小小的风波,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除了一些现实利益的冲突外,美国舆论界和美国国会某些议员对中国的误解至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要真正了解一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体系,不同价值观念的异国,是极不容易的事情,发生误解本是难免的。中国是中国,美国是美国,两国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问题是设法缩小鸿沟,还是刻意用品见和无知来扩大差异?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到底是不是美国的必然威胁呢?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中

国强大后必然走上一条对外扩张的道路，其实这完全是对中国的误解。姑且不谈中国的军事开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仅从历史上看中国也从来不是一个侵略性的国家，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唐时期也是如此。任何尊重事实的美国人都可以看到，中国的近代史以至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只有被侵略、反侵略，而无任何对外侵略和扩张。美国的权威汉学家费正清早就强调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外向型、扩张型的民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秦代开始一直到清代之前，历代王朝基本上都修建或重修长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防御工程，这一史实说明了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

到了清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这一百年中，中国更是倍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的欺凌。在过去从1949年开始的四十年中，中国并没有因为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增加它的对外扩张性。到80年代，中国更是强调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去作别人的领袖，不去干涉世界上更多的事情。而且，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中国政府认为解决中美之间所存在的一些分歧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双方进行平等的、友好的、坦诚的对话和合作，按照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

至于中国发展之后会不会成为一个扩张型的国家，在此我们不防摘录一段1960年5月毛泽东主席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Marshall Montgomery)时的一段谈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蒙哥马利：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五十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毛泽东：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蒙哥马利：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

毛泽东：你怕我们会侵略。

蒙哥马利：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

毛泽东：对，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毛泽东：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

蒙哥马利：我同意。

毛泽东：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

蒙哥马利：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泽东：那不一定。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美国那些鼓吹“遏制”中国的谋士们，美国那些叫嚷着要“保卫”台湾的议员们，中国是威胁，还是被威胁，不已经是很清楚了吗？

4．理性的民族主义

如上所述，美国近年来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色彩，美国的舆论界和战略界大谈“围堵中国”也成为一热门话题。近二、三年中

美关系的确如行蜀道，诡异多变。

但是有一点必须认清，那就是，还不能肯定说在政策上美国政府已经形成了围堵中国的政策。一个原因是克林顿政府在外交上比较缺乏明确的战略，外交被认为是他的弱项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蓬勃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对于美国资本有诱惑力，要放弃在经济上打入中国大市场的机会转而实行"遏制"政策，会遭到经济界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用完全遏制战略来对付中国，恐怕极难做到，作为一个大市场，中国在经济上对于正在衰退的西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如果实行完全的遏制，就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要自动放弃中国这块市场，这种战略恐怕会遭到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经济界的反对，实际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正处于举岂不定的阶段。一部分人主张接触，一部分人主张遏制。克林顿政府曾多次被批评缺乏长期的有远见的对华政策。据此可以认为美国政府仍然有待于制定出一个长远的适合 21 世纪的对华政策。

美国政府一直否认它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而是"积极的接触"政策。但是美国的舆论界和战略界确实在大谈"围堵"中国，我们对此矛盾到底应该怎样看？几个月前《瞭望》周刊上有一篇评论文章，题为《我们如何认识和面对世界》。该文认为"接触和遏制，表面看来是对立的，实质上是一致的，接触这个词，美国人的概念是参与进去，使其按自己的意图发展。弄明白这点很重要，就不会一听到接触就通体舒泰，而一听到遏制就火冒三丈了"。这种观点可谓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无论是"接触"还是"遏制"，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用中文来诠释"接触"就是美国继续对中国搞和气演变，妄图"引导"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遏制"就是直接对抗、牵制、限制中国的发展，以达到"逼垮中国"的目的。"接触"和"遏制"都是为了改变中国，减少西方心目中的所谓的"中国的威胁"。

尽管如此，由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复杂性要求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要采取谨慎理性的态度。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两个大国，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不仅仅影响两个国家而是影响整个世界。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中美之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传统、价值体系以及一些现实的利益冲突，中美关系出现摩擦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

近年来，由于美国奉行带有遏制性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舆论界对"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的鼓吹，尤其是阻止中国申办 2000 年奥运会，制造"银河号"事件，肆无忌惮地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利用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以及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中国玩"危险游戏"，引起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1996 年 6 月，一本题为《中国可以说不》的强烈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书在一些大城市成为畅销书，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感到美国对中国的不良态度。在上述问题上美国的短视和错误做法，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主权情绪。尽管有些人的言辞似乎过份情绪化，也许并不代表主流意见，但是它毕竟反映了中国民间的某种自发的厌美情绪。可以断言，若是美国一味地对中国推行"遏制"政策，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会向美国说"不"。

当今的中国青年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开放也是最稳定的时代，风雨沧桑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现代化之路。中国能否成为 21 世纪的强国有赖于当今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青年一代更应该承担起这个历史重

任。应该看到，中国目前在经济、技术上与西方的差距仍然很大。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今天我们仍然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只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制夷”，而是与西方和气共处，平起平坐。我们只有坚持理性而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通过对西方的接触和学习，才能以低成本加速中国富强的步伐。这要求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对华政策，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还是很必要的，在认识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上我们要力争避免出现盲目排外情绪。

近几年来，由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再三失策以及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加深，许多在80年代强烈追求美国文化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到了90年代产生了较强的非美情绪。1995年8月在中国进行的一场题为“中国青年看世界”的大型调查结果表明，有87.1%的受访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实际上这种情形在其它非西方国家也很普遍。早在1993年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就写道：在过去，非西方的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大多是受西方影响最深，在西方名牌大学受过教育并且吸收西方价值观念的人，而那些社会中的一般民众通常植根于本土文化而不为之变。然而今天这种关系正在反变。精英分子反西化（*dewesternization*）和本土化（*indigenization*）现象正在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中出现，而同时在那些国家的民众中西方（通常是美国）文化、生活方式和习惯却变得越来越流行。

本书将着重分析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区，揭示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非美情绪的原因。或者说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说“不”？尽管自今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后，中美关系有确实改善的趋势，我们希望美国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以诚意和努力避免出现更多的误区，从而制定出一个有长远意义的战略性对华政策。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章 经济：对抗还是互利？

1. 新丝绸之路

美国同中国最终的关系是在贸易领域。同美国人一样，中国人也已把发展商业视为实现社会进步和追求其它文明的途径。

今天，正在修筑一条越过太平洋的新的丝绸之路。同马可·波罗时代的那条通商道路一样，这条新的丝绸之路也可能会成为一种纽带，这种纽带是政治活动家所不能理解的，它会促进思想复兴。我们两个大国只要共同努力，就能创造一种经济基础，这种经济基础能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希望，能提高创造力和生活标准。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停止像冷战时期的理论家那样对待对方。我们必须抛弃过去一个世纪的观念，承认我们两国人民具有相同经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借助我们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缔造一个稳定、进步的21世纪。

——美国休斯顿电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休斯国际公司总裁加雷尔·张

《填起新丝绸之路上的凹坑》1996年1月9日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回顾历史，中美两个大国开始进行第一次交往恰恰始于经贸关系。1784年8月30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过一万三千英里的航行抵达中国广州港，用40吨花旗参换取了当地的丝绸和茶叶后返回纽约。这宗易货贸易打开了两个带有不同文明的大国关系之门。

而谁又曾料到，200多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美经贸关系又成为启动面向新世纪的两国关系的动力源。正如加雷尔·张所言，中美两国正在构筑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修建这条新丝绸之路的首要基础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大市场，而这一庞大的新兴市场无疑会给准备重振经济雄风的美国带来巨大的吸引力。美国负责经济、商业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琼·斯佩罗说过“由于出口如今几乎占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率的13%，因此，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从未像今天这样依赖贸易。”作为美国目前第6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又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

或许当年尼克松走下飞机与周恩来总理实现“巨人的握手”时，虽意识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但他可能从未想过中国会在短短的20几年里一跃而成为新的经济巨人，成为令人垂涎的新兴大市场。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的确令世界为之激动，令世人为之眼花缭乱。当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的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却平均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递增。很多国外专家预测，中国大陆在未来的16年中，总体经济规模和国民生产总值将排名世界第三。美国兰德公司预测，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10年将达到8兆6,271亿人民币。世界银行推算，只要中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在6%—7%的实际增长，到2020年，以中国大陆国民生产总值换算成的购买力将高达140单位，稳居世界第一，远高于美国的109单位和日本的43单位。诚然，国外专家的计算方法于中国的现实仍有很大差距。中国自己的估算是在200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左右，还属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中国的市场吞吐量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995年1—11月，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已达2451.52亿美元，其中出口1315.34亿美元，进口1136.18亿美元。1995年1月—9月，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3508个，协议外资金额505亿美元，实际实用外资金额249.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在世界上也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关于中国的大市场，1996年4月18日的英国《独立报》曾刊登贝利·莫里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市场将如何改变世界》。莫里斯在文章中感叹道：“总是能一鸣惊人的查尔斯·戴高乐曾经说：‘一旦中国醒过来，世界将会颤抖。’现在，在断断续续沉睡了几十年之后，这个亚洲巨人正在觉醒——世界也真的在颤抖。”对这一点，7个工业国集团的外交部和贸易部看得非常明显。尽管中国并没有派代表坐到世界问题的谈判桌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人们感觉到了它的影响。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的经济部门不断增加的迹象表明，中国是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生机勃勃的“第四发展极”的中心。大中华经济圈中的国家越来越想扮演一个准备到2002年在国际明星界与美国经济对峙的独一无二的角色。

这个第四发展极兴起的影响是巨大的。大中华经济圈是与欧洲、日本

和北美三极经济逆周期运转的。自从1962年以来，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7—8%，预料在今后10年内这种趋势将继续下去，甚至速度更快。预料到2002年大中华经济圈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国内价格计算将超过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并且是印度和前苏联的三、四倍。用一种不同的尺度——联合国的标准国际价格比较——来衡量的话，大中华经济圈可能在今后10年结束时超过德国和日本。

中国的出口纪录是其经济取得引人瞩目的增长的主要原因。自1980年以来，中国出口从毛时代受压制状态大幅上弹，起增长率是国际贸易增长率的两倍。迅速增加的外国投资支持着在很大程度上由香港企业家推动的这种趋势，他们在80年代中期开始把制造业转移到国内。台湾、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企业家也仿效他们，到中国寻找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世界银行的新预测表明，今后3年大中华经济圈的进口额将增加1000亿美元，绝对超过日本。

尽管7国集团中几乎没有人愿意认为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能动力，但是在这方面的记录现在是显而易见的，大中华经济圈正在提高其主要贸易伙伴增长潜力。现在被广泛认为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马来西亚目前向中国的出口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3%，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占3%，智利占1.8%，日本占1.3%。另外10个国家向大中华经济圈的出口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上。

这一点当然有助于中国在亚洲——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当高工资的台湾、韩国和香港的就业机会越来越遇到危险时，亚洲国家首先感觉到中国的吸引力。中国自80年代改变了出口初级产品的方针以来，开始生产老早源于亚洲的产品，尤其是运动鞋、玩具和服装等。当泰国，尤其是马来西亚进行调整，把更多的生产改为重工业和高技术时，整个亚洲掀起阵阵涟漪。

这种涟漪最终将扩大到工业化世界。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西方的就业机会遇到危险。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继续增长下去，中国的经济实力变得更加强大，工业化国家也会面临重大调整。中国朝另一些它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家具、塑料产品、基本机床、电子设备——转变将促进发达世界向尖端技术和高增值产品的转变，这将是一种痛苦的转变。

人们对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几乎没有怀疑。但是，对于它按人均收入衡量的实际发展情况猜测颇多。根据用购买力来估计的人均收入对大中华经济圈国内生产总值所作的各种预测大相径庭。世界银行估计，1990年的该区人均收入是1950美元，有些学者认为比这个数字低，只有1300美元，而另一份获得广泛宣传的调查报告——现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问题的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该报告撰写者之一——认为高达2200美元。根据萨默斯——赫斯穆的计算方法，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约10%。但是人们对这一结论的争议很大。

比较可靠的预测是，中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一种咄咄逼人的发展状态，因此将既是全球发展的源泉，也是造成引人瞩目大调整的因素。在今后10年内，世界经济很可能不得不对大中华经济圈的兴起采取对策，就像几十年前对日本做的那样。这就是必须把中国包括在国家俱乐部内，而不是继续将它排斥在重要谈判桌之外的充分理由。”莫里斯的感叹可以说是

代表了不少西方人的心态：对崛起的中国大市场既感到欢欣鼓舞，又对未来中国的经贸走势甚是担心。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今日之中国大市场只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益于与之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贸易。

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牵动了庞大的资金与产品的需求。据世界银行推算，在2000年以前的5年时间内，中国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为2800—3700亿美元，而由于中国国内资金紧缺，中国旗均每年需要引进90—150亿美元的外资。同时，中国在发电、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领域也亟待国外先进的产品设备进行补充与更新换代。

腾飞的中国经济不仅带动了生产资料和资金市场的庞大需求，而且也引发了国内消费市场的革命。可口可乐公司中国部前总裁弗兰顿·梅伊在谈到中国的消费时说：“中国是亚洲软饮料市场的第二大消费国，估计在90年代将增长4倍，成为最大的消费市场。而据1996年1月11日罗马尼亚《今日报》报道：今天，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视听市场，同时又是西方最难征服的市场。

众多专业人士和分析家一致认为，在视听领域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活跃的国家之一，它在专业排行中仅次于拥有3000万有线电视用户的美国而屈居第二，它的电视观众每年以高达500万的速度递增。虽然它的4000个电视网有些陈旧，但是，它已经开始在电视领域开发光纤网络技术。……中国的电视频道数量稳定增加，目前中国电视频道总数已经达到750个。最近，上海开通了中国第一个英语频道，其观众人数为1亿人。

亚洲电视节目分析家弗赖曼强调指出，目前中国电视节目每年的播放时间已累计达到1750万小时。

鲁珀特·默克多曾经成功地在中国开办了音乐电视台，香港电视制作人蔡先生在“不要性也不要暴力”的宗旨下也在中国开办了自己的CETV电视台。

海外商业人士无不对中国大市场的兴起寄予厚望。德国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如果德国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市场占有份额同德国在全球贸易一样达到11.5%，那么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增加2.2%，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1995年12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中田庆雄在该会机关报《国际贸易》新年号上撰文认为中日应加强战略性经济合作。日中应努力争取在5年后使日中年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100亿美元。

美国商家自然也不甘落后。1995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16%，在航空、发电、电讯设备、化学品和农产平方面表现强劲。在美国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有50家在中国大陆设厂，投资领域包括农业、轻工、食品、纺织、机械、电子、交通运输、建材、医药、金融、商业等26个行业。到1996年末，在对中国投资的美国旗业中，有12家公司的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其中，摩托罗拉公司又在中国天津耗资5.6亿美元兴建半导体晶片装配厂，其在华总投资达12亿美元；大西洋富田公司已在中国完成了中国最大的海上天然气开发项目，在华总投资额达6.25亿美元；可口可乐公司已在中国16个地区生产饮料产品，投资总额达5亿美元；阿莫科公司参与南海石油开发，投资额达3.5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在中国共有3家分公司，另外两家分公司正在设立之中，其在华总投资达2.5亿美元；联合技术公司的两家子公司分别在中国生产电梯和空调设备，投资额为2.5

亿美元；百事可乐公司在中国已有12家饮料厂、2家生产乳酪的合资企业、100家肯德基特许经营店和19家比萨饼快餐店，总投资额为2亿美元；路神技术公司在华投资1.5亿美元，有7家合资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有14家合资企业，投资总额为1.5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在华投资1.3亿美元；惠普公司投资额为1亿美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华有6家合资企业，总投资1亿美元。

中国的市场是巨大的，但从西方来华的新丝绸之路上却充满竞争对手。连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杰弗里·加滕也不得不承认，对华贸易潜力是巨大的。“至少，到本世纪末，中国计划每年进口1000亿美元的商品。获得这笔贸易的竞争是残酷的。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的总统和首相们已经表示要向中国提供数以10亿美元计的低息贷款，条件是中国购买他们国家的产品。”1995年，中国制定的“九·五”计划使美国工商界再次盛吹“中国风”。10月，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布朗率领一庞大的工商代表团访问中国，跃跃欲试，准备借我“九·五”期间重点发展基础设施之机，利用美国在此方面的相对优势与欧日争夺中国市场。布朗在北京与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共同主持了美中商贸协会第九届年会，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包括环境、电讯、药物等在内的五项合作协议及其他美商感兴趣的协议项目。另外，双方就组建中美基础设施合作指导小组、设立商业专利及商标办事处等事宜达成一系列协议。

离开北京后，布朗在香港会见了在港的250多位美国重要商界人士。在会见中，布朗语调激昂地强调：商业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中心问题，为双方的利益所在。应该说布朗在香港的讲话是一语见地的。经济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本已超越政治与军事因素，而中美两国又已都将发展经济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目标，双方客观上业已存在的经济贸易关系互补性无疑创造了这样一种前提，使得两国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完全可以重新设立新的战略合作基础，将经贸合作当成连接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新纽带。这也就难怪当这位器具历史洞察力的美国商务部长不久在一场空难中罹难后，中美两国以至国际商界都为之感到悲哀。

然而，正如古时的丝绸之路要经历沙漠荒山的艰难旅途一样，中美正在修建的新丝绸之路也是布满荆棘，更令行者担忧的倒不是中美两国天然的经贸差距与不和，而是一些美国人在这条新路上有意埋置的路障与挖掘的陷阱。

2. 被夸大的贸易逆差

《华盛顿邮报》在1995年底曾刊登《日本将不再是敌人》的文章，预计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对美贸易最大的顺差国。的确，不少美国人一谈及中美贸易，第一个反应便是所谓的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据美国官方统计，近年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比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要快得多，其结果导致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自1990年以来大幅递增，1995年已高达337.5亿美元。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格雷格·马斯泰尔和安德鲁·绍莫塞吉在1996年6月的《国际经济》中撰文指出，从1988年到1995年，中国在贸易方面的总的表现与60年代末期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积累大量贸易盈余的情况颇为相似。两位作者认为，这种现象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它表明中国的许多政策看来在仿效日本在60年代所实行的，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工业和贸易政策。而中国方面则坚持中美间并无此巨额贸易顺差。中

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某些人士或是别有用心，或是受人蛊惑，他们对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大肆渲染，声称美国对华贸易存在着巨额逆差，并借此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横加指责。”美国的贸易统计极大地夸张了美方逆差的幅度，美方并不存在所谓的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面对337.5亿的统计数字，究竟谁是谁非？恐怕只有用事实来给予公证了。

首先，美国的贸易统计未能反映香港、台湾和外国旗业集团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直接受益者的事实。即美国人有意或无意间将造成对美巨额顺差的罪责全都甩到中国大陆的头上，而不顾外商企业（其中包括美国旗业）的加工贸易和香港的转口地作用是对美产生巨额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数字被夸大了，因为这一数字并没有考虑美国出口到香港然后又转口到中国的产品，以及中国经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产品。据中方统计分析，中国对美出口的60%和自美国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同样据美国资料分析，中国货物只有20%直接运往美国，而80%都是通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的。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产品构成和贸易过程的特殊性，出口货物经由香港转口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即若中国出口值为1美元，香港转口到美国或美国进口值增加至1.4美元。进一步的研究分析还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产品譬如玩具和服装的转口增值率甚至超过100%。

但依美国的计算方法则是一方面将普通通过香港等地转口到中国的产品从自己的出口账上划去，而却将中国通过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的产品硬全部记到中国的出口账上。一进一出，一舍一进，美国商务部和海关的统计方法实在太高明了，恐怕在国际上还难寻此统计惯例。

因此，仅仅因为双边贸易中存在的转口及转口增值率，1995年美方就夸大了贸易逆差130亿美元，相当于夸大60%。

这种连中小学生都明白的算式却偏偏难倒了美国的统计专家，其中奥秘自有人知。对此，不少美国的经济统计权威机构或专家也有不平。他们认为，若将这种贸易结构考虑进去的话，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将增加，而从中国的进口额将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实际贸易逆差将大为减少。根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学会的数字，从1989年到1993年第三季度，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至少被美国政府夸大了32—34%。如果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更新的统计，美国的统计把对华贸易逆差夸大了约50%。美国商务部也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75%是经过香港转口的。商务部的研究报告估计，中国通过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产品金额中，约29%是在香港增值。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商投资额不断增长，但大部分外商投资的产业和产品结构是以外销加工为主。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仅1995年1至11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就达959.7亿美元，接近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0%。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估算，中国近三分之二的出口产品是加工贸易产品，在中国的增值仅占约25%。还有一些海外研究机构分析，中国制成品出口的国内增值率仅为10%至23%。中国的统计资料显示，199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70%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对美贸易顺差又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加工贸易和转

口贸易是对美贸易顺差的主导因素。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赚取的主要是微薄的加工费，靠加工贸易出口的实际收汇相当有限事实表明，实际的商业利益并未随着贸易顺差一同转移到中国大陆，而参与这一过程的港台和外商企业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直接受益者。

其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中国大陆产品取代了美国从亚洲"四小龙"的传统进口，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总体贸易平衡状况仍基本维持原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迅速，主要原因在于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劳动力成本随之上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能力下降。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迁往中国大陆进行生产。由于这些企业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依赖于传统的销售渠道经过香港出口到美国，因而"四小龙"的对美贸易顺差也转移到中国。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对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总体贸易平衡状况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只是由于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使美方逆差的来源地发生位移，美国在对中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同时，对亚洲"四小龙"的逆差相应减少。自1987年，美国与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的贸易逆差总共增长了21%，年增长率不足3%。

以美国的鞋类进口为例，从1990年到199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鞋类增长了294.4%。同时，美国从韩国和台湾进口的鞋却下降了78.8%。如果把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作为一个整体的话，美国则在五年中从这个整体的进口共增长了20.2%，也就是说，每年的增长率为4%。从中国进口的鞋实际上取代了那些不再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地区）的产品。当前，进口的鞋类已经占领了美国国内市场的90%，而美国国内生产的鞋则仅限于那些外国供应商无法填补的领域。

服装贸易是反映这种贸易转移的另一个例子。在这个领域，中国实际上正在失去美国的市场。从1990年至1995年，美国从中国的服装进口额增加了47%，即每年增加9.4%。同时，从香港、韩国及台湾的进口却下降了5.9%。如果将这些国家（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从其进口的增长率为8.6%，或者说每年的增长率还不到2%。美国从中国的服装进口实际上正在下降。与其它进口产品相比，服装的进口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来说都下降了。1995年从中国进口的服装比1993年降低了11.8%。在这一期间，中国服装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从12.2%降到10.1%。中国服装在美国市场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美国的进口已转移到成本更低、受美国纺织品配额限制更少的国家了。

如果一些美国人仍坚持认为，上述统计是"中国人的狡辩"的话，那倒不妨听听美国专家的论述。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库斯·诺兰在对有关资料作了分析之后，发表了一份报告，得出如下结论：美中之间迅速扩展的贸易远不像那些逆差数字显示的那样有害。实际上，它对美国经济总的影晌"是积极的，尽管这种积极影响大概不是很大。"他写道，来自中国的进口气"所排挤的大体上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而不是本国产品。"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和工人从对华出口中得到很大的好处。

诺兰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玩具、鞋类等产品的确越来越多，但是这些工业在美国已经几乎绝迹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气所排挤的大都是从墨西哥、韩国和台湾等地进口的产品。"诺兰在

报告中指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绝大部分"是轻型制成品。他在对460个产品类别作了仔细研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体上是从那些因工资升得太高而丧失竞争能力的国家手中夺去了鞋类、服装和电子产品这样一些低价商品的市场。

诺兰在研究1988年至1994年美中贸易迅猛发展时期出现的情况时发现，这一时期内，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价值，同在中美两国在所有产品类别中的竞争能力自始至终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会有数字相比，高出109亿美元。但他发现，在这109亿美元中，只有9亿美元是挤占了美国产品的市场，其余的都是排挤了其他国家产品的结果。而且，对美国产品的这种负面影响还因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增加以及出口产品公司所付的较高的工资而抵消了。

最后，中美贸易结构与数额的差异反映了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与发达的美国经济的互利关系。从下面这两张根据美国权威机构公布的数字勾划的中美贸易商品的构成表格中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绝大部分是服装、鞋类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进口的则主要是精密机械、飞机和化肥等技术及资本附加值极高的商品。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美国至今尚未完全解除对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当然有岂不可推卸的自身责任。

2. WTO还是RTO?

中国过去为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及现在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条件已经成熟，问题是这个组织准备何时让中国加入？中国没有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最后期限，因为这不取决于中国。世贸组织应明确作出让中国加入的决定。

中国不能加入世贸组织，当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损失，但对世贸组织同样也是一个损失。我不久前在巴黎时曾讲过，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那么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最好改名为地区贸易组织(REG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RTO)，没有资格称之为世界贸易组织。

——1996年6月李鹏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采访时的讲话记得80年代中，一声"狼来了"的呼唤曾引发多少中国人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期盼与担心。当时，步入改革之路的中国人对外部的事务知之甚少，却又带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入关时所特有的恐慌，渴望着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融，准备着与国际经济惯例的接轨。然而，多少年过去了，中国仍徘徊在乌拉圭回合之后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大门之外。中国人对复关的心理已由为国外商品大潮冲击下脆弱的民族经济的担心转为对复关与加入世贸组织的高门槛的无奈与不满。而世人皆知给中国人树立这一高门槛的正是一直坚持"要将中国经济纳入国际轨道"的美国。

自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以来，关于中国复关及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年复一年，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磋商与讨论。可是，10年过去了，仅仅由于一个美国的漫天要价，蓄意阻挠，中国的"复关"问题也就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日程表上成了一个老生常谈。这种现象恐怕是关贸总协定史上绝无仅有的怪事。

对于中国的复关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坎特1996年曾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有过这样一段阔论：在我们讨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时，对

贸易的公开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在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我们在我们的对华关系中再次既看到机会又看到责任。克林顿总统在去年秋天同江主席进行会谈时重申支持中国在作出商业上可行的承诺的基础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让我在继续谈这方面的问题时强调关键的一点，乌拉圭回合的重大成就之一是所谓的单一承诺。这意味着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处理的所有经济问题是所有成员国已接受的单一的一揽子权利和义务。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一份可以挑挑拣拣的菜单。要在关于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的讨论中取得进展，中国必须停止设立新的壁垒来代替那些以前已撤除的壁垒，停止制定使它同世界贸易组织的性质脱离的政策。

而美国将仍然是注重实际的和务实的。我们的实质性做法是同中国的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做法一致的。克林顿总统在同江主席进行会谈时清楚地说明，美国随时准备谈判一项真正的增加贸易的协议。

要使这个可能性变成现实，美国准备尽自己的责任，但是，中国也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责任，接受一个大国的负担。中国的诺言和中国的各种保证必须变成行动和现实。这是通向和气、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唯一桥梁。”坎特的官话虽算直接，但多少还有些含糊其辞，美国阻挠中国复关的真正目的与考虑并没有说清。而作为学者的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则直言不讳了。这位学者1996年1月7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题曰《中国在敲门：他们想要加入世界经济之中，但是他们会不会按照规则办事？》，在这篇长文中，曼宁认为：贸易争端、台湾问题等已再次使人们对中美关系提出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这件事情的中心是冷战后的世界面临着最深刻的争议问题之一，即随着中国作为新的全球强国崛起，它是会按照规则办事还是会随意歪曲规则？如果美国政治领导人要在感情上作出反应并设法“惩罚”中国的所作所为，那是容易做到的，现在已为春季在延长贸易最惠国地位的问题上令人厌烦的辩论作好准备，这肯定会是一场不适当的斗争，我们已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已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年贸易额为五百亿美元，现在开始争论我们是否要同他们进行贸易，未免有点晚了。更好的途径是作出头脑比较清醒的反应，这可以达到所期望的目的，我们可以通过立场坚定的谈判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做到这一点，北京非常想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将是衡量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将如何行事的一个重要基准。

可以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和军事强国崛起是冷战后新出现的国际关系体制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挑战之一，看来成为中美贸易争吵的许多争议问题确实是全球性争议问题，情况必然是如此，因为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十分重要，贸易额相当大，因为在我们带头冲击时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给予有力的帮助。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往往会淹没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争端之中，这些争端包括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和核扩散问题，这些争端常常使中美关系出现对抗气氛，没有明确的轻重缓急次序和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已使中美关系降低到出现一系列恼人的事情而使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十分困难，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大缺点，这使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可能得不到解决，可以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决定中国是否能与外界联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是否遵守全球的经济行为准则？政府现在有机会纠正十分混乱的对华政策，美国必须坚持“出于严格要求的爱”的立场，它将强其实施全球的商业准

则，我们还必须叫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继续参与其事，以便使中国认识到我们的严肃态度。

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北京已经是世界上第十位贸易大国，它在全球的贸易额达到2800亿美元左右，199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380亿美元，今年的对华贸易逆差可能超过对日本的贸易逆差。

仅仅在知识产权这一个领域，美国的激光唱盘和音像制品的制造商一年就损失十多亿美元，因为中国政府无法执行一项制止盗版行为的协议，这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十分庞大而且具有地区性，突出的表现是北京下达的指示不被理睬，举例来说，在去年三月签订知识产权协定时在华南被关闭的七家工厂当中的6家已重新开工，关于削减监狱劳改犯生产的产品的协议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这种倒退可能导致美国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实行贸易制裁，美国副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上月访问期间警告说，“中国不能指望美国人民支持签订新的协议，如果旧的协议得不到执行的话。”全球贸易的准则基本上是由世界贸易组织制定和执行的，世界贸易组织提倡自由贸易并为欠发达国家创造有利条件，中国想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作为外汇储备达700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之一来参加，而是作为人均收入低的欠发达国家来参加，这将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

首先，如果让北京按照自己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就会树立一个先例，放松俄罗斯和其他前共产党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准；其次，宽松的市场准入标准不会起推动中国进一步对其混杂的经济实行市场化的作用，而会加强中国的中央集权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第三，随着中国的贸易顺差跃增到新的高度，这将会助长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在可以称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即解散大约15万国家有工业企业，对金融系统实行现代化并实行法治——已冻结的时候，如果同中国达成不要求加快进一步市场化的协议，那既不会给国际社会带来好处，也无助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关税改革和决定允许它的货币可以兑换。但是北京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上必须加快履行它的责任，这些问题是：——市场准入。尽管1992年同美国达成一项协议而有进步，中国仍有许多贸易壁垒，包括对许多工业品征收高得惊人的关税，此外任意规定和平视性的测试制度和标准以及为各个工业部门规定的一大堆“国家计划”造成限制外国参与许多部门的非正式壁垒。

——透明度和一致性，中国继续使用许多策略，包括行政指导，专门的采购交易和限制进口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暗中规定。此外，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机构仍然违反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按本国对待”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表现出它能执行适用于各个地区的和各个省份的全国一律的贸易政策。——服务，外国公司无法在银行业、保险业和信息技术方面进入中国的一大部分市场。

简单地说，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坚持高的要求是值得为之斗争的，界线应划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划在贸易最惠国待遇上，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同中国在东南亚出售使局势不稳定、损害美国战略利益的军事技术问题一起应当成为我们双边议程的中心议题，这些问题应当成为衡量这个中央王国是与世界体系融为一体还是与此相反的重要基准。

世界根本不能容许一个主要的贸易强国按照自己规则办事，为了保住国内对美中的积极经济关系的支持，必须有一种较为互利的贸易关系，美国公司和工人需要明确的全球贸易准则所提供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在中美关系的好坏业已涉及重大利益的时候，任何达不到这些要求的协议将对信心造成损害。

在某种意义，曼宁的文章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在复关问题上对华政策的代言辞。美国担心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其国家利益构成威胁，担心强大的中国对世贸组织的规则置若罔闻，因此而要求中国以所谓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并企图胁迫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按美国提供给中国的线路图，在市场开放、外贸体制改革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是否已具备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准？中国的市场果真如美国政府或学者所言是那样壁垒森严吗？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是否已经达到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凡此这些，即使按美国人的思维逻辑推断，即所谓的以数字和事实说话，也完全可以证明美国人在中国复关问题上的的确是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漫天要价。

美国政府至今仍然坚持在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不能给予或全部给予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坎特声称：“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因而不能使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待遇。从某些有限的方面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从其它几乎所有方面来看，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大国。”坎特先生此言差矣！“经济大国”绝不等同“发达国家”，这恐怕是搞经济的人都明白的一个事理。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发展报告》公布的有关数据，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虽达4256亿1千1百万美元，在全球排名仅次于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巴西居第10位，但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中，中国以499美元的低水平位居第95位（参加排名的共132个国家或地区），在按购买力评价测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中，中国以2330美元居第79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体发展水平。

再以一些重点项目的单产计算，中国也不能算是个发达国家。1994年，虽然中国的煤炭、水泥、粮食、棉花、肉类、钢铁、化学纤维和发电量等居世界前列，但用人均指标来衡量，中国在农业项目上的产量大部分刚刚接近或略超世界平均水平，而粗钢的产量仅为世界人均产量的一半，原油、发电量和食糖等人均产量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从经济结构和消费水平等方面看，中国依然属于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迄今有65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所以，联合国发布的《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再次肯定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地位。

一个在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排名如此靠后的发展中大国竟被美国硬推进发达国家的队列，其中的奥妙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以发达国家的名份进入世贸组织，中国将失去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应该享受的某些贸易保护或优待。否则，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难以纳入世贸组织的规范轨道。这正如1996年7月26日，英文《亚洲周刊》上的那幅漫画一样：在一辆标有WTO字样却只有前轮的轿车内，山姆大叔与WTO负责人坐在前排驾驶着飞奔的汽车，而后排的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只能以脚代轮，疲于奔命。这样一部前后不一的车子怎么行驶的确令人担忧。漫画无疑反映出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操纵WTO，强行将发展中国家并入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经贸轨迹的无奈。由此而联想到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如果强行将中国按发达国家身份拉入

W T O，那中国这样一部沉重的发展中经济列车一旦在W T O的高速路上跟不上规定时速的话，受损的恐怕将是世界经济。

至于中国市场的关税或非关税门槛是否真如美国人形容的那样高不可攀，我们还是用数字和事实说话。为履行关贸总协定中有关降税的协议并促进中国经贸体制向国际规范靠拢，从1991年起，中国全面取消了出口补贴，使中国的外贸企业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道路。1992年起，中国又连续多次大幅降低进口商品关税。

1992年1月，中国单方面降低了225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取消了全部进口调节税。

1992年12月，中国降低了3371种进口商品的关税，使中国关税总水平下调了7.3%。

1993年11月，中国再次降低2898种税目的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平均降幅为8.8%。

1995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日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宣布，从1996年4月1日起中国将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降幅将不低于30%。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降税范围将涉及4000多个税目，占中国关税税目的23，同时取消176项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

1995年12月，中国主管经济工作的朱镕基副总理说，中国明年还要进一步降低关税，甚至可能会让人民币在一切商业交易中成为可兑换的货币。中国原来是计划在4年之后再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

1996年初，中国国务院宣布：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将逐步降低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1996年4月，中国关税削减后的新税制开始实施，在此税制下，中国的算术平均关税率为2.3%。

如此大的降税幅度，如此紧密的降税频率在国际经贸的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以国际标准衡量，1992年，中国的名义关税水平还是较高的，仅次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明显内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与巴西的水平相当。1996年的新税制使中国的关税水平居发展中国家之中。而从实际关税征收水平看，1994年中国实际关税征收仅为3.3%，占名义关税水平的12%。1995年实际关税征收率降至2.7%，不仅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甚至也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所有这一切只能表明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已根据自身条件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非如美国政府及某些新闻媒体所认为的那样，“中国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在外贸体制方面，中国正向统一、规范、透明的方向继续改革与发展。1994年中国对外汇、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1995年，中国又相继取消了对部分商品的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管制，减少了非关税壁垒，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进口商品配额有偿招标管理办法，扩大了配额商品有偿招标品种范围。为了保证外贸法的全面贯彻实施，中国政府正在起草一系列与外贸法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包括外贸企业许可制度条例、外贸代理条例、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等。

曼宁先生在其上面的那篇文章中曾提出中国不顾1992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市场准入协议，任意设立贸易壁垒，阻碍美国产品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市场的开放性，中美专家与学者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双方政

府间的指责与反驳也接连不断。中国政府是否如某些美国人所言，故意设置各种壁垒不允美国的商品顺利进入其市场呢？在此我们可暂时将冗长乏味的数字与法律条文搁置一旁，留予有耐心的读者在那汗牛充栋的文献中继续查阅，而仅举一个简单的中美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的争执，便可管中窥豹，知道中美之间究竟谁对谁非了。

1996年1月，美国农业部长格利克曼访华后发表讲话称，他未能说服中国取消长达23年之久的禁止输入美国西部小麦的禁令，以便让更多的美国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他还威胁道：“我认为中国不买美国的小麦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这可能损害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继续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支持。”此次中美关于小麦进口的争端起因于中国政府禁止输入产于美国太平洋沿岸西北部地区、患有“小麦矮腥化黑穗病”的小麦。这种小麦矮腥化黑穗病（简称TCK）属系统传染性病毒，是麦类植物穗病中寄主广泛、传播性强、极难根治的一种病类。正在生长的小麦感染此病后，植株明显矮化，麦穗变为带有腥臭味的黑色粉粒，大面积流行地区可使小麦减产50—70%，甚至颗粒无收。目前，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对此病均无根治方法。鉴于TCK对小麦生长的严重危害，目前世界上所有小麦生产国都将此病列为植物检疫危险性病害。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小麦生产国，当前虽然仍是TCK的非流行区，但易于感染TCK的冬小麦种植面积约占全国麦田面积的85%。因此，一旦TCK传入中国，必将对我国的粮食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从70年代中美恢复经贸关系后，小麦一直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但一开始，中国便多次发现从美国进口的小麦中带有TCK，所以自70年代初，中国政府就明令禁止从美国西部TCK疫区购买小麦。开始时，美国政府百般抵赖，拒绝承认疫情，后在检验事实面前以“有病无害论”进行狡辩，在遭到中国政府的驳斥后，有十几年的时间，美国已不再向我出售疫麦。1992年9月，中国农业部根据同年4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法》制定并公布了《进境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TCK被列为第一类危险性植物病害，对带有TCK的病麦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一律禁止输入。近年来，中国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曾发现过TCK病毒，并一律予以禁入。

中国禁止带有TCK病害的小麦输入完全符合国际惯例。早在19世纪，因为法国输入原产于美国的葡萄枝条带有“葡萄根瘤蚜”，在短短的25年内法国的200万亩葡萄园就遭灭顶之灾。1872年，法国在世界上第一个颁布了禁止从国外输入葡萄枝条的禁令。

此后，德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等国也相继制定有针对性的禁令和动植物检疫法规。1924，由138个成员国建立的国际兽疫局和1951年由88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分别制定了《国际动物卫生法典》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这标志着动植物检疫走上国际化、组织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道路。这两部文献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检疫管理必须遵守的国际惯例。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缔约方为消除个别国家以动植物检疫为名设置贸易壁垒的弊端，一致签署了《动植物检疫及卫生措施协议》（SPS协议）。

中国是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的地区组织“亚太植保委员会”成员国，并是SPS协议的签署国。中国政府颁布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是参照国际标准并结合我国实际制定的，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对植物病害输入的检疫与禁止连美国也有其法律与技术规定。例如，对“印度腥黑穗病”小麦的进口，美国政府一直暂缓进行。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某些农产品，美国也有同样的检疫措施。如以中国柑橘有柑橘溃疡病为由禁止其输入，以中国盆景有土壤为由，禁止输入中国盆景等。而这次美国政府却明知故犯，并倒打一把，反污中国设置技术壁垒，其用意何在？据有关专家透露，美国在T C K问题上压中国开放对美国西部小麦进口的市场，主要是为倾销过剩的农产品，并以中国为突破口，在植物检疫问题上解决同欧盟、加拿大等国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的争端；而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为继续阻挠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寻找借口。

中国的复关之路在美国的阻挠下行如蜀道，以致一位叫卡特琳·夏蒂努法国人在1996年4月11日的法国《回声报》写了一篇题为《太漫长的长征》的文章，评论中国复关问题。这位法国人指出：北京似乎是逆来顺受了。7年来，中国梦寐以求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今天仍不能如愿以偿。这一次，是美国的大选（在11月份进行）使得中国加入再一次推迟。大西洋彼岸对中国问题十分敏感，因而没有人想象有离总统选举只有几个月的时候，白宫会作出对北京有利的决定。结果是谈判陷入僵局，气氛恶化。据中国谈判代表说，美国人趁每一轮谈判的机会又提出新的要求。中国首席谈判代表3月底在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解释说：‘我们在日内瓦会晤美国谈判代表时，把80%到90%的时间花在谈论双边争议上。’因此，华盛顿不再只是以中国市场对外开放不够或以中国人民币不能兑现这两点来反对北京，而且它向中国施加压力，要中国解决计算机软件盗版问题和要求中国进口更多的美国小麦，以换取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表示欢迎。对中国人来说，事情已经定了：在这些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政治考虑显然压倒了纯技术性考虑，今后要等到适当的时候来重新推进谈判进程。不管怎样，谈不上‘为了世贸组织而牺牲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谈不上对西方的所有要求都作出让步。”的确，中国政府和人民仍满腔热忱地期待着早日复关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中国绝不会“逆来顺受”，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更不会为复关而全面屈从于美国的政治和经贸压力。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已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立场是明确的，即以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为前提，以乌拉圭合作协议为基础，承担与自己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本着上述原则，中国始终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至于说什么时候能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主动权不掌握在我们手上。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根据我们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进行的，而不是受制于别人。不管中国什么时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的改革开放都要进行下去，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1995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如果说中国不急，美国也不急的话，那作为美国盟国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甚至连世贸组织的领导人有些等不急了，因为他们知道，正如李鹏总理所言，离开中国，WTO真只是个RTO。

1996年6月16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曾确定将在里昂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建议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方针。据日本政府人士透露，以桥本首相之意，应在1997年7月归还香港之前实现中国加入该组织。因为“一旦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在国际上履行责任。从中长期来看，对于支援改革路线，也是合时机的”。世界贸易组织干事长鲁杰罗也

说，大国应该避免把政治问题和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说：“这是贸易谈判，是必须考虑贸易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谈判，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鲁杰罗认为，不包括中国和俄国的世界贸易的制度是不足取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一种政治选择，而在于这两个大国将来都是世界贸易大国，两国都处在深刻的变革中，我们的谈判已有进展，但是，道路还将是困难的，中国参加大阪会议是中国决心放宽贸易限制的好迹象，中国在那里也表示愿意逐步削减自己的贸易障碍，以便从2020年起同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欧盟国家也多次表示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另据法新社1996年1月10日法文电报道，1996年1月，经合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认为中国的经济在1995年已放慢了运转速度，经过经济过热的几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降到10%，但中国经济继续大发展的条件似乎已经具备。该组织秘书长认为，“中国尽快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正式伙伴显然符合世界其它国家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为了使中国继续发展下去，它的“伙伴们必须表现出按规矩办事的态度”。法新社认为这句话是针对美国顽固阻挠中国复关问题而言。

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国政府与人民有的是耐心与决心，而美国政府也应识些时务，即使是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考虑，也应尽早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因为依据美国政府新的经贸政策，美国将会不遗余力地利用WTO的多边贸易框架向外推展市场并应付所谓的“不公平贸易竞争行为”。可如果没有中国的加入，WTO的世界性范围意义将会明显削弱，而在APEC中能否得到中国在关税等方面的继续承诺与支持也会难成定数。所以就是从美国的自身利益出发，美国的高门槛也是与其不利的。故而连以美国的舆论自由标准看还算很自由的《香港虎报》1996年5月20日也刊文指出：“我们已指出，现在到了美国对中国采取新做法的时候。第一步必须是把门打开，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有那样，双方才能坐下来作为正常的贸易伙伴互相交谈。”

4．经济制裁：一把双刃剑

回顾近年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制裁”二字不绝于耳。多少次美国政府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将中国列入超级301名单，进行所谓的“重点调查”；多少次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准备对中国实行贸易报复；又有多少次美国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威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贸易制裁仿佛成了美国政府对华经贸关系中惯用的大棒。然而，这根大棒真如美国政府所希望的那样灵验吗？恐怕并非如此。经济制裁实际上是把双刃剑，对中国不利，于美国更不利。

制裁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来说固然不利，但也绝非如一些美国人估算的那样可怕。以1996年5月15日美国公布的30亿美元产品报复清单为例，其中约有10亿美元的产品属于外资企业生产，而且大多经过香港和台湾转口美国。扣除转口费用，在中国大陆的实际加工附加值应远远低于1亿美元。对于另外20亿由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来说，由于中国近年来总体贸易收支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没有问题，又积累了近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宏观角度，减少20亿美元的出口对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并无过大伤害。而由此引起的部分国有或乡镇企业职工下岗问题也会有国内其它产业吸收渠道缓解一定的失业负担，对社会不会造成太大的冲

击。

所以连不少美国人也认为，美国的制裁将只会对美中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产生影响。据美国估计，美中贸易额1994年达到大约450亿美元。中国去年向世界各国的出口总额为1240亿美元，美国的制裁所影响到的还不及1%。

华盛顿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说，中国的一些制造厂和美国的一些公司将会受到损害，但是总的经济影响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拉迪说，虽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但美国迄今宣布的制裁不会导致中国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

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同其他东亚国家经济一样基本上成为自立型经济，一方面外部市场与资金流向对其经济发展制约力略有下降，另一方面对外经贸关系已逐步从单一渠道拓展为多渠道、多来源的立体结构。

过去在谈论东亚经济时，少不了“对外从属”这句话。曾有看法认为，东亚的增长是通过向美国寻求出口市场以及依赖从日本进口体现高技术的生产资料实现的。而且这一地区的生产主体是日美的跨国公司。东亚经济有着受区域外的大国日美所左右的脆弱素质，从这一意义上说，“从属的发展”是该地区的特征。

这一观点的确反映了现实。

但是，东亚增长的机遇自进入90年代以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以对外从属型的说法来谈论这一地区已是时代错误。

现在，美国已无力像过去那样从东亚进口，而且更重要的是，经济长豈不振的日本也彻底放慢了从该地区的进口。尽管如此，东亚的需求并没有减少。这是因为，区域内出口比例有明显的增长，而且区域内投资资本的重要提供者是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1986年—1990年，美日的投资总额为212亿美元，超过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157亿美元。但1991年—1994年，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为272亿美元，超过了日美合计的241亿美元。对中国的巨大投资者也是以香港和台湾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1994年，中国引进的海外直接投资额为339亿美元，其中香港和澳门占60%，其次是台湾为10%，日美合计为13%。

这样一来，东亚包括中国的物（贸易资产）和钱（投资资产）的自我循环，成为现在支撑东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机制。尽管背后有日美的市场和投资，但是更大规模的进口市场和投资资本是由区域内或中国国内提供的。所以，美国挥动制裁这根利剑时的底气已经再无往日实足了。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等东亚国家在被逼无奈时已完全有内部调节能力离开美国的市场与资金而维持一定规模的发展了。而美国却还在怀抱老皇历，自以为是发展的最大施惠者。其贸易代表坎特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最明显地反映了我们关系中的机会和责任。贸易议程为明确规定我们所说的‘交往’是什么意思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情况。交往带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互责任。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市场的潜力是一个可以触知的现实。1994年，中国的出口商其中有将近40%销到了美国，其中包括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电子机械、纺织品、服装、鞋，以及数量不断增加的增值价值更高的产品。此外，中国公司还获准在我们国家的全国各地自由地建立分公司。

中国还从美国的投资和技术中获得了好处。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者

之一。美国公司已把100多亿美元投入合资企业、独资公司和其他投资机构中。美国公司还在它们获准建立分公司的几乎每一个部门帮助发展了中国的市场，这使美国从中受益，但是最主要的是，使中国从中受益。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传授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建立了质量标准以及增加了中国工人的权利和特权。”坎特之言颇能反映美国对华进行贸易制裁时的大国心理，但他不仅忘记了中国经济的自立性，更没想到当美国准备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为两国经贸关系设置障碍时，欧日等国则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当今世界对中国的大市场只有竞争，没有等待与观望。

自1995年7月欧洲委员会公布《中欧关系长期政策》以来，欧洲人关于中国的战略观念已发生显著的转变，并宣布要通过经济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等措施，“提高欧盟在中国的形象”。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及经济贸易界人士频繁出访中国，中欧经贸关系与往来明显发展。

德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国是德国亚洲政策的重点。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近年来中德关系迅速改善。

法中之间的贸易在过去10年中有较大发展，贸易额从1986年的94亿法郎增加到了1994年时的347亿法郎。但是，法国在中国市场所占的份额仍然很小。法国只是中国市场的第11大供应国，居德国和意大利之后。为此，法国政府一直在考虑要把由于法中之间在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的争吵而在经济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英国首相梅杰在会见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时表示，希望同中国发展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据报道，英国目前对东亚地区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对欧洲大陆出口的增长速度。

“把外交工作的方向由欧洲转向亚太和美洲地区”，“把增进同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关系作为最优先考虑的事情”等观点，正在被愈来愈多的英国政界人士所接受。

在芬兰，30余家公司企业在1996年2月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中国研讨会”，邀请有关专家介绍同中国做生意的经验：以便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促进芬中两国的贸易。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1995年为31.08亿美元，时隔三年又超过了美国旗业对华投资（30.83亿美元）。三菱综合研究所就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指出，“正在由中小企业和专门厂家建立出口据点型的投资转向大片业指向内需型的投资转换。”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额1990年只有61亿美元，但1995年已超过200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大约17.4%，从中国的进口额1995年增加到345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30.3%。双方的贸易总额增长了25%，达到579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中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美中贸易的增长率为7%。

这也就难怪美中贸易企业界联合会指出：中国在今后10年内需要将近7500亿美元新的动力、运输、电信和它基础设施，而美国在这些商品和劳务方面是出类拔萃的。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实际上将把那个市场交给欧洲、日本和其他竞争者。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已经维持着美国20多万个“高工资”工作岗位。美国动辄以经贸制裁威胁中国，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据专家估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导致中美贸易战的话，首当票冲的受害者是美国的老百姓。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副会长兼国际贸易律师罗伯特·霍尔在谈到今

年5月克林顿政府打算对价值3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主要是衣服和电子器件）征收100%或更高的关税时说：“美国的普通家庭是被弹片击中的。”他认为如果美国真正实施报复关税的话，那将使美国顾客在从廉价女内衣商店到海边冲浪板商店看到的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将上涨。因为美国出售的所有玩具中约有40%是中国制造的，12%的服装、60%的鞋子以及电子产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也都是中国生产的。人造花、圣诞节灯泡、美国国旗、灯具、无绳电话、电扇、刮胡刀和吹干头发用的吹风机的情况也是如此。受城市儿童欢迎的在街上玩的曲棍球用具也是中国制造的。

美国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商协会负责人劳拉·琼斯说，中国的纺织品已经受配额限制，对其征收的关税平均为20%，这使美国一般家庭每周付出大约10美元。在她看来，增加关税将使收入不多的美国人增加负担，但却保护富有公司的利润。

琼斯说：“中等阶层的美国人干吗要为购买乳罩、内衣、裤子和T恤衫而多花钱，结果却保护了迈克尔·杰克逊激光唱盘公司等公司的利润呢？你们试图限制来自中国的商品，实际上就是要对服装——尤其是廉价服装——课以重税。”国际零售商协会副主席罗宾·拉尼尔说，课以重税是对美国消费者和气业的沉重打击。

制裁中国虽使一些唱片公司欢欣鼓舞，但却难为了零售商。罗伯特·霍尔指出对中国货物征收惩罚性关税会使美国零售业受到损害。

他说，制裁针对服装进口，这是违反华盛顿在美中纺织品协定中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因为这项协议明确禁止采取这种惩罚性措施。“政府无视美国在国际上作出的承诺，采取这些行动并建议采取违反美中纺织协定和国际法的行动，同时又要求中国履行义务。美国自己随意违反协议，却要求中国遵守国际协议，这是没有道理的。”霍尔说，制裁清单上几乎每一种产品都是零售商销售的，特别是服装和室内装饰品。

提高对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产品的关税会造成产品短缺，价格上涨，给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这些损失大部分将落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因为要受到制裁的商品历来是在廉价商店和大众化的零售店出售的。

我们估计，仅服装一项，把从中国的进口关税提高100%，在制裁生效的第一年就将使消费者多花30亿美元，每个4口之家约合50美元。“但他警告，对年收入不到2.5万美元的家庭，一年要多花100美元。

在其他类别的商平方面，霍尔估计，童车要多花8%到29%的钱，其他供应者生产的电话机要比中国生产的贵116%到283%。

霍尔说，在1995年，出售被列入制裁清单的中国货的商店雇用了570万人，占全国劳动力的5%。

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威胁不仅伤及其通消费者和零售商的利益，而且也使如波音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忧心忡忡。

在中国与美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波音公司感到它所受到的威胁几乎超过所有公司。

波音公司希望在今后20年向这个迅猛发展的市场出售价值1000亿美元的飞机。在1993年和1994年这两个工业不景气的年度里，中国的航空公司订购了波音公司20%的产品。公司经理们希望从现在起至2015年，中国市场从世界各地购买的每8架新飞机中有1架是波音公司的飞机。

因此波音公司的高级领导人对中美关系恶化表示震惊。他们说，这种局势已经使该公司把生意拱手让给欧洲对手空中客车工业公司。

波音公司总经理菲尔·康迪特在该公司年会上说：“我们也许是中美贸易最显而易见的象征。”他和其他经理说，贸易分歧似乎已使波音公司从竞争参与拟议中的由中国牵头的项目中被淘汰出去。这个项目旨在研制名为“亚洲快车”的有100个座位的新型客机。

另外，美国扬言报复的这些产其中有许多是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开办的工厂生产的，因此美国的制裁也会使他们受到损害。香港政府估计，美国的制裁可能会使香港今年的增长率减少0.1个百分点，损失3800个就业机会。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对美国政府这种不负责任的举动，美国专家颇为不满。美国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前驻印尼大使罗伯特·巴里在《外交》1996年7—8月号中撰文指出：“贸易代表挥舞着关税大棒，在制定谈判战略时心里想着国内不满的选民，常常不对详细内容进行仔细研究讨论就突如其来地向其它美国机构和驻外大使提出计划，结果就像中美贸易关系那样，往往把制裁作为首先采取的手段。美国不是联合意见相同的国家或者求助于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多边机构来推进自己的目标，而是发出威胁。但是违反规定的伙伴通常置之不理，知道这些威胁是空的，因为它们会伤害从现状中获利的美国公司。过去两年里，在日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对立的作法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损坏了美国的声誉，造成关系紧张。”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的贸易分析家格雷格·马斯特尔说，暂停进出口银行给中国的贷款是“自己害自己的一个典型例子”。美国对华出口大多通过进出口银行筹措资金，如果停止提供这种资金将会使贸易逆差更大。甚至连多尔也认为，“我坚决支持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我认为，当我们把它与人权挂钩时，我们就是犯了错误。”“取消优惠地位”将使我们美国人丧失几十万个就业机会。”在结束这一章关于经贸问题的讨论时，还是让我们重温一下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精评论述吧：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气。两个国家之间有了贸易，就彼此相互依存。”

第三章 政治：推行人权还是强权？

1. 人权外交及其历史演变

1996年4月23日。联合国第二十五届人权会议日内瓦会场。会议秘书在会场进行唱名表决后宣布：“这项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表决结果如下：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此动议获通过！”。会场上立即响起掌声，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大使吴健民面露笑容地表示，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实际上，这次中国代表团关于对西方14国“中国境内人权状况”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获得通过，是我国连续第六次挫败西方国家的人权挑战。

人权问题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大国都允诺要尊重和保护人的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社会制度和国情上的差异，各国对人权概念的解释和实施人权保护的过程都有所不同。美

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往往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帜，试图将自己的人权理论国际化，并且将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这就是美国的人权外交。

其中心思想是以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将对别国人权状况的判断作为是否与其维持良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准，将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并竭力向别的国家输出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近几年来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旗号施加压力，不公正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这里面除了对中国的误解外，我们仍有理由相信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外交怀有别的目的。

美国人权外交至少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时期。威尔逊时代的美国，经过内战后的重建和上升阶段，已经开始步入世界政治舞台。它虽有经济大国之称，并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但在政治和军事上还难以与欧洲老牌强国英法一争高低。于是，威尔逊就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提出"理想主义"人权外交来与欧洲诸强进行政治竞争。在当时，威尔逊被"公认为世界各地人权的保卫者"。作为美国人权外交的开拓者，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人权外交对后来的美国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视社会主义国家为其统治世界的主要威胁，加紧从军事上进行包围、遏制，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和限制，同时，在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竭力利用人权问题进行攻击和煽动。人权问题成了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一个焦点。

尽管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人权问题在这一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受到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但这一斗争却从未停止过。美国第33任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3月发表的全球霸权主义宣言书——"杜鲁门主义"中，极力吹捧"自由制度、议会制政府、自由选举、对个人自由之保障"，并公然号召向所谓的"极权政权"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作斗争。其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1953年宣布推行"解放政策"，后来又多次公开宣称，通过"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解体"。1961年肯尼迪就任总统时宣称要通过"和气竞赛"，依靠制度的"逐步演变"以及成立"争取进步联盟"派遣"和平队"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渗透等，来实现其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70年代末，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首创人权外交，强调把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使之成为"对外政策的灵魂"。卡特在其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对维护人权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在今天做出新的开端的时候，对美国来说，最崇高和最有雄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立一个真正人道的正义和和气的世界"。此后，他又多次表示："对于人权所负有的义务‘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项原则"，"强调人权原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灵魂中确定美国同其它国家保持什么关系的一个因素"。不仅卡特本人，而且当时的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高级政府官员，甚至总统夫人罗莎琳也在各种场合大谈人权外交，宣称人权外交是美国外交的新阶段。

卡特入主白宫时，正是美国政府内外形象极为糟糕、处境极为困难的时期。"二战"以后的美国内外政策的失误和后遗症似乎都集中在卡特任内暴露出来。在国内，水门事件、持续的经济衰退及能源危机，既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冲突，又造成人民不满，政治信用危机严重；在国外，由于美国政府长期支持世界许多地区的反动、独裁的政治势力，尤其是侵略战争失败，使美国的国际形象蒙上了无法洗去的污点。面对这种局面，卡特打出了

人权外交这一旗号，目的在于：给处于守势的美国外交加上“人权”这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成份，以扭转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利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普遍关注的人权问题来争取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国际舆论的支持。美国学者劳伦斯·肖普评论说：“人权运动给美国对外政策增添了道义方面的内容。这有助于树立一种为美国在越战后重建霸权所迫切需要的仁慈、正直和正义的形象，有助于使美国卷入和干涉世界各地的政治斗争合法化”。简言之，人权外交可以使美国摆脱越战后处于守势的地位，开始再次采取进攻性姿态。

自卡特、里根、布什以至现任总统克林顿，人权外交被作为一个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之有效的武器在全世界到处挥舞。1981年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上台后，在外交上强调美苏对抗，在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以遏制苏联的同时，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起了更为猛烈的，“人权”攻势。1985年2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的里根的一篇讲话中说：“……我们已经重新担负起自由世界领袖的历史作用，而所有这些合起来就成为维护和气的伟大力量……我们的任务是促进并捍卫自由与民主，并且尽可能向各地传播这些思想。

乔治·布什是在冷战结束之际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他在手持大棒的同时，把在国外促进民主更加明显地注入美国外交中。1990年4月布什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希望成为帮助促进全世界出现的民主变革的总统，宣布美国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布什1992年9月10日在《美国复兴日程》计划中又写到“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

克林顿在向外输出美国式的民主方面丝毫不比前任逊色，他在竞选总统时，就大谈上台后将比前任更加重视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执政后这方面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他宣称，“我已要求采取一项战略，美国应参与鼓励在国外传播和巩固民主。不能有选择地或半心半意地推行这样一种战略”。其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提出7种因素是美国出兵海外的指导原则，其中之一是“维护，促进并捍卫民主，这反过来又会加强我们的安全，并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美国政府借助其强大原经济力量，把对其它国家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加以威胁，试图迫使其它国家接受美国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尤其是对中国，美国抵制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要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强其中国在劳工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以及美国国务院历年的人权报告，都要按照美国的人权理论和标准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权状况作一番评论，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了美国的强权政治。同时也由此使人权问题成为中美之间发生争执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以上可以看到，美国的人权外交深深植根于其经济利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之中。

它始于一战以后，正式提出于70年代，80年代得到了完善和发展。从本质上讲，人权外交是美国用和气方式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在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

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气演变。"这个问题，美国一些政界要人也是直言不讳的。前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所著的《大失败》中说："倡导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以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过程。"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重视人权，并且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问题的讨论，欢迎在国际人权领域开展对话和合作，为国际人权事业做贡献。中国反对的是以人权外交干涉别国内政。

2. "输出民主"遭抵制

向外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始终存在于美国对外政策之中，输出美国政治发展模式便是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即以美国的民主制为原型，强迫与美国文化不同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向着美国愿望的方向发展。以自己的政治制度为模式而要求或强迫其它国家接受尽管也存在于别的大国或强国的外交中，但其持续性和侵略性莫过于美国对不同文化国家的外交。早在19世纪中期，一大批美国的传教士就随着美国的炮舰外交来到中国，试图把中国人民基督教化。和来自其它国家的传教士一样，他们随着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由中国的沿海城市逐渐渗透到中国内陆，在城镇和乡村购房产，建教堂，做起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文化急先锋。传教士们认为唯有《圣经》才是世上唯一的真理，所有不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来中国的特殊使命就是"拯救中国人民于邪恶和无知之中"。为吸引教徒，许多传教士往往包揽词讼，直接干预中国的司法过程，以求获得对教民有利的判决。

作为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的一部分，传教士们以"救世主"的态度来到中国，极力输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宗教，依靠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来华传播上帝"福音"，试图奴化中国人民。事实上，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从近代传教士来华之日期就开始了，并且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张而壮大，直到最后一个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中国的基督教走向"三自"的爱国道路。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早已变化的世界并没有改变美国这种"救世主"的思想倾向，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一些美国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美国是靠着其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赢得了冷战。然而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未进入太平盛世，与美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并没有从世界上完全消失，恰恰相反，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正在稳步前进。美国的决策者认为美国的文化武器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是演变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国家的有力工具。于是近几年来美国政府把传播美国价值观念和促进国外民主在其全球战略中提到非常高度，试图把一个意识多元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克林顿政府拨款3000万美元筹建"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就是其"输出民主"战略的内容之一。

从文化传播学上讲，各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有利于相互取长补短，互利进步。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吸取发达国家文化的精华，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够使本国的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平等的文化交流能够有助于文化传统相异的国家在许多问题上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同时文化交流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美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并不是平等基础上的彼此互惠的文化交流，而是一种带有强权性质的文化渗透，它不考虑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完全

以自己的标准和主观行事，其结果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文化背景与美国迥异的亚洲国家对这种文化渗透的抵制。

近些年来，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许多亚洲国家基于本国独特的文化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起亚洲许多国家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自豪感。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26届年会开幕式上作主题发言时指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传统提供了正确的个人和社会价值观，加强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因而促成了目前的惊人增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亚洲人权问题只能由各自国家来解决，西方国家国内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权对亚洲的人权问题横加指责。

近几年来，美国素来骄傲于世人的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大输出也接连受到许多国家的坚决抵制，即使在与美国有相似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欧洲也不例外。从可口可乐，麦当劳，到好莱坞"巨片"，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无不反映美国的价值观。为保护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许多国家面对来自美国的文化"侵略"积极加以抵制。据法国文化部统计，美国向欧共体国家出口的影视作品是欧共体向美国出口的影视作品的1.5倍。为此，欧洲国家严格限制电视台播放好莱坞影片的数量。在抵制和限制美国文化产品方面最为积极的法国硬性规定其全国4500家电影院所放映的影片中，好莱坞影片最多只能占四分之一，还规定法国的电视和广播节目至少有40%的时间要使用法语。

美国的文化产品在其近邻加拿大也不受欢迎。今年初，加拿大人先是决定对美国《体育画刊》杂志加拿大版的广告收入征收80%的经营许可税，继而又宣布将美国花了9年的艰苦努力才进入加拿大的"乡村音乐电视台"逐出加拿大，理由是加拿大的"新乡村电视网"将昼夜播出本国的乡村音乐节目，言外之意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在加拿大不受欢迎。

外国文化市场是美国各大影业公司赖以生存的支柱之一。好莱坞的一些高成本"大制作"大多都是靠国外市场收回成本和赚取利润，传统上看，欧洲国家是美国文化产品包括影视音响制品，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节目等的主要出口地区。在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电影进口的比例高达70—80%。欧盟成员国对进口美国影视制其实行限额制的作法真正打中了好莱坞的痛处。

据1995年美国发表的美国电影在各国进口的比例，在中国电影市场美国影片只占20%，据此美国影业公司认为和美国其它国家相比中国进口的美国电影比例较低，中国是大有潜力的"还未开发"的电影市场，今后要大力向中国进发。去年一本名叫《廊桥遗梦》的美国小说在中国旗为畅销，今年基于该故事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赚取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少男少女不少的钞票，还有眼泪。绝大多数中国青年是通过报刊、图书、电视、电影等媒介了解美国的，很多人恐怕还是通过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来了解美国，那么当今的中国年青人如何认识美国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作的一项大型调查为人们提供了答案。

为了探明中国青年对美国的看法，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于1995年11月至12月对北京、上海、山东、四川、安徽、江苏等四省二市进行青年社会心理状况调查时，设计了涉及对美国各种印象的相关题目，向三十五岁以下的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教育工作者、办事人员和大学生散发了

二千份问卷，收回了一千七百多份答卷。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青年对美国进行威胁与侵

一、美国物质富裕、国力强大

占受访青年总数 87% 的人认为"美国的物质生活富裕"，只有 4.5% 的"选择贫穷"的答案，8.5% 的人无明显感受。

分级统计显示，不同职业的青年团体的看法大体一致，认为美国物质生活富裕的科研教育工作者占受访青年总数的比例为 90.4%，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大学生所占比例分别是 90.3%，89.1、88.8%，工人的比例只有 79.3%。

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评价，89.7% 的受访青年选择"强"的答案，4.4% 的青年认为‘弱’，6% 的青年表示无明显感受。

分组统计显示，认为美国综合国力强的比例，大学生、科研教育工作者分别占 94.1%、90.2%，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分别占 88.4%、85.7%，工人的比例为 79.6%。

二、美国重视物质价值

受访青年普遍认为，美国重视物质价值，美国人敬业精神强。

在回答美国重视还是轻视物质价值一题时，70.1% 的青年选择重视，16.5% 的青年选择轻视，13.4% 青年表示无明显感觉。大学生认为美国重视物质价值的比例高于青年工人，前者为 77%，后者只有 50.8%。

三、美国文化娱乐生活丰富，但精神空虚，道德操守匮乏。

74.3% 的受访青年认为美国社会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认为"疲乏"的比例占 13.2%，还有 12.5% 的青年表示无明显感受。

但受访青年对美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多持否定态度，认为美国社会的精神生活空虚的比例为 47.8%，高于认为充实比例的 32.3%。而且不同职业群体认为美国精神生活空虚的比例均在 40% 以上。

四、美国办事效率高，但腐败也比较严重

受访青年中的 75.1 的人认为美国的办事效率较高，认为较低的比例为 9%，另有 15.8% 的人表示无明显感受。

但也有 52.5%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官员、警察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认为不太严重的比例占 26.9%，另有 20.7% 的人表示无明显感受。

五、美国充满竞争但工作不稳定

有 66.2% 的受访青年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竞争、工作稳定性较差的国家，17.5% 的人对此无明显感受。分组统计显示，大学生认为美国人工作稳定性较差的比例为 74%，高于工人的 51.5% 的比例。

六、美国贫富悬殊，吸毒严重，性放纵

调查显示，在中国青年眼中，美国是一个贫富悬殊，吸毒严重，性放纵的国家。86.25%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贫富差别大，认为贫富差别小的只占 7.2%，还有 6.2% 的人表示"无明显感受"。各职业青年群体对美国贫富分化的看法相当一致，比例均在 80% 以上。有 91.6% 的受访青年认为美国吸毒、贩毒严重，认为此种现象轻微的比例仅占 2.3%，还有 6.2% 的人表示"无明显感受"。

七、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是假，搞霸权是真

绝大多数受访中国青年对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所谓"民主"的行为持否定态度。有81.2%的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是假，搞霸权是真"。对美国国内民主、自由状况的评价，也有53.5%的受访青年认为美国社会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

八、美国政府近年来对中国不友好

此次调查还涉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调查显示，90.3%的青年认为美国政府对华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霸权的。各职业青年群体持这种看法的比例均在80%以上，大学生持这种看法的比例高达95.7%。只有2.6%的持否定意见。此外，7.1%的人对此无明显感受。

受访青年中，有93.8%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不友好。

也有91%的受访青年认为美国政府对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设置障碍。

受访中国青年对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态度也反感，83.3%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是恶意的，86.9%的人认为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另外，1995年8月，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举办了"中国青年看世界"大型调查活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30多个民族中十余万人自愿参加了答卷活动。在回答"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是哪一国"的答卷中，有87.1%答卷回答是美国。57.2%的被调查人表示最无好感的国家是美国；74.1%的被调查人认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

3. 美国社会的"现代病"

1969年美国的一位人类发展学教授尤里·布朗芬布伦纳先生应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这样说：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证明在美国社会中使人具有人性的过程正在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的标志表现在近几十年来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青年身上所观察到的日益增长的疏远，冷漠、反叛、青少年犯罪和暴力现象。这些证据还表明所有这些现象将形成日益增长的趋势并持续下去"。

在此该教授大概指的是6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嬉皮士群。他们否定既有的社会制度、物质文明、性观念等，寻求直接表达爱的方式的人际关系。他们留长发、蓄胡子，奇装异服，时常共同生活，并且吸毒。正如曾经流行的"Hippie"(嬉皮)一词一样，美国当今的青少年一代被称为"the X-Generation"，亦即"未知的一代"。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上述各种现象在美国社会已是司空见惯。随便打开美国的任何一份日报或电视频道，暴力和犯罪都构成其社会新闻的主要内容。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也在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这些现象对他们的影响。简言之，当今的美国社会出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有些(比如种族问题)是旧病复发，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道德价值观念的下降，日益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暴力犯罪的增加以及其困和无家可归现象困扰着当今的美国社会。美国社会正逐渐丧失它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未知的一代"的已知状况

衡量一个社会的未来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准是它的青年一代的品格，能

力和诚实状况。那么美国的"未知的一代"的状况如何呢？请看下面的统计数字：自1981年，美国高中学生中认为"大多数人可以相信"的人数日益减少。1981年31%的学生同意这个观点，40%的学生认为"对人再小心也不过分"；1992年，只有18%的学生同意第一种观点，而有59%的学生同意第二种观点。

1992年，超过50%的美国高中学生可能服用过毒品，只有48%左右的学生在调查时说未曾服用过毒品。

越来越多的美国高中生对他们的前途感到不容乐观。

1980年，66%的高中学生不同意"计划只能使你失望，因为事情很少按照计划的那样发生"这种说法，到1992年，60%的高中学生不同意这说法。

1990年美国一家调查机构对12000名高中学生所进行的调查表明，31.5%的男高中生和8%的女生在被调查前的一个月中曾携带手枪、刀或棍棒去上学。他们上学携带的这些武器大多是"用来防卫"。另外一个调查发现在所有学生中有44%的学生（包括女生）在1992年有打架斗殴行为。

美国社会犯罪猖獗，导致学校也难以成为避难之所。1986年，在受害者是12至15岁的青少年的暴力犯罪中，有34%是发生在学校里，另外20%是发生在去学校的路上。199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在学校并不感到安全。

一般认为美国的大城市里犯罪团伙活动猖獗，青少年犯罪严重，然而调查表明这种现象在中等城市也只是"稍逊风骚"。以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Rochester)为例，198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一半左右的年龄在13至17岁的青少年有过至少一次违法行为，47%的青少年有吸毒或喝酒行为（美国法律规定未年满21周岁的青少年不准饮用含酒精饮料），55%的青少年已有过性交行为，三项皆占的占29%。

犯罪与惩罚

自1965年至1995年的三十年间，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增长了三倍多。（美国政府对暴力犯罪率的定义是在平均每10万居民中发生强奸、严重伤害和抢劫案件次数）。

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暴力犯罪率最高，大大高于加拿大、德国、英国和日本。

美国死于暴力犯罪的年龄在15至24岁的青少年男性在每10万名同年龄段的男性人群中的比例比美国的邻国加拿大高出10倍。

自1984年到1993年间，因杀人而被逮捕的年龄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罪犯人数增加了167.9%。目前在美国因杀人而被逮捕的罪犯中大多数是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的青少年。在1993年，在所有被证实的杀人犯中，有53%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

美国旗均每10万人口中被监禁的人数大大高于其它经济发达国家。

1990年，美国旗均每10万人口中有473人在监狱中度日，高于加拿大和英国三倍多。

自1980年以来，美国监狱关押的犯人急剧增加。1995年美国旗均每10万人口中被监禁的人数比1980年增长了159%，监狱中关押的犯人的绝对人数比1980年增加了三倍，从大约50万人增加到16

0万人。犯人的激增导致美国的监狱拥挤不堪。除此以外在美国还有至少375万人处于缓刑或假释身份。

1992年，美国各州监狱开支达到202亿美元，占各州总支出的3.3%。同年，美国各县市的地方监狱开支为103亿美元。1993年在一个地方监狱关押一个犯人的一年平均费用是14667美元。

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和得克萨斯州是美国较大也较重要的四个州，同时也是美国高犯罪率、监狱人口众多以及需要建造更多超级安全监狱的州。近年来这四州监狱开支的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高等教育开支的增长幅度。以加州为例，该州1995年监狱开支与高等教育开数目相同，同为该州当年总支出的9.8%。

"美国梦"前景不妙

什么是"美国梦"？对美国人而言，他们的美国梦是一种希望和信念，主要包括两个经济上的目标：一是在初次就业到退休的这段时间内通过一生的劳动实现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使子女们受到比父辈更好的教育，挣更多的钱，从而比父辈生活的更好。然而很多美国人认为实现他们的"美国梦"的机会正在减少。199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所有被调查的父母中，只有一半的人认为他们的子女会生活的比他们更好，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美国梦"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四分之三的人认为在今后10年中，实现"美国梦"的困难将更大。"美国梦"难以实现的原因何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导致与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美国的劳动率平均增长速度由1945年至1973年之间62.2%下降到1974至1992年之间的23.8%。自1973年以来，美国全国旗均家庭实际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并没有增加。但因为收入分配不均，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根据美国人口气查局近期的一项研究，从1947年以来美国的贫富分化状况以今天为最烈。这样就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因无钱而丧失上大学的机会。对他们来讲，"美国梦"不仅是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而是正变得与他们无缘。

1990年，在美国的总人口中，大约有13%的人生活在AE 禱 f1困之中，到1993年，这比例增长到15%，并且有上升的趋势。另外，在美国官方划分的属于贫困的人口，有大约五分之二是儿童。

美国家庭状况

家庭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近几十年以来，家庭观念和结构在美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其它国家相比，美国的儿童生活在一个迥然不同的家庭环境之中。这种不同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美国单亲家庭的激增。

美国的单亲家庭占美国所有有孩子（18岁以下）家庭的23%，大大高于其它发达国家。从离婚率上来看，美国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美国旗均每1000人中有四点六人离婚，高于其它发达国家，英国是千分之三，法国约为千分之二，德国为千分之一点七，日本为千分之一点四。

自70年代以来，美国出生在单亲家庭中的年龄在6岁以下的儿童越来越多。1994年，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是生长在单亲家庭中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未婚生育现象的增加。在所有这些有孩子的单亲家庭中，由未婚母亲单独支撑的家庭占51%、离婚或分居母亲单独支撑的家

庭占 37%。

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对性所持的开放态度，导致美国社会青少年初次性行为的年龄日益提前。学生性行为已是习以为常。在一些美国大学校报的周末版上登载有怎样避孕的广告，通常整版只有这样几个大字“请使用避孕套”，即使这样，美国的少女怀孕和少女生育现象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

富裕掩盖不了的贫困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贫困以及无家可归现象在美国仍然大量存在。在美国有 20.4% 的年龄在 18 周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处于贫困之中，大大高出其它发达国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尽管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其它国家，但由于贫富分化加剧，处于贫困的家庭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地造成了生活在贫困状况中的儿童数量增加。

在过去的 20 年中，生活在赤贫 (deep poverty) 中的美国 6 岁以下的儿童比例增长了一倍多，从 1975 年的 110 万名增加到了 1994 年的 280 万名。1975 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属于赤贫，今天，生活在赤贫中的儿童占贫困儿童总数的比例已上升到 47%。从种族看，生活在贫困中的黑人儿童从绝对值和相对值方面都大大高于白人儿童，目前在所有 6 岁以下的黑人儿童中，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赤贫之中。

当今在美国的确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影响美国的未来的挑战来自于美国国内，而不是国外。这种挑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另一个是价值观念方面的。经济增长下降，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以及日益加剧的分配不均等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他们的“美国梦”并不能实现。尤其是对那些低收入的家庭和他们的子女来讲，“美国梦已变成一个神话”。对美国未来最重大的挑战是美国社会价值观念的衰落。美国《今日美国》报 1996 年 8 月 6 日所刊登的一个有关美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抽查结果表明，78% 的被调查人认为当今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念弱或比较弱：76% 的人认为在过去 25 年中，美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弱，还有 48% 的人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导致道德价值观念日益弱化的一个原因。

4. 在美华人今昔

近几年来，我国一些“留学生文学”作品（包括电影和电视剧）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一个中国穷光蛋一到美国，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变为一个富翁；一个在中国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一到美国，几乎立即就成了名利双收的大名家。这种事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实际上这一类的故事基本上是天方夜谭，正如《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夜夜盼望有狐女敲门一样，是可望但难即的事情。美国是一个有着种族平视的国家，种族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尽管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迅速提高，在美华侨和美籍华人在美国社会上开始受到尊重，但是他们在美国社会上仍然没有取得同白人平等的权利，在就业、工资待遇、职务提升以及其业经营方面仍然深受种族平视之害。在美国极为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然而大多数华人工商业者一般都是经营餐馆、洗衣店、成衣店、杂货店等等行业。近几年来，一大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留在美国，学习勤奋，钻研刻苦，成绩优异，为美国社会所公认。但是许多具有真才实学的华人知识分子难以找到适当的职业，怀才不遇，得不到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机会。尤其当美国经济不景平

时，首当票充受到排挤的便是移民。

美国人历来标榜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现在，世人每谈到人权也总要引用《美国宪法》中人生而平等的说法。然而，众所周知，在美华人一直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华人今天在美国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也是几代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起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前赴后继、不断抗争的结果！

在二百多年前，第一批“签约华人”抵达美国，刻苦营生，之后又有数万名华工进入美国西岸，开矿筑铁路，横贯加州南北的越州铁路更为早年华工血泪所凝。华人移民对美国社会贡献良多，然而却倍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迫害与驱逐。从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期间发生多起屠杀华人大惨案），到19世纪末波及夏威夷，再到20世纪初，一股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浪潮冲击美国，再造成新的排华形势。这段华人血泪史虽已成为过去，但华人在美国这个民族熔炉内，至今仍要在白种人的优越心态下生存。

美国独立宣言，人权不包括黑人、白奴、印地安人美洲东岸十三个英殖民地于1790年宣布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组合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伸张民主法治，人人品等。当然，当时所谓“人”的定义，是指欧洲裔的自由白人，连白奴也不包括在内，遑论黑人奴隶。起所谓“人”，并不包括异种人。当年所谓的人人品等，也并不包括黑人或印地安人或女性白人。独立后十四年（即1790年），联邦政府颁布了一项移民归化为美籍公民的法案，指定归化美国籍的资格，只限于欧裔白种移民。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联邦政府修正该归化美籍的法案，于1870年宣布非奴隶身分的黑人也有权归化美籍。更在早两年（1868年），通过了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条例，指出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士，均拥有土生公民权，受美国宪法保障。但对于非白人身分的外籍人士，则一字不提，没有宪法的明文保护。华人后来屡次在联邦法庭伸张自己的利益，有胜有败，关键在于法官只根据个人对宪法的见解而作决定而已。

《排华法案》在1850年，奥籍华人已经非常有系统地，大批涉洋到美国西岸谋生。当年，加州刚归入美国版图（1849年），加州又发现金矿，涌现了“淘金热”时代，吸引无数欧裔、华裔劳工到加州谋生。到了1860年，数万华工已经勤俭地在西岸开垦，他们像其他欧裔人士，是今日西岸的开垦先锋，涉足各行业——伐木、淘金、农场、捕鱼，更是建筑西部的越州铁路的主将。但是，在当年的制度下，华人在美国享受不到公民权益，他们不能归化美籍——因为他们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当年华人在美国加州是主要的纳税人（矿税），但并没有享受到任何法律上的平等待遇。远在1854年一项刑事案件中，西岸的上诉法庭就认定了华人在美国没有法定地位，华人不能在任何有关白人讼案中，出庭作证，他们的证词亦不受接纳。这等于说，如果一个白人杀死华人，如果只有华人目击者，没有另外的白人对其罪行作证，行凶者即会被无罪释放。在1879年，加州修正其州宪法，在州宪法中称华人为“人下人”，应受排斥制裁，更不给予华人任何社会地位及法律认可。在美国西岸，19世纪60年代中叶起，便发生了一连串排华暴行。

1882年，美国国会受西岸各州政客的压力，通过了史无前例的《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及华人子女入境。法案明文规定，只准华人商贾、学生、旅客及政府官吏来美国作短暂居留，更完全否定非土生的美国华人的归化权

利。

1882年《排华法案》颁布之初，美国华人人口超过13万，到了1920年的排华全盛期，华人人口已锐减至62000人。可见当年的排华措施不但非常有效地阻截了华人入境，更成功地逼使很多华人离境。美国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地方政府诸多留难华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逼使他们“归”国回华；联邦政府，严厉拒绝华人入境。总之，当年华人时时刻刻提心吊胆，面临随时受移民官员、警察等无理突击搜册查证种种苛刻待遇。绝望之余，或稍积蓄，即整顿行装回归故里。

“审口供”命断天使岛排华时代，所有入境华人都被关进移民局特设的“候审所”，在西岸旧金山有此设备，西雅图亦是如此。在旧金山，1882年至1910年，移民站的“候审所”是一座木楼，非常简陋的宿舍式建筑物，就设在“唐山码头”旁侧，华人一到埠就要住入该楼，等候“审口供”。

到了1910年，移民站搬进旧金山湾内的天使岛，也是木楼建筑。该处成为一个与世隔绝，音讯不通的移民监狱。1940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移民局官吏办公的行政大楼，天使岛移民站才停止使用。期间30年，滞留在内的华人无数，个个都要在那处等候“审口供”。

滞留在天使岛移民站的华人，超过一年时间并不稀奇。一些心灰意冷、消极绝望的，在‘天使岛’监狱的厕所上吊轻生的事件，时有所闻。

1943年11月，美国联邦政府撤销了《排华法案》。主要原因，并不是当年的美国政客对宪法或独立宣言之“人人平等”有了新了解，“人”字包括了华人或亚裔人种；而是为了太平洋亚洲区战局，当年中美两国携手向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反扑攻击，为了消灭日军战时的政治挖苦宣传——美国排华，平视亚洲人撤销的。《排华法案》撤销后，华人每年获一零五名移民配额入境美国。这个配额，包括全世界所有有五成以上华人血统的人，亦包括美国华人公民的国外出世子女在内。所以《排华法案》是撤销了，但是，在入境方面，华人受到空前的严重限制，因为，以前的公民外国子女，入境是没有配额限制的。

到了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移民法案，取消了平视亚裔的旧移民政策。新移民法例每年允许二万华人来美国，“审口供”这个专门为难华人的移民程序从此终止了。

-----附：美国华人移民大事记1785年：三位华裔海员抵达巴尔摩港，为美国首次华人入境的记录。

1815年：今日的加州，仍属墨西哥国土，华人已在此出入，经营小买卖。

1843年：美国移民局记录，记载有43位华人移民居住美国（不包括加州，当时仍属墨西哥国）。

1849年：加州归入美国国土后一年，华人人口共计780名，多聚居旧金山市附近。至1850年，旧金山市华人人口增至4018人，很多华人开始入矿区淘金。

1850年：加州颁布省例禁止华人在加省法庭有关白人的案件中作证人。排斥华人矿工的事件，在加省的吐龙县发生。

1852年：华人开始涌入美国西岸，以旧金山市为主要进口港。1852年政府统计美国华人人口为20005名，多为矿工，散布加州各地矿穴，至1870年间，占加州矿工人口三成。

1854年：加州政府向华人矿工征收"外籍矿工税"；该税款占当年州政府税收总额的一半。同年，美国联邦上诉庭判决华人在法庭没有法律地位，不能在有关白人的案件中出庭作证。

1855年：容闳在东部的耶鲁大学毕业，获学士衔，为第一位在美国拿取大学学位的华人。

1860年："中华会馆"在旧金山市成立，粤裔华人的地方（会馆）组织，成为华人社区自治的最高领导。

1863年：华工加入"越州铁路"的筑路铺轨工作。数万华工加入行列，促成了铺轨工作提早一年完毕——1869年5月10日完成。

1867年：5000名筑路华工罢工，要求加薪及改善待遇，未果，罢工不及一月便复工。筑路期间，华工死伤甚重。据1870年报道，华工筑路死亡安葬后，骸骨重达两万磅。

1868年：中美签订《平安臣条约》，劳工贸易互惠，引进大量华工加入建筑铁路网的工作。

1870年，加州人士指控妓女泛滥各大小市镇，通过"贝芝法例"，禁止败坏风气的妇女进入加省；华人妇女有证明为良家妇女才允许入境。

1872年：加州引用殖民地时代（1661年）法例禁止异族通婚，1906年此例包括华人在内，此例直到战后1948年才废止。

1877年：旧金山白人工人党发出排华口号："华人滚蛋！"力主排斥华人。

1879年：加州政府通过第二个（修订）加州宪法，其中明文抵毁华人，称华人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并支持加州各地市镇均可排斥华人。

1882年：美国联邦政府受西岸各省议员压力，通过史无前例的种族平视法例《排华法案》，明文禁止华工及其眷属入境华人移民没有资格归化入籍成为公民。法案有效期为十年。旧金山市唐山码头旁设移民站审查人入境华人。

华人就业机会受排斥，退出了城市为主的加工工业，多经营杂货、洗衣、餐馆等小生意。

1885年：旧金山华人上法庭控告教育局平视华人学童，获胜；但校区设立"平等隔离式"公立学校，曰"远东公立学堂"，专招收亚裔学童，仍不允许华人与白人同校。

1892年：美国联邦政府将《排华法案》延期十年，并敕令所有华人向政府报道。

1902年：美国联邦政府再通过法案，继续延期《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

1904年：美国联邦政府宣布无限其实施《排华法案》。促成次年中国沿海各商埠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

1909年：冯九如在美国西岸飞航成功，为首位华人飞行家，期后返回祖国服务。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移民法案：以美国本土各族人口为比例作为各国移民入境配额，中国无配额，此法案并禁止所有亚裔妇女入境美国。华人社会男女不均的现象，更加明显。

1942年：美国加入太平洋亚洲区战事，很多华人被召入伍服役。当年美军，仍是种族隔离，一连华裔陆军士兵，在欧洲战场服役。此外，后

来亦有华裔美军，在中国昆明、缅甸等地区服役。

1943年：美国国会于11月通过法案，撤销《排华法案》。每年分配105华人移民入境的配额并允许华人移民归化美籍。

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移民法案，取消族裔人口比例配额。每国均享有每年20000移民配额。此新法案执行之后，取消了平视亚裔的旧移民政策。华人移民激增。

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移民法案，增加移民配额，唯重点在于专业、科技人才的资格。并设特殊配额与香港华人，作配合1997的来临云云。

第四章 军事：中国是威胁还是被威胁？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朝野上下谈论所谓“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凡乎成为一种时尚。社会舆论为诅咒“中国军事威胁”的奇谈怪论所控制。那些主张客观评价中国军事力量的和气性与防御性的诚实政治家被迫沉默不语。最近一位亚洲学者指出：“西方人推销中国军事威胁论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在冷战后世界仅存的超级军事大国，由于某些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的渲染，竟弥漫着对子虚乌有的所谓“中国军事威胁”的恐惧，并由此产生要对中国实行全面遏制的种种主张。这不能不说是冷战后美国政治的悲哀。究竟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气的民族，还是一个有着侵略传统的民族？究竟今日中国是一个和气的力量，还是战争的力量？究竟是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还是中国一直处在别人的威胁之中？请看历史和现实。

1. 太平洋：血与火的见证

太平洋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洋。

16世纪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之命，率领船队寻找通往东方的西航路线，一路上狂风恶浪，极其险恶。经过四个月的艰险航程，渡过大西洋，到达巴西。接着从火地岛出发，进入一片新的宽阔无边的大洋。从此天气晴朗，气候温和，洋面平静如镜，一连航行几十天，都是如此。船员们不禁额手称庆，一致称这个新的大洋为E I M a r P a c i f i c，意即和气之海，这就是“太平洋”名称的来历。

麦哲伦及其船员们是幸运的。然而对于太平洋西岸经历了五千年文明的东方古国——中国来说，近百年来，太平洋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太平。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恰恰是从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入侵开始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外国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经由太平洋向中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太平洋是充满了血与火的苦难之洋，是海盗横行的罪恶之洋，是近百年中国受人宰割、欺凌、侵略、掠夺的历史见证。

1840年—1842年英帝国主义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兵力最多时海军舰船达百余艘，陆军达一万五千余人，不远万里闯入太平洋西岸，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帝国主义炮口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国家领土主权遭践踏。从此中国国门洞开，古老的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竞相侵略掠夺的对象。

1856年，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结成侵华联合阵线，再次发动了“极端不义”的对华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经大西洋而入太平洋，先后攻占广州、天津、北京。侵略强盗攻入北京圆明园，将园内大量金银珠宝和珍贵文物抢劫一空，并纵火焚烧了这座有“万园之园”之称的世界园林奇观，使这座著名的瑰丽园林化为一堆瓦砾。英国不仅割占了九龙，还与法国一起向清政府各勒索了八百万两白银，俄国也乘机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

1894年，一直以侵占中国为其大陆政策基点的日本天皇政府，在完成十年扩军计划，建成一支23万人的新式陆军和7万吨舰只的新式海军后，利用朝鲜爆发农民品义之机，派兵跨海西侵，大举进攻朝鲜和中国。在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攻击下，清军先后在黄海、辽东、威海之战中失利，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贪婪的日本侵略者迫使腐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割占中国领土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向中国勒索白银多达二亿两，这笔巨款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的三倍。

1900年，英、法、俄、德、日、美、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先后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和德国元帅瓦德西的率领下，兵力由千余人逐渐增至10万余人，攻陷天津，进占北京，并以北京为基点向山海关、张家口、石家庄、沧州四处进犯。侵略军在北京纵兵抢劫三日。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为尽”，塘沽遭俄军洗劫后，五万居民几无幸存者，通州“合城之人死六成”。战后参加武装侵略中国的俄、英、美、日、法、德、意、奥八国，加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并十一国，胁迫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各国不仅向清廷勒索了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还清，本息九亿八千万两，加上地方赔款二千万两，总额实际高达十亿两），而且各国还取得了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处的驻兵权。

1937年—1945年，与中国同处西太平洋、仅一水之隔的日本帝国主义怀着“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再次西渡，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高达200余万人。在这场侵华战争中，日军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以极端残暴和野蛮的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深重的民族灾难。八年战争中，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被日军杀死杀伤的中国人达3500万人之多。仅1937年12月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一次遭日军疯狂集体杀戮的平民就达19万多人，经慈善机构零散登记收埋的遇难同胞尸骨达15万多具，此次大屠杀共计有30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惨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

据统计在中国一百余年的近代史上，中国仅遭受来自太平洋上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即达470余次。中国的首都北京先后三次被外国侵略军武装占领和洗劫，而中国并无一兵一卒跨海侵占过别国的一寸土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新中国仍然未能摆脱外国势力的严重军事威胁和军事包围。

新中国政权甫定之际，亟需一个和气稳定的安全环境，以医治战争的创伤，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十分凋蔽的国民经济。新中国真诚地愿意与世界一切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往来。包括对美国，中国建国前后曾作出努力希望与之建立正常的双边关系。但是，中国的良好愿望与和气诚意未能被美

国所接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出于"遏制共产主义"全球战略的需要，硬把中国视为苏联的"卫星国"，推行了一条盲目敌视和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在外交上，拒不承认新生的人民政权，极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获得合法席位；在经济上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与禁运；在军事上一方面利用朝鲜战争之机，将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武装占领中国领土台湾，伙同台湾国民党势力对中国大陆进行频繁的车事挑衅，同时积极策划缔结美韩、美日、美菲、美新澳等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军事协定，构筑了一道新月形对军事包围圈，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这个包围网主要由"东北亚防御联盟"和"东南亚防务条约"集团组成。上起日本，经南朝鲜、台湾，向下延至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台湾被认为是这条锁链的中枢，而美国则居于各国之上，充当网上蜘蛛。在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指导下，美国海空军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挑衅和武装侵犯。仅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到1953年7月底，美国军用飞机先后侵犯中国领空并轰炸、扫射、撒布细菌武器共计7144批，31851架次。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公开扬言要把战火进一步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从1958年9月到1966年3月共计有443艘美国军舰361次入侵中国领海，487架美国飞机314次入侵中国领空，总共入侵中国领海、领空675次。从1958年9月7日至1971年底，中国政府就美国军舰和飞机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先后提出过496次严重警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为了达到一举摧毁新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多次策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销密文件表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事将领和部分议员多次向杜鲁门施加压力，要求对中国军队使用原子弹。杜鲁门1950年11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使用原子弹问题，"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朝鲜战争后期，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召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核武器多次作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进行了讨论。1954年当法国殖民者在奠边府面临失败时，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五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如爆发对华战争，"一开始既可以使用常规武器也可使用核武器。"1955年3月16日，美国总统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谈话称，一旦中共在金门、马祖扩大战争，美国将动用原子武器。1956年6月7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再次表示，如果与中国共产党人交战，"美国空军将有必要立刻对中国空军基地和后勤基地使用核武器。"1957年美国公开在南朝鲜部署核武器。年底，又在台湾部署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地地导弹，射程可及中国的华东、华中和华南各省。1958年8月15日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高级官员举行联席会议，军方人士主张对厦门周围6—8个军用机场实施核攻击。9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提议"向中国沿岸地区的5个机场各投一枚当量为7000—10000吨级的小型原子弹后，看看中国的反应。"事实表明，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始终面临着来自太平洋东岸的超级军事大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尤其是核威胁。

从60年代起，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之外，中国又进一步面临来自中国北部的"北极熊"——前苏联的军事威胁。终日为沙皇帝国旧梦所缠绕的前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控制中国的图谋受到中国理所当然的抵制后，反目为仇。不仅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讨债逼债，而且大规模

调兵遣将，在中苏边境集结重兵，试图以武力逼其中国就范。短时间内中苏边境苏军即从15个师激增至49个师，在数千公里的中苏边界线上，苏军百万大军压境，对中国构成战略进攻态势，中国安全环境空前恶化，随时面临着苏军向中国“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地带发动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战略突袭的现实危险。苏联领导人依仗其强大的战争机器，不断在中苏、中蒙边境制造事端，寻找全面入侵中国的借口。自60年代初期，苏联先后在中国新疆伊犁地区策动数万边民逃往苏联，苏军坦克部队入侵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围歼中国边防巡逻部队，在中国东北方向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为了解除苏联领导人的心腹之患，苏联不惜阴谋策划对中国核力量、核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所有这一切使中国再次面临着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如果不是中国人民以铁的脊梁，顶住和战胜了来自各方面的狂风恶浪，也许中国早已化为一片核废墟，或者再次沦为现代帝国主义的新殖民地。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帝国的解体，支配人类40多年的冷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本来希望从此走出冷战阴影，摆脱外部强权的威胁，以安心从事和平的建设。但不幸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旧的冷战刚刚结束，中国就成了美国发动的新冷战的主要对象。尽管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从未说过一句伤害美国人民感情的话，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美国人民的事，从未损害过美国一丝一毫的国家利益，但美国却莫名片妙地用中国代替前苏联作为美国的对立面，人为地制造一个新敌手，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遏制措施。恰如一个寓言所讲述的，尽管下游的羊从未冒犯上游的狼，但狼却仍然以羊在下游喝水弄脏了上游的水为借口，要吃掉不幸的羊。从1989年美国插手北京政治风波并纠集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国际制裁”，到数年来顽固阻挠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1993年美国出动军舰和直升机在公海上拦截和无理要求检查中国“银河”号货轮的海盗行径，到1994年窜入中国黄海水域的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对中国核潜艇居心叵测的追逐；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多尔扬言要承认台湾，到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声称要颠覆中国政府；从提升美台关系，向台出售先进武器，邀请李登辉访美，到派遣“独立”号、“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开赴台湾海峡；从紧锣密鼓地以日本和澳大利亚南、北两“锚”为基础建构太平洋三角安全结构，到积极策划建立北平阿留申群岛，中经日本、韩国、台湾，南达澳大利亚，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环中国反导弹网，中国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和帝国主义情感发作，而且是本世纪中期新月形反华包围圈在世纪末的复活。

尤岂不能不令中国严重关切和高度警惕的是今年4月美国通过修改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推动日本实现由“被保护国”向“参与国”的转变，公开与日本结成旨在应付“远东紧急事态”的新军事同盟，其矛头明显指向中国。这是冷战后亚太重新军事集团化的又一个危险信号。中国再次面临着美日的联合军事威胁。

人们知道，半个世纪前，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但是战后半个世纪以来，对这段罪恶的侵略史，日本从未有过认真的反省和清算。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野上下公开否认侵略历史，膜拜战犯亡灵，推翻和气宪法，追求军事大国的危险倾向日益抬头。文部省

一再篡改教科书，别出心裁地把赤裸裸的侵略说成是"进入"。从藤尾正行、奥野诚亮、中西启介、永野茂门，到樱井根、岛村宜伸，一个又一个内阁大臣屡出妄言。包括桥本在内的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在编辑出版的书中，声称"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训的"，"满洲不是中国领土"，"南京事件是虚构的"。社会学者清水太郎声称，日本发动战争是A B C D国家（即美国、英国、中国、印尼宗主国荷兰）包围、封锁日本引起的。前文部相藤尾正行面对当年日军在南京屠杀30万平民的血腥罪行竟狂叫"战争就要杀人，这从国际法上来说，就不是杀人"。继198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40周年之际中曾根以首相身份率领大部分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向亚洲各国人民示威之后，今年7月29日桥本又步其后尘公开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到供奉有对亚洲各国人民欠下累累血债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多名乙级丙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顶礼膜拜，公开召唤军国主义亡灵，煽动军国主义思潮，向国际社会挑战。最近又在中国领土钓鱼岛上频频制造事端，向中国的主权挑战，表现了强烈的扩张欲和领土野心。极右政治家石原慎太郎接连发表谈话，鼓吹日本丢弃历史屈辱感，再次充当亚洲中心。在全世界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拿给世界人民的仅仅是一个300多字的、毫无反省之意的"不战决议"。说穿了，日本拒不悔罪就是想重新犯罪。在复活军国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急骤膨胀，右翼政治团体，从60年代的400个，剧增至今天的800多个，其成员更以每年12万人的速度迅速递增。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桥本公开将"和气宪法"改称"日本国宪法"就是日本政治心迹的进一步暴露。近年来，日本在突破宪法第九条"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走向军事大国的道路上接连迈了三大步：先是突破向海外派兵的限制，继而对外出售武器，最近又公开与美结盟实行"集体自卫权"。与此相适应，日本军事力量急剧膨胀，自1986年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后，日本军费开支迅速增加，目前军费已高达5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的"军费大国"。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其扫雷能力居世界第一位，反潜能力仅次于美国，装备有4艘只有美国才拥有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宙斯盾"级导弹驱逐舰。主要作战舰只进一步向大型化、电子化、导弹化方向发展。为全面走向远洋，防卫厅还强烈要求国会批准建造2—3艘航空母舰，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计划将现有的4个"八八舰队"全部改编为"十九舰队"，即在"八八舰队"基础上增编"金刚"级导弹驱逐舰和"村雨"级多用途驱逐舰，实行由10艘驱逐舰及9架反潜直升机组成的舰艇作战编队。1995年出台的日军未来15年《防卫计划大纲》和1996—2000年《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把中国作为日本未来的主要作战对象之一，力图建立一支具备远洋综合作战能力的海军，"保卫日本周围200—300海里海域及1000海里海上航线"。1994年2月，日本已成功发射自己研制的第一枚大型运载火箭，并进而着手准备发射军事卫星。据新闻媒体披露，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曾秘密研制核武器。迄今仍不断有人主张日本实行核武装化。近年社会学者清水在《日本，成为一个国家吧——核选择》一书中，就代表相当一部分势力叫嚣日本要实行核武装。对于日本极力发展远远超过"自卫"需要的军事力量的异常行动和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涌动的危险倾向，亚洲各国人民无不为之忧虑和高度警惕。

但是美国不但不加以预防和制止，反而推波助澜，为虎作伥，极力把日本纳入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体系。1996年8月27日美国国会调查局拟制的题为《中国的兴盛和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代替措施》的报告明确提出重新加强美日同盟以此作为遏制中国政策的重要基础。今年四月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签署，不仅使日本的地位正式由以往的"被保护者"转变为美国军事行动的"参与者"，而且使美日安全合作范围由以往美日安保协定限定的朝鲜半岛、菲律宾、台湾以北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主要防范对象由冷战时的苏联转向中国和朝鲜，安全保障样式由防守型转向进攻型，为日本实现军事大国梦，以军事力量重建"大东亚共荣圈"发放了通行证。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透露，作为冷战后美日军事同盟的重要一环，美日还共同制定了"西太平洋导弹防御研究计划"，日本防卫厅已从1995年和1996年度军费预算中分别拨款20万美元和450万美元，进行可行性研究，以协同美国建立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由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系统、"爱国者"导弹系统、"宙斯盾"级导弹驱逐舰上的导弹系统等构成的环中国反导弹网，其主要矛头由冷战时期的苏联转向了中国。并积极将台湾纳入反导弹体系，亦即纳入亚洲在高新技术基础上复活了的新月形对华包围圈。美极力培植和纵容日本在亚洲发挥军事作用，试图在亚洲建立以美日为支柱，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小北约"，中国对此不能不表示严重关注。50、60年代美国为了开展对苏冷战，不惜对日本军国主义采取姑息、庇护的政策；而今出于对华新冷战的需要，美国又轻率地打开了太平洋上的潘多拉匣子。美打算将日本军国主义祸水西引，但美国迟早会发现，受这股祸水之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也许美国早已忘记了珍珠港事件，但日本决不会忘记广岛和长期。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将不是别人，而是美国自己。

纵观近百年中国与其他国家安全关系的演变，人们不难看出究竟谁对谁构成了威胁？究竟是中国以军事力量扬威海外，还是别的国家越洋跨海对中国大搞"炮舰外交"，推行强权政治？究竟是中国侵占了别国领土，还是别国一再踏上中国国土，把自己的安全边疆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究竟是中国影响了他国的和气和安宁，还是别的国家直接威胁着中国的生存与人民的和疲劳动？与一切"中国威胁"论者的偏见完全相反，人们看到的根本不是中国对别人的威胁，而恰恰是世界列强从过去到现在从未间断的对中国进行威胁与侵略的不光彩记录。

2. 长城：一个防御民族的象征

也许有人并不否认中国过去和现在不具有威胁性，但他们仍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军事力量也会相应增长，因此未来——也许在2020年——中国就会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重大挑战。美国国会政策报告声称：中国作为21世纪初最重要的新的世界大国而兴盛发达的征兆非常多，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的扩张将在20年内对美国构成正面威胁。这种推论更是毫无根据的。经济增长——军力膨胀——对外扩张，这也许是一切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但决不是今日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酷爱和平的伟大民族之一。历史上中华文明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与鼓励海外扩张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不同，农业文明的丰厚土壤孕育了中华民族"安土乐天"、"以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尽管中国也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战争，但几乎找

不到向海外军事扩张的战例。中国战略文化的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中国古代战争史主要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史和抗击外敌入侵的反侵略战争史。中国历代兵家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慎战”而非“好战”。中国国防思想的重心，在于防御而非进攻。历代先贤一贯提倡“天下兼相爱”，“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以兵争天下”；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已而用之”；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的理想境界。在汉字里，“武”字的原始含义就是“止戈”（制止战争）的意思，“国”字就是一口人手拿一支戈（武器）保卫国土的意思。这两个字的原始构成就反映了中华民族先民关于武力只用于国土防御，武力使用的目的在于谋求和气的战争观。蜿蜒万里，矗立千年的古老长城，就是中华民族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根本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侵略扩张的传统依据，也找不到近代美国不断开拓“新的边疆”的历史驱动力。汉唐时期，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并没有把扩张的触角伸向周围民族的生存空间，更没有对世界形成威胁，而是以“怀柔”政策、与周边兄弟民族和国家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对人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明代郑和率领船队从1405年至1433年起下“西洋”（加里曼丹至非洲之间的海洋）。每次远航，船支60余艘，每艘载重千吨以上，每次随行多达二万余人，前后二十八年，先后到达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最远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访问30余国，比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等的航行要早半个世纪以上，船队规模也是他们的几倍。但中国郑和带去的是瓷器和丝绸等，而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海外殖民地。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经指出：“中国的决策者们传统上强调国土防御战争，这与欧洲帝国主义者表现出来的商业扩张的进攻性形成鲜明对照”。西方学者还指出：“中国对自己文明的认识没有那种侵略性的使用。”应该说上述结论是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

当代中国国防政策的防御性与和气性正是中国历代战略文化传统的延续。

任何一个民族的战略思想都可以从它的战略文化传统中找到它的遗传密码。这是因为战略文化传统既不是一天之内形成的，也不是可以轻易消失或变异的。一旦战略文化传统形成，它将长平地渗透于该民族战略思维的每一个细胞之中。例如，日本的“皇国思维”并没有因大东亚圣战的彻底失败而完全消灭，迄今我们仍能在亚太地区上空看到它的亡灵在游荡。德国从1871年—1945年，除了魏玛共和国一段时间外，都是沿着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发展的，直到彻底失败。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奉行和气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发展道路，都有权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尊严、主权和利益的尊重。中国国防政策的基本目标是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捍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的国防建设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不谋求世界或地区霸权，不对外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这与“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和“以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有8次战略性军事行动，都是自卫性的。新中国的战略边疆从未超过也不会超过它

的自然边疆。

当代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的防御性与和气性不仅植根于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战略文化传统之中,也存在于坚实的现实政治基础之中。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近代中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也根除了向外扩张的政治土壤。饱受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民在经过长期奋斗、流血牺牲,赢得国家的独立后,深知国家主权与独立来之不易,深知和气与繁荣之可贵。中国人民在珍惜自己长期奋斗得来的和气与独立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更加深刻地理解别国维护独立与和平的愿望与正当权利。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它必须而且只能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有力地保障与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从事和气的劳动,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这是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唯一任务和唯一宗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任务和宗旨。如果离开了和启发展这个宗旨,把人民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权的人民性质,就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利益,就不可能为人民所接受。正是遵循这一宗旨,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排除各种干扰,制定了努力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正在逐步改变中国近百年来积贫积弱的面貌,并将最终使中华民族崛起与腾飞,再次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这将是一项长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实现这一任务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需要一个长期的和气与稳定的内外环境,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和各种资源用于经济建设,需要各行各业包括国防建设和军事力量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因此,中国最希望长起的和气与稳定,最反对动乱与战争,更不用说对外扩张战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中国不可能离开发展大局去无限发展军事力量,更不可能放下经济建设,把宝贵的国家资源消耗于毫无意义的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之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在侵略扩张上多消耗一分,人民的福利就会减少一分,民族的繁荣进步就会落后一分。这是违背国家、民族、人民最高利益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实现之前,中国不会违背这个战略的要求,即使中国国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中国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中国也仍然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在新的高度上进一步建设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争取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大国。与那些资源疲乏,国土狭小的小国、岛国不同,中国拥有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和雄厚的发展潜力。中国不缺少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各种战略资源。目前世界已知的主要矿产,中国基本上都有。截至1994年底,中国已经找到矿产168种,矿床和矿点20多万处,其中具有探明储量的矿产达151种,矿产地2.3万多处,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矿种比较齐全、矿产储量可观的少数国家之一。在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中,许多种的储量居世界前列,或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中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以中国45种主要矿产保有储量与世界矿产储量相比较,有11种占世界第一位,有12种占世界第二位。按统一的国际市场可比价格,以1994年中国矿产资源保有量潜在价值计算,中国矿产资源潜在总值为91.66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位。中国已探明煤炭储量在6000亿吨以上,居于世界前列,至少可供开采几百年。中国石油资源尚处于勘探和开发初期,已

找到1400多个储油构造，已建成一系列大型油田，海相和陆相地层中的石油资源极为丰富。仅东海海底有厚达2000米以上的沉积层，是世界上石油储藏量最大的地区之一。中国已探明铁矿储量达440亿吨，是世界上储铁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已探明储量的有色金属矿，达20种之多。其中钨、锑、锌、钾、稀土等居世界首位，铜、锡、铅、钼、镍、汞等居世界前列。中国还发现面积近一百平方公里，约有一百条矿带的特大铀矿，这对中国发展原子能工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探明储量的非金属矿产达80种之多，可供开发利用的非金属矿产地有4000余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盐国之一，仅柴达木盆地的察尔汗盐地储盐量达250亿吨，可供全世界食用2000年。此外，中国的硫铁矿、菱镁矿居世界首位，磷矿储量居世界第二位，石棉、萤石、膨润土、滑石、叶腊石、石墨、高岭土、珍珠岩、石灰石、云母等矿产资源，在世界上均名列前茅。中国渔场面积至少有15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浅海渔场面积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也是世界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光高等植物就有3万2千余种。木本植物7000多种，其中乔木2800多种，而北美洲只有600种，欧洲仅250种。中国能食用的植物有2000多种，而欧洲和美洲加起来也不过1000种。尽管中国人均占有量还不是很大，但以中国丰富的资源总量，加上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精神，中国完全可以独立地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根本没有任何必要走早已被历史唾弃了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血与火的原始积累老路，没有理由靠占领他国土地，掠夺他国资源来发展自己。即使是某些西方学者别有用心提出的所谓“粮食问题”，中国也完全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至一定程度，人口总数曲线将近于正态分布，膳食结构改善至一定程度也将趋于稳定。因此，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以及膳食结构改善对粮食需求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所渲染的那样大。另一方面，中国粮食的供给能力正在增加之中。据最新调查统计，中国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已由9.9%提高到14.1%，而且还可开垦出1亿亩耕地。随着灌溉面积的扩大，生物技术的推广，中国粮田单产在今后几十年里将继续提高。所谓中国粮食产量将下降五分之一，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只要今后中国继续稳定现有耕地面积，加快农业后备资源的开发，提高农业比较收益，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依靠科技对现有耕地中的中低产田进行改造，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加大国家对农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对浪费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下个世纪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

所以，无论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当代中国政治基础和战略意图，还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客观需求来看，根本得不出中国会对外扩张，会对他人构成威胁的结论。

中国国防政策的防御性与和气性决定了中国的国防投入始终是低水平的。中国一贯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国的兵力结构和兵力部署完全是本土防御型的，而不是外向型的。

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是抵御外敌侵略，捍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立足于在中国领土、领海、领空内歼灭来犯之敌。中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除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外，中国在海外没有派驻一兵一卒。近年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中国相对地重视海军和空军建设，但在陆海空三军中，陆军始终是中国军事力量的主体。海空军的任务也仅限于国土防空和近海近岸防御。迄今这止，中国业已装备和正在建设中的舰艇没有一艘超过

5000吨的，更不用说远洋海军了。中国国防开支始终维持在确保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限度上。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国防开支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其他大国，即使与诸多中、小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居于后列。以1994年为例，中国国防开支绝对值为550.7亿元人民币，按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计算，为63.9亿美元，仅为美国的2.3%，英国的18.3%，法国的18.6%，日本的13.9%，也低于俄国、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大体与北欧中立国瑞典相近。在相对值上，1994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1.3%，而美国为4.2%，英国为3.6%，法国为3.18%。

中国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9.5%，而美国为18.9%，英国为9.64%，法国为13.6%。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国防开支的全部总和只相当于美国近年一年的国防开支额。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公布的数据，1994年中国人均国防费仅5.3美元，列世界第87位，军人人均国防费仅2069美元，列世界第85位。按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国防费投入计算，中国仅600多美元。美国国土面积与中国大体相近，每平方公里国土的平均国防投入却为中国的50余倍，而日本每平方公里国土平均国防投入则几乎是中国的200倍。

中国如此低的国防投入，却担负着保卫960万平方公里国土，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和1.8万公里海岸线安全的繁重的国防任务，这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中国国防开支仅仅用于保卫作为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保卫人民和疲劳动的最基本的安全需求。这种需求的有限性，与某些奉行外向型战略和全球战略，垂涎他国权益的黠武主义者对军费需求的无限性，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能否认，近几年来，中国国防开支从表面数字上看，有所增加。这种增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军队现代化建设几乎陷于停顿，许多武器装备年久落后老化，不能不作最低限度的更新与补充。对此，美国国防部部长佩里也承认：“从1980年至1990年，中国的防御能力的下降相当显著”。中国淘汰陈旧的武器装备，引进少量武器装备，完全出于正当防卫的最低限度需要，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合乎逻辑的要求。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切尼坦率地说：“中国人有合法的安全需要，像中国这么大的任何国家都会有这种需要”。另一方面，由于近年中国物价上涨较快，原有国防费实际购买力大大下降，直接影响军人生活和国防建设的正常运行。1979年—1994年，中国国防费的绝对值年平均增长6.22%，而同期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年平均上涨7.7%，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中国近年国防开支实际水岂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呈负增长状态。中国近年国防费的增加，主要用于填补这一缺口，特别用于补贴人员生活费用上涨的需要。如果考虑到从1982年到1988年，中国国防开支的绝对值（未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连续7年负增长，年平均负增长率3.99%，那么近年的有限增长就更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至于有人提出的所谓预算外资金如军队农副业生产收入和武器销售收入等，这也改变不了中国国防投入低水平的基本事实。的确，自40年代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中国军队就有从事农副业生产的传统，这正是为了弥补军费不足，改善军人生活，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的一个辅助性措施。据有的学者统计，目前中国军队大约拥有600个农场，1993年共生产6.5亿公斤粮食，2.25亿公斤肉、鱼、禽、蛋和6

亿公斤蔬菜，总计值7亿元人民币，这笔收益全部直接用于改善部队生活。另据瑞典国际和声研究所(SIPRI)统计，1993年中国出口价值4.27亿美元的武器，约占美国出口武器的4%，俄国的9%。按20%的最高利润率计算，中国1993年从出口武器中最多获利0.85亿美元，部队从中所获不会超过0.4亿美元。据美国耶鲁大学学者王绍光计算，上述开支再加上军队所属军需工厂民平生产年收入6.5亿元人民币和从事运输、通信、医疗等商业服务中赢利6.12亿元(1987年数)，总共不过2.7亿美元。

这对于每年仅60多亿美元的中国国防开支来说，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今后只要不出现严重威胁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情况，中国的国防费就不会有大幅度实质性的增加。即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了，国防投入也将是十分有限的、低水平的，不会超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常需要。至于有人一夜之间巫术般地计算出中国军费开支高达一、二千亿美元，比中国全年国民总收入还要多，这样，中国12亿人每天真的只好喝“大锅清水汤”了。对这种愚人节的无聊恶作剧，正常人是不会屑一顾的。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的投入是十分有节制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非国防开支在中国处于更为优先的位置。1996年美国《华盛顿季刊》春季号一篇文章曾经指出：“如今在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作出估计时欺骗多于现实，因而讨论‘中国威胁’，既不准确也不负责任。中国军队现在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不具备直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能力。”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5年1月23日在“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论坛”开幕式上更加意味深长地说：“尽管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开支庞大，可是如果可以认为美国和日本无害并且不构成威胁，也许我们在看到中国自己的军事开支后就能高枕无忧、不做恶梦了。”

3. 和气与发展：中国不懈的追求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国，不比任何人少地更加关心本地区的安全、稳定、和气与发展，更加负责任地对待和处理本地区的安全事务。与一切“中国威胁”论鼓吹者的歪曲宣传完全相反，长期以来中国为维护地区和气，促进地区发展作出了自己的最大贡献。中国以自己的真诚努力向世人昭示中国始终是维护亚太地区和气与稳定，促进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乃至维护世界和气，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一支可靠力量。

中国谋求和气与发展宗旨贯穿于新中国历次颁布的宪法之中。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着国家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国“拥护国际的持久和气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954年宪法规定：“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现行的1982年宪法再次确定：中国将“为维护世界和气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一直面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孤立、封锁、颠覆和破坏，中国军队不得不处于经常性的临战戒备状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在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分别在1955年和1958年对部队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裁减。80年代，当冷战尚未结束，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军备竞赛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中国根据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出于集中力量加快经济建设的战略要求，突破全球性的冷战思维，于1985年5月作出

了裁减军队员额 1 0 0 万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次裁军范围之广、裁减幅度之大，为当时国际裁军领域所罕见。通过裁减，大军区由 1 1 个撤并为 7 个，全军减少团级以上单位 5 9 0 0 多个，全军削减各种火炮近万门，各型坦克 1 1 0 0 余辆，各型飞机近 2 5 0 0 架，各型舰艇 6 1 0 余艘。全国共有 1 0 1 个军用机场、2 9 座军用港口向社会开放，并将部分军事设施改为民用。至 1 9 8 7 年全军总员额由 4 2 3 . 8 万人减至 3 2 3 . 5 万人，到 1 9 9 0 年总员额进一步减至 3 1 9 . 9 万人，共裁减员额 1 0 3 . 9 万人，占裁减前总员额的 2 4 . 5 %。在冷战高潮中，中国单方面大规模裁减军队员额，充分表现了中国的和气诚意。这一行动不仅有利于缓和东西方两大集团军备竞赛势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且有助于在世界各国间逐步建立相互信赖的气氛，对推动世界和气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从 7 0 年代末开始还有计划地全面实施国防科技工业军转民。为此，从 1 9 8 0 年到 1 9 9 0 年中国投入 4 0 亿元人民币支持军转民技术改造，1 9 9 1 年至 1 9 9 5 年期间又投入 1 0 0 多亿元人民币。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从原来的单一军旗产业结构逐步过渡到军民品多种生产的模式。目前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已拥有达到经济规模的民生产线约 4 5 0 条。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民品产值以 2 0 % 的速度逐年递增。占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由 1 9 7 9 年的 8 % 增长到 1 9 9 4 年的 8 0 % 左右。目前，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已能生产 5 0 余大类、1 5 0 0 0 多种民品产品。十多年来，已有 2 5 0 0 余项国防科技成果解密转为民用。在开发民品的过程中，中国国防科技工业还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至 1 9 9 4 年已建立各类中外合资企业 3 0 0 余家。中国实施军转民，利用军工技术造福人类，不仅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而且也为世界各国在和平时期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促进和气与发展提供了成功经验。

中国政府历来反对核讹诈和核威慑政策。中国发展核武器是在受到核威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岂不得已作出的决定。中国研制和发展少量核武器，不是为了威胁别人，完全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是为了自卫，为了防止核战争，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一贯持十分克制的态度，核武器一直维持在十分有限的水平上。在核俱乐部成员中，中国的核力量是最小的。据伦敦战略研究所公布的 1 9 9 5 年—1 9 9 6 年《军事力量对比》统计，美国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和海上（或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 9 8 1 枚，俄国 9 2 8 枚，乌克兰 1 3 6 枚，法国 8 0 枚，英国 4 8 枚，哈萨克斯坦 4 8 枚，中国仅 1 7 枚。中国自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无条件地承诺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作出并恪守这一承诺的核武器国家。而作为世界上头号核大国的美国至今仍然坚持奉行以核武器为基本作战手段的实战战略，拒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根据 1 9 9 3 年克林顿政府确立的“对抗扩散构想”，美随时准备对他国包括无核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中国从未在境外部署过核武器，也从未对别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从不参加核军备竞赛，在核试验方面也始终保持克制。据美国“天然资源保护协会”1 9 9 6 年 4 月调查结果，从 1 9 4 5 年至 1 9 9 6 年 4 月，世界各有核国家和印度共进行了 2 0 4 4 次核试验，其中美国 1 0 3 0 次（大片层 2 1 5 次，地下 8 1 5 次），前苏联 7 1 5 次（大片层 2 1 9 次，地下 4 9 6 次），法国 2 1 0 次（大片层 5 0 次，地下 1 6 0 次），英国

45次（大片层21次，地下24次），中国43次（大片层23次，地下20次）。为了推动核裁军，中国支持通过谈判，争取尽早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为响应广大无核国家的要求，中国政府于1996年7月29日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主张防止核武器扩散。1992年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严格履行条约关于保障监督等各项义务，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这些方面进行充分合作。1985年中国宣布自愿将部分民用核设施提交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保障监督，并于1988年与该机构签订了自愿保障监督协定。1993年7月，中国正式承诺在自愿的基础上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所有核材料的进出口、核设备及有关非核材料的出口情况。中国的核出口遵循三项原则：仅用于和气目的；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未经中国允许不得向第三国转让。中国一贯尊重并支持有关国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自行协商、自愿协议的基础上建立无核区的要求。根据这一立场，中国欢迎非洲国家达成《非洲无核区条约》，支持有关国家建立朝鲜半岛、南亚、东南亚和中东等无核区的主张。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中国在历史上深受化学武器之害，在中国领土上至今还有大量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这些化学武器仍在危害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环境。中国是《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首批签字国，中国不生产、不拥有化学武器，中国希望人类早日摆脱化学武器的威胁，实现无化学武器的世界。中国还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生物武器，1984年，中国参加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认真、全面地履行所承担的公约义务。中国常规武器的出口也是十分有限的，同美、俄、英、法、德等国家相比，数量极小。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常规武器转让登记，并一贯坚持以下原则：武器出口应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防卫能力；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气、安全、稳定；不利用军贸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这与美国利用武器销售加剧冲突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据纽约社会研究学院的世界政策研究所1995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从1985财政年度到1994财政年度，世界有45场冲突的各方得到了美国提供的价值420多亿美元的武器。在1993年—1994年发生的严重的民族和领土冲突中，90%的冲突同得到美国武器或军事技术的一方或者几方有直接关系。

中国一贯重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积极推动建立双边信任措施。近年来，中国分别与一些周边国家进行了多层次的磋商，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中国与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对话与军事交流。中国与前苏联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协定》。中俄首脑联合发表了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互不将各自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声明。中印缔结了《在边境实际控制线保持和气与安宁的协定》。中国应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的请求，发表了关于中国向两国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1996年4月，中国与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订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协定规定：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的情况，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

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协定不针对第三国，突出睦邻友好和加强政治信任，对保持和加强亚太地区的和气与稳定产生积极影响。为了进一步增加军事透明度，中国于1995年11月发表了《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经东盟论坛同意，中国和菲律宾拟于1997年在北京共同主办建立信任措施会议。这将是首次中国首次承办关于安全问题的官方多边国际会议。它表明中国在促进地区安全对话，维护地区持久和平方面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中国一贯主张以和气谈判的方式解决与有关国家在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存在的争议，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996年5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中国政府公布了部分领海基线，这为中国与有关国家进行谈判和磋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关于南沙群岛问题，中国一直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中国最早发现和经营南沙群岛，最早对南沙群岛进行了管辖。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先后发现西沙和南沙群岛。并从此在这里开发经营，从事捕捞生产活动。公元789年（唐贞元五年）中国政府将南沙群岛划归琼州府管辖。清代乾隆（1736—1795）年间绘制的《大清天下全图》明确地把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一直为国际社会所公认。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曾于1937年3月30日侵占南沙群岛。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在收复台湾的同时，于1946年9月2日发出第10858号训令，由内政部、国防部等协助广东省政府从速接收南沙群岛。1946年10月29日，中国接收南沙群岛专员麦蕴瑜、海军上校林遵、姚汝钰率护航驱逐舰太平号、驱潜舰永兴号，坦克登陆舰中建号和中业号，以太平舰为旗舰，由吴淞起航，12月12日抵南沙群岛，进驻主岛。为纪念太平舰收复该岛即以太平舰舰名为该岛命名，并竖立“太平岛”石碑，永作标志。同时又赴中业岛、西月岛、南威岛等岛屿建立石碑。在太平岛设南沙群岛管理处，划归广东省政府管辖。本世纪60年代、70年代，美国、苏联、日本、法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集和百科全书，均标明西沙、南沙群岛为中国领土。1956年6月15日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郑重声明“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从历史上看，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应当属中国领土”，1958年9月14日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照会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郑重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8年9月4日关于领海决定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项决定。”明确承认西沙、南沙为中国领土。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级《地理》教科书明确记载“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形成的弧形岛环，构成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在本世纪70年代前，在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上并不存在争议。无论从历史依据上看，还是从法理依据上看，中国对南沙群岛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尽管如此，考虑到目前在南中国海海域划界、岛礁归属上有不同主张的现实，从维护地区和气与稳定的大局出发，从维护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传统友谊出发，中国仍然以博大的胸怀，以向前看的姿态，创造性地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力求化干戈为玉帛，用共同经济利益的纽带把争端各方联系起来，在共同开发中促进相互了解与信任，增进彼此的感情与友谊，为最终以各方满意的方式，以“双赢”的局面，妥善合理解决争端创造条件。根据这一原则，中国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有关国家进行了磋商，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相信在中国和有关国家的

共同努力下，把南中国海真正建设成"和气之海"、"发展之海"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说明，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文明古国和当代新兴大国是本地区负责任的建设性力量。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认真履行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和义务，积极推进地区的和气与发展。中国是亚太地区各国可以信赖的和气力量。中国过去没有威胁过任何人，现在没有威胁任何人，将来也不会威胁任何人。所谓"中国军事威胁"论在事实面前显得何等无知与可笑。有人一方面天天做着威胁别人的事，另一方面又无端指责别人并以这种荒唐无稽的指责为根据，遏制中国，那就远不只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无知了。

第五章 台湾：美国的第 51 州？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自有史籍以来，台湾的开拓、发展和疆域的完整统一凝结着中华民族世代代的血汗，融汇着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虽然近代史上日本帝国主义曾以战争手段，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攫取台湾与澎湖列岛，使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半个世纪之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彻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10月25日，台湾与澎湖列岛又重归中国版图。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为国际所公认。1949年以后，台湾海峡两岸政治上暂时的分离状态本属中国内政，如果不是美国干涉插手，也许台湾问题早已由两岸中国人妥为解决，至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不会像今天这样大。台湾问题之所以拖延至今，屡起波澜，完全是美国推行的把台湾当作美国在远东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政策造成的。

这也始终是横亘在中美之间，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最大障碍。只要美国一天不彻底放弃以台湾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政策，台湾海峡就一天得不到安宁，中美关系也难以顺利发展，亚太地区就始终潜伏着一个带爆炸性的因素。

1. 血浓于水

中国大陆人民开发台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万年以前的更新世纪晚期。

据台湾考古学者对1971年、1974年在台南县左镇乡发现的古人类顶骨化石研究表明，被命名为"左镇人"的晚期智人与福建清流县发现的晚期智人"清流人"体质形态相同，都继承了中国直立人的一些特性，两者存在着共同的起源。事实上，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原本相连，是大陆的沿海地区。台湾山脉走向与大陆沿海地区的山脉走向一致，都是有规律地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平行排列，台湾岛西部海岸形状与隔海相望的大陆海岸形状基本吻合。台湾海峡水深仅80米，台湾岛与大陆最近处仅130公里。台湾海峡海底河谷是在海峡还是陆地时，由陆上河谷侵蚀形成的。这些都说明台湾与大陆原本就是一体的。只是后来由于地球自转向心力作用和地壳运动，相连接部分沉陷，成为海峡。3万年前的"左镇人"就是在海峡部分沉陷之前从大陆东南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台湾的。这是迄今发现的台湾最早的住民。

台湾出土的旧石器、新石器文化遗址，其特征与同期的大陆文化遗址也十分相似。如台北县八里乡发掘的以绳纹陶为代表的大坌坑文化在大陆东南沿海各地广泛存在。高雄县凤鼻头出土的以印纹细陶为代表的凤鼻头文化和台北市发掘的圆山文化受到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马家浜——良渚文化的明显影响和福建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的浸润，同属闽台地区以几何印纹硬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古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证明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同属一脉，早在史前时期台湾就已经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生活空间"，台湾住民和大陆住民皆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与南北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有印第安人的氏族、文化以至国家存在是截然不同的。

不仅考古发现台湾的史前文化与大陆一脉相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史籍进一步证明台湾自古与大陆密不可分。二千多年前的战国初期成书的《禹贡》就有"岛夷卉服"的记载，据考证这里的"岛夷"就是指台湾。《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万余名官兵"浮海求夷洲及澶州"。据三国东吴人氏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称：夷洲在临海郡（即今浙江宁海往南一带）东南两千里，由此可以确知"夷洲"即今日台湾。隋代以后，大陆与台湾往来日益频繁。《隋书·流求传》载：公元607年、610年，隋炀帝（杨广）曾两次派人到当时称为"流求"的台湾岛。第二次率兵万余人，从广东潮州起航，经一个多月的航行，到达流求时，流求人以为是大型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可见大陆与台湾间早就存在一定的通商关系。唐宋以后，大陆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多山少田的福建，土地贫瘠，造船业却十分发达，海洋开发活动逐渐繁荣。泉州成为当时著名的海港和对外贸易中心。1975年在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残长24.2米，残宽9.15米，载重200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是大规模东渡，开发台湾的重要物质条件。南宋赵汝适著《诸蕃志》载："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又据同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载，1171年，汪大猷出任泉州知州，改变每年春季派兵到澎湖驻守，秋末撤回的办法，决定在澎湖当地造屋200间，派水军常年屯守。这说明，到南宋时澎湖已归泉州管辖，成为中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宋朝不仅有民众在那里生产与生活，宋朝政府也派出军队在那里驻守，中国政府在澎湖驻军似由此始。到元代时，民间的贸易和往来进一步将台湾与大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澎湖当时已有大陆移民1600余人。每年有几十艘商船来往于澎湖与大陆之间。澎湖已成为福建泉州地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据《元史》记载，澎湖当时有"泉州外府"之称。元代著名地理学家，曾亲自到过台湾的汪大渊在1344年前后所著台湾实地考察录《岛夷志略》一书中写道："澎湖岛分三十有六"，"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在那里"泉人结茅为屋居之"，"煮海为盐，酿秫为酒"，"工商兴贩，以乐器利"。这是有关元代台湾社会经济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大陆与台湾密切联系的确凿见证。明代虽然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政府三番五次下令"禁海"，但大陆与台湾之间仍然往来不绝。公元1402—1424年，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出访南洋各国，曾在台湾停留，给当地居民带去工艺品和农产品。至今台湾民间仍传说高雄凤山的特产"三宝姜"就是郑和留传下来的。嘉靖（1522—1566年）末年已有大陆商船、渔船到台湾北港、淡水、鸡笼（基隆）一带活动。1582年西班牙船长嘉列（F. C u a l l e）在台湾遇见一位中国商人，曾9次到达台湾收购野鹿皮、砂金，运回中国大陆。崇祯（1

628—1644年)时因"大旱民饥",郑芝龙经福建巡抚熊文灿批准,"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这是明朝政府批准有组织地大规模向台湾移民之一例。到荷兰人侵占台湾前,移居台湾岛的汉人已成为台湾早期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荷据时代,台湾大陆移民仍在逐年增加,特别是1646年清军入闽后,福建沿海战乱不断,饥荒连年,大批福建难民东徙台湾。据荷兰档案记载,1646年之前,在台移民人数近万人,二年后即1648年就增至2万人。此后300年间,大陆民众向台湾移居大约形成四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清之交,随郑成功移居台湾的军民;第二次是康熙、乾隆年间迁往台湾的渔民;第三次是太平天国年间,因躲避战乱而移居台湾的福建南部民众;第四次是1945—1949年间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的军民。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夕,在台移民总数约3.7万人。福建各县有陈、林、王、李、黄、蔡等20多姓移民进入台湾。郑成功治理台湾时期,汉族移民增加到10—12万人,除郑氏军队外,新增移民2—3万人。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由于两岸统一,再度出现大陆居民大规模移居台湾的高潮。台湾人口和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后起的一个世纪间,台湾人口增加了70—80万。1893年即日本占据台湾前两年,台湾汉族人口达507505户,2545731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接管台湾。随着国民党军队进驻台湾,又陆续有大批大陆外省籍人口移住台湾。1948—1950年迁台湾者达483373人,另外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50余万人,合计当时迁移台湾的人口共约100余万。今天在台湾的各民族中,汉族人数约占全省2100万人的98%。1946年以前他们中的80%左右祖籍福建,其中以漳州、泉州人为最多;大约20%祖籍广东,以梅县、潮州人为最多。高山族先于汉族来到台湾,现约32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构成台湾社会的主体。他们与台湾先住民一道,共同开发台湾,建设台湾,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

随着大陆民众不断迁居澎湖、台湾,中国政府最迟从宋元便开始经营和管辖台湾地区。

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海船副万户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和兵部员外郎阮临到台湾"宣抚"。1335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对此,《岛夷志略》记载曰,澎湖"地隶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职巡逻,专捕获",兼办"盐课"。自此,中国政府开始在台澎设置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明承元制,继续对台澎行使管辖权。1592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并扬言侵犯台湾鸡笼(今基隆)、淡水,为此明朝政府在澎湖"增设游兵",“春冬戍守”,同时在基隆、淡水二港驻屯军队,以防倭寇侵扰。1642年荷兰殖民者开始入侵台湾,1642年荷兰殖民者夺占了西班牙在台湾北部的据点,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盘踞38年,其实际占领区只有南部沿海的有限地区,以及北部基隆、淡水两港,而且其统治一直极不稳固。1661年郑成功亲率2.5万名大军及400余艘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郑成功在致荷兰殖民总督揆一的"谕降书"中严正指出:"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在围困9个月后,荷兰殖民总督于1662年(康熙元

年)农历二月一日被迫投降。郑成功收复古湾后,废除荷人殖民制度,改荷兰殖民者修筑的赤嵌楼为承天府,改热兰遮城堡为安平镇,设安抚司于澎湖,戍以重兵,总称台湾为东都。1662年农历五月八日郑成功病故,其子郑经、孙郑克爽相继治理台湾凡22年,史称"明郑时代"。郑氏祖孙三代在台湾实行屯田政策,兴办工商业,发展贸易,开办学堂,推动了台湾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进军台湾,郑克爽率众归顺清朝。翌年,清政府在台湾设1府3县,即台湾府、台湾、凤山、诸县(今嘉义),隶属福建省。自此,台湾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1727年(雍正五年)清政府定"台湾"为官方统一名称。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将台湾建制为一个行省,派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刘出任台湾巡抚后,广招福建、广东等地居民迁台,进行大规模开发,先后设立抚垦总局、电报总局、铁路总局、军械局、通商局、矿油局、伐木局等机构;修筑炮台、整顿防务;架设电线,创办邮电;其铁路、开矿山、造商轮,发展工商业;兴建中西学堂,发展文化教育等。其中有些项目,在当时全国尚属创举。如台湾铁路不但是全国最早的铁路之一,而且是中国人自己集资修成的。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重划全台湾行政区划,设3府(台北府、台湾府、台南府)1州(台东直隶州)3厅11县。从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到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清政府有效治理台湾200余年。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翌年3月攻占澎湖,1895年4月1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行割占台湾、澎湖等地。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广大台湾同胞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保疆卫国,光复失地,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丘逢甲等一批台籍士绅,建立挣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主国",发表《自主宣言》称"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起之后,当再请命申朝,作何办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与台湾抗日民军并肩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血战。到台南失守为止,台湾军民共毙伤敌3.2万余人,占日寇侵占初期兵力一半以上。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进一步吞灭整个中国。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严正指出:"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马关条约》属于当然废止的条约之一,日本由该条约所获得的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的领有权自中国对日宣战之日期失效。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作战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太平洋战争末期,中、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再度签署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8项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样,台湾、澎湖必须归还中国,由具有国际法效力的联合公告方式,两次正式通知了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无条件投降。正是根据以上规定,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湾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第一条明确写道"

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兹为日本皇帝、日本政府与他们的继任者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完全接受将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以上四项国际文献——《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和发表，从法律地位上确定了台湾、澎湖及其所属岛屿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法律地位得到了国际公认。1945年8月29日，即日本投降后14天，设在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任命当时的陆军大学校长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9月4日中国政府宣告：中国政府将根据有关协议，接受治理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名中山堂），接受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受降仪式完毕，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发表谈话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至此，沦陷50年的台湾终于复归于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

对于中华民族开拓经营台湾二千年的艰辛的创业史，对于台湾海峡两岸之间长期形成的血肉联系以及两岸人民反对殖民统治，追求国家统一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美国政府应当说十分清楚。不管美国政府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它出于何种考虑，也不管美国政府内部有多少种声音，至少在1950年以前美国政府的公开立场是明确的。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并促成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的签署与发表，明确承认并支持了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战后立即归还中国。从1943年开罗会议到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整个过程中，对于中国恢复行使台湾的主权与治权，美国从未提出过异议。直到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还重申美国在有关国际协议中的承诺，并称台湾已归还中国。杜鲁门在声明中说美国"要求国际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原则在目前的局势下对于台湾特别适用。……"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按照以上各宣言台湾已经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当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省的时候，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律师的疑问。这是被认为符合过去的承诺的"。2月9日，美国务院官员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在战后收回台湾从未质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过去四年中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这一立场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如果美国信守这一正确立场，也许战后中美关系史会是另一种写法，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充满曲折与迷雾。

2. "X岛"计划在美

遗憾的是，美国政治反复无常，不守信誉。

《波茨坦公告》墨迹未干，杜鲁门总统1950年1月5日声明言犹在耳，不到半年工夫美国政府就来了个180°大转弯，公开推翻了它一再

重申的"台湾已归还中国"的立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一反过去的态度，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和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同时下令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和封锁台湾海峡。继而美国第13航空队进驻台湾。1954年12月2日，美通过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进一步把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次年1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台湾问题决议案"，授权美国总统在认为需要的时候在台湾和台湾海峡使用武装力量。美国不仅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而且从此开始了不惜用武力把台湾从中国领土中永远分裂出去以达到长期霸占台湾的过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急转弯，看似突然，其实并不特别令人意外。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垂涎台湾的战略价值，企图攫夺台湾的野心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必然反映。

1544年，一艘葡萄牙船航行到台湾近海，船员们看见附近岛上山川如画，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不禁脱口惊呼："伊拉福摩萨"(Formosa)，意即"美丽之岛"。

三百年后，即1854年，胸怀拓疆之志的美国东方舰队司令佩里(M. C. Perry)率领舰队来到这座美丽的岛屿进行资源调查。富饶美丽且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宝岛使这位佩里先生怦然心动，激情难已。他一回到美国就上书美国政府力主美国"占领台湾"，使之成为"美国确保西太平洋秩序之前锋阵地"，因为"台湾在海军和陆战上的有利位置，只要美国能控制台湾也就能控制中国。"这是十年前刚刚从中美《望厦条约》中攫取领事裁判权、关税协议权、军舰巡查权等一系列特权的美国第一次踏上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也是美国萌生染指台湾的野心的最早流露。

1857年美国传教士出身的"中国通"彼得·帕克(P. Parker)在作为专使访华后也迫不及待地建议美国政府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与英、法等列强分据台湾、舟山和朝鲜半岛。

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兵临天津城下，清政府立即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同英、法侵略者谈判。美国抓住时机，急匆匆于6月18日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不仅攫取了内地游历、自由传教等权利，进一步扩大了领事裁判权，还迫使清政府同意增开潮州和台湾两处为通商口岸，允许所有美国人前往贸易。从此美国打开了进入台湾的大门。

1895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逼使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美国势力一度被排挤出台湾。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与日本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清政府聘请了一位名叫约翰·福斯特的美国政客充当法律顾问，"从头至尾在辱国条约的会议里指导北京代表们"，并"前往基隆帮助正式的领土移转"。就是这位帮助中国"移转"领土的福斯特先生，50年后他的孙子杜勒斯又在台湾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乘对日作战之机控制和占领台湾的政治欲望与野心在美决策圈内再度燃起。1937年至1940年间曾在台湾居住并环游全岛各地收集情报，后曾任美驻台副领事，有"台独教父"之称的美国情报人员乔治·基尔(George Keer)1942年初，向美国政

府提交一份备忘录，声称“中国将无法负起管制台湾的全面责任，……建议对日作战胜利后在台湾进行国际管制”。据基尔在《被出卖的台湾》这本所谓“台独”圣经”的书中透露，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海军军政学院设立了一个特别研究中心，基尔领导了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特别小组秘密进行一项代号为“X岛计划”的各项工作，旨在为占领台湾进行各项准备。其中包括：全面收集台湾情报，制定入侵与占领台湾的具体计划，培训未来接管统治台湾的“台湾临时军政府”的军政官员，以及准备各种民政手册，训练指南、作战地图和宣传材料。事实上，从1942年起这个小组就与其他军事情报机构一起策划制定了战后对台湾进行托管或使之“中立”，包括由美国或联合国托管监护以及台湾独立等各种方案。同时拟定了向台湾居民宣传有利美国插手解决该岛“最终地位”的种种方法策略。据基尔称，这一计划不仅仅是军方计划，它同时得到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腊斯克（Dean Rusk）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等一批要员的支持。“X岛”计划令人震惊之处不仅在于它把美国独自占领、控制台湾的意图和盘托出，而且在于这一计划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远未完结，中国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正在与日本法西斯进行浴血奋战的时候，在中国既不知情也未参与的情况下秘密制定的。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携手合作，共同抗日，远未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有力挑战者，美国以所谓反共需要来解释独占台湾的计划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X岛”计划不能不说是美国久有并吞台湾之意的一次彻底暴露。这一计划后来没有最终付诸实施，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领导人良心发现而放弃独占台湾的野心，而是罗斯福总统感到对日战争尚很艰巨，还需要中国战场的配合，也需要防范中国单方面与日本媾和，美国不宜走得过快过远；另外也因为海军战略进攻作战方向的辩论中，主张先攻占菲律宾的麦克阿瑟战胜了主张先攻占台湾的尼米兹。美军在攻占菲律宾后，从琉黄列岛、琉球群岛直接上了日本本土，以致使托管台湾的计划没有机会实施便胎死腹中，为此而专门训练的近千名准备接管台湾的“台湾临时军政府”军政人员也悉数遣散。当时被美海军攻占的冲绳、塞班等岛屿，在战后都遭到美国“独占性地托管”的命运。对“X岛”计划的流产，基尔深为惋惜地写道：“福摩萨人（即台湾）的悲剧，在于他们的岛屿距离大陆不够遥远，以致不能造成长久的分离，使其边境生存线免遭（中国人）骚扰。该岛一方面太小，难以独立，另一方面又太大、太富饶，难以（为美国人）遗忘。”这段话倒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矛盾心态的真实流露。

虽然“X岛”计划锁进了档案柜，但一部分美国军政要人对染指台湾从未死心。“X岛”计划一再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借尸还魂。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时，美驻台官员就表示：“台湾如愿脱离中国的统治，美国可以帮忙。”1947年8月11日至13日魏德迈作为特使来到台湾考察，8月17日他在向美国国务院递交的考察报告中称“我们看到一些征象，就是台湾人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和联合国的托管。”1948年11月2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梅上将致函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称“中国情势日恶，台湾、澎湖各岛之形势，关系日本与马来半岛间的航路，亦控制菲律宾与冲绳之间交通，如果落在不友好国家之手，美国远东地位将受损害。”1949年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白宫递交一份《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立场报告》，该报告建议：“美国基本目标是不让福摩萨（台湾）和佩

斯卡多尔（澎湖）群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为此目标，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岛屿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报告提出了四种选择方案：“（1）与国民党谈判，使之同意由美军直接占领台湾；（2）与国民党签订协议，让美国在台湾拥有‘租界或基地’；（3）支持在福摩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残余，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4）支持当地的非共产党人继续控制福摩萨，不使福摩萨成为国民党政府残余分子的避难地。”该报告还建议“应尽量支持‘台湾自治’的要求，”“为使今后能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美国还应周到地考虑与福摩萨当地未来的领导人保持接触。”（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1949年6月麦克阿瑟正式向国民党政府驻东京代表团建议，将台湾交盟军总部和联合国代管，并在此前后多次声称台湾是美国西太平洋防线中的“总枢纽”，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10月，美国国务院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由美国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军队移居海南岛，台湾则交联合国托管。上述种种建议和主张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最高决策层未敢公开接纳，究其原因主要是美考虑如果因此陷入与中国“危险的和没有止境的军事对抗”将得不偿失。其次，据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1号文件解释，美担心“若由美国占领福摩萨，不可避免地使美国被指控为‘帝国主义’，而在世界舆论的被告席上严重影响美国的道义地位”。另外，美也想看看中国能否成为阻止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东方南斯拉夫”，同时，蒋介石也顽强地抗拒美国政府分离台湾的企图。为此，美主张“等尘埃落定”以后再作打算。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向驻外使馆发出的“第28号密令”，即《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还承认“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它被日本当作‘台湾’统治了50年，然而从历史上，它是中国的。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也公开发表了“台湾已归还中国”，“美无意插手台湾问题”的声明。但是美国政府的这种暂时的并不情愿的自我约束，很快就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朝鲜战争给美提供了一个借口，即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第一步。台湾在远东地缘政治中的潜在价值及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在美国眼里迅速升值。美国总统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同时，毫不犹豫地就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为了使美国占领台湾长期化与合法化，1950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的有50多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和会中，美国不仅蓄意将抗日时间最长、蒙受损失最大的中国排斥在外，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均被拒绝，而且施加压力在《旧金山和约》中别有用心地只写“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这上半句话，而删去了《波茨坦公告》早已明确了“日本将台、澎权利交还中国”这后半句话。在美国占据台湾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极力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力图将台湾从中国永久分离出去。

1950年，美派遣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不久就要求联合国大会辩论台湾的前途问题。

1954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发生后，美一方面企图再次将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另一方面施加压力，促使台湾当局从沿海岛屿撤军。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又重施故伎，但均未能得逞。与美国政府的行动相配合，美国政治圈内，以实现台湾与大陆永久分离，以至由美国

独占台湾为目的的各种方案、建议纷纷出笼。"康隆报告"、"中台国"方案和"一个半中国"方案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杰作"。

"康隆报告"是1959年9月,由美国著名的政策研究机构——康隆学社受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委托,组织5名中国问题专家共同撰写的一份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的约稿人是美国国会,撰稿人康隆等5人均是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报告完成后由国会公开发表。该报告在台湾未来前途的问题上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具体有五点建议:一是设置台湾共和国,由公民投票方式决定;二是"台湾共和国"为联大会员国,中国、印度、日本可提议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三是美国协防台湾的义务不变;四是台湾军队自金门、马祖退出;五是"台湾共和国"成立后,其国民欲回大陆者,美国可协助解决。这份报告把美国策划台湾独立的腹案暴露无遗。

"中台国"方案则是1960年3月,美国权威的外交杂志《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在《重新考虑中国问题》这篇长文中抛出的。其要点是:第一、迫使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军,并鼓励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中立化;第二,承认中共在大陆的政权,同时继续承担保护台湾的义务;第三,台湾成为独立的"中台国"(Sino-Formosa Nation)。该文声称:"台湾人已经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美国的目标在于"帮助一个新的独立国家自然形成"。该文作者鲍尔斯为美国民主政策委员会主席和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外交顾问,几个月后出任副国务卿。以鲍氏的特殊身份,显然他抛出的"中台国"方案决不单纯是他个人的主张。

"一个半中国"方案则出自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通"费正清。早在1957年,他就曾对来访的陈启天、蒋匀田当面征询把台湾变为美国的第51州的可行性。应当说,这绝非费正清个人突发奇想,它的确反映了一部分美国人想说而未说出口的心声。1961年1月费正清公开提出由美国对台湾行使宗主权的方案,四年后,他将此方案予以修改,提出了被称为"一个半中国"的方案,即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象征性的宗主权,但前提是让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可自行加入联合国。作为学者,费正清与其他官僚人士不同的是,他在事实面前还是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不断提髙使他认识到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都是行不通的。1966年3月10日在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费正清表示美不宜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或搞"两个中国"。

无论是"台湾地位未定论"、"联合国托管论"还是"美军占领论",也无论是"康隆报告"、"中台国"方案、"宗主国"方案,还是"一个半中国"方案,无不渗透着一个不变的目标,那就是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实现美国长期占领台湾的目的,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将台湾变成美国的第51州。这一思想主导了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考虑。

70年代,出于共同对付前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改善美国在美苏全球争霸中日趋不利的战略态势的需要,美国总统尼克松以巨大的战略勇气和政治远见与他的助手基辛格果断地踏上了飞往中国首都北京的旅途,对这个文明古国进行了"改变世界的一周"的访问。在相互隔绝与对抗22年之后,尼克松与毛泽东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在1972年2月27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

异议”。美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中美建交之日期美国即断绝与台湾的官方关系，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全部撤离在台美军。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在此以前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地位，并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再次得到国际社会的完全确认。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为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十分光明的前景。事实上美国从中美关系的恢复中获得了极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

如果沿着这条明智的政策走下去，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以至世界的和气与稳定都将呈现一个十分喜人的局面。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有些人总是不甘心彻底放弃台湾这块一度到口的诱人的“肥肉”。中美正式建交不久，美国国会就设法通过了力图与台湾保持“强有力的实质关系”的《与台湾关系法》。这部美国国内法虽然客观上承认美国结束了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但又强调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保持美国抵御危及台湾的诉诸武力行为的能力。为美国日后违反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等国际法律文书，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预留了空间，埋下了隐患。

果然，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逐渐倒退。从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美就着手对台湾政策进行全面调整，试图突破三个公报，提升美台关系。美国政府蓄意打“台湾牌”，以台制华的倾向日趋明显。1991年6月和7月，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台湾前途修正案》，9月布什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专门强调与台湾保持“实质关系”问题，表明美提高了台湾在美战略结构中的地位。1994年4月，由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克林顿签署的《1994和1995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宣称，《与台湾关系法》中的某些条款比美国有关的政策声明更重要，公开以立法的方式宣布，将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公报之上。同时，美政府还突破美在中美两国建交公报中承诺的只同台湾保持“非官方接触”的严格限制，宣布与台保持“次内阁级官员”的接触，并允许负责经济、技术、文化的“内阁级官员”与台公开交往。这是冷战后美对台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通过调整，美台政治、军事关系明显加强。政治关系方面美打破不允许高层官员访台以保证美台关系不具官方性质的禁令，美台间高层官员往来不绝。1992年美部长级贸易代表率团访台并会见李登辉，1994年10月，“美在台协会”主席跨进了台“外交部”的大门。直到1995年5月克林顿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动摇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倒退。军事关系方面，美严重违反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签署后，双方达成的质量上维持1980年以前的武器性能标准，数量上每年递减2000万美元的交易额的谅解，向台出售武器数量越来越大，性能越来越先进。其中：1990年10月批准出售24架AH—1型攻击直升机；1992年批准出售10架S—70C反潜直升机，207枚SM—1标准导弹和150架

F—16 战斗机；1993 年批准出售 41 枚“鱼叉”式舰载导弹；1994 年批准出售 200 枚“爱国者”导弹。在上述武器销售中，仅 150 架 F-16 战斗机一项交易总额高达 58 亿美元，超出《八·一七公报》限额 7 倍多。美背信弃义，提升美台关系，对台倾销军火严重破坏了两岸正在发展的祥和气氛，助长了台湾当局以武力反统拒和的气焰，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更为严重的是，在李登辉访美造成两岸关系紧张之际，美第 7 舰队的航空母舰于 1995 年 12 月穿越台湾海峡，这是美 70 年代初宣布停止在台湾海峡巡逻以来第一次在这一地区炫耀武力。1996 年 3 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军事演习期间，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委员会通过使用武力“保卫台湾”的决议案的同时，美国政府再次派遣“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支航母编队驶往台湾海峡，直接以军事手段干预两岸关系，形成了 50 年代以来台湾海峡最大的军事集结和危险的军事对抗。冷战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正沿着太平洋洋底海沟危险地下滑。从 1854 年美国东方舰队司令佩里率舰登陆台湾岛到今天同样叫做佩里的美国国防部部长下令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炫耀武力，从半个世纪前美在“X 岛”计划中策划武力夺占台湾，到今天美国国会决议武力“保卫台湾”，人们不难看出其中某种历史的内在联系，和某种政治情感的阵发性发作。历史发展了，时代前进了，但是美国某些决策者总是放不下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帝国情怀，总想把中国领土台湾捏在自己的手里。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总根子。中美关系要想顺利发展，亚太地区要想保持持久和气与稳定，美国就必须痛下决心，顺应时代潮流，挖掉这个总根子。

3 . 台独：自我毁灭之路

台独从它产生的第一天气就是为美国推行的“托管台湾”，使台湾与中国长久分离的政策效命的，与美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本质上讲，它是美国为使台湾分离合法化而在政治实验室培养出来的一个畸形的“试管婴儿”。

台独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廖文毅，就是美国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海军军政学院“福摩萨小组”秘密培训的近千名未来接管台湾的“台湾临时军政府”的预备行政官员之一，是“X 岛”计划策划人、有“台独教父”之称的美国情报官员基尔（Keer）的密友。1947 年 8 月，美国特使魏德迈考察台湾前后，廖文毅与魏德迈紧密配合，向魏及时递交“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要求台湾脱离中国，交“联合国托治理事会”管理，随后又提出台湾成为“独立国”要求美国予以援助。1948 年底到 1949 年秋正当美国一部分政客密锣紧鼓策划“托管台湾”之际，廖文毅又抖擞精神，发起“密集请愿”，频频写信给美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呼吁美国和联合国尽快派兵占领台湾，对台湾进行托管，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台湾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未来主权归属。主仆之间一唱一和，此呼彼应，配合可谓默契。

从 50 年代中期起，美国就一直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在美国的支持与庇护下台独势力麇集于此，各种台独组织在美相继出现。如 1956 年 1 月林荣勋、陈以德、李天福等人在费城成立的“三 F”（Free Formosans Formosa，即“台湾人的自由台湾”），1958 年 1 月“三”解散后，其成员在纽约组成的“UFI”（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即“台湾独立联盟”），1965 年 3 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成立的“台湾问题研究会”，1966 年 6 月

在费城由UFI等台独组织合并而成的"UFAI"(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 即全美台湾独立联盟), 1970年1月15日在美国成立的"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简称"台独联盟"), 1972年12月26日在纽约成立的"台湾基督徒争取自决协会", 1974年9月成立的以美国纽约为总部的"世界台湾同乡联谊会"(简称"世台会"), 1979年12月上述台独各派联合成立的"台湾建国联合阵线", 1980年4月24日在美成立的"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 1982年11月在美国成立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等等, 形形色色的台独势力, 五花八门的台独组织都纷纷投奔到美国的羽翼之下, 从事分裂中国, 出卖台湾的阴谋活动。这帮分裂主义势力在美国不仅得到了包括美国国会议员等政界、财界人士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而且在政治上得到了美国政府官员的鼓励与煽动。台独的重要代表人物彭明敏逃离台湾, 据媒体披露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幕后策应与指挥的。1972年4月1日, 华盛顿的台独分子在林肯纪念堂前举办"台湾自决民众大会", 彭明敏在两名美国警察保护下出席演讲。台独的外围组织"世台会"1976年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第二届年会, 美国总统福特特地致电祝贺。

1978年12月16日台独分子在明尼芬达州的双城集会, 该州共和党众议员达尔夫妇出席捧场, 在致词中声称"如台湾人民能有机会自决, 选择独立, 本人将马上支持给予新而独立的台湾共和国以外交上的承认。"1982年11月, 彭明敏等人品凑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一成立,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佩尔便立即向美国国会推荐。1983年8月, 美众议院外委会召集人索拉兹竟跑到台湾公开煽动台独分子要"为更广泛的民主而冒险", 直到1995年民进党在华盛顿开办"办事处", 美国不少头面人物还纷纷前往祝贺。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不仅把台独分子引为上宾, 而且公开为台独分子撑腰打气, 1995年7月公开扬言"我要提议承认台湾是一个自由国家", "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管这样做会引起华盛顿和北京"出现什么样的磨擦"。完全可以说, 正是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要人对台独的怂恿扶持, 为台独的泛滥注入了生长激素。

客观地讲, 在蒋氏父子统治时期,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对于台独活动, 台湾当局还是警惕的, 反对的。台独组织在台湾被视为"非法叛乱组织", 凡属白独言行, 当局都援引《刑法》100条, 以"意图破坏国体, 窃据国土, 或非法变更国宪, 颠覆政府"等"内乱罪"予以严厉取缔和坚决打击。如1964年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与其学生谢聪敏、魏廷朝起草《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提出"推翻国民党政权""成立独立国家"等8点主张, 彭明敏因此被捕入狱, 被判8年徒刑。1960年初到1961年春台北市商人廖启川密谋"台独起义"事泄被捕, 被判有期徒刑12年。1961年云林县议员苏东启密谋夺取军队武器, 试图武装独立, 被侦悉, 苏东启等被处无期徒刑。此案受刑达50余人。1962年高雄炮兵学校候补军官第13斯学生施明德等秘密成立"台湾独立联盟", 台"警备总部"以"叛乱罪"将其逮捕, 判处无期徒刑。1962年台湾屏东人陈志雄密谋成立台独组织"同心社", 事泄被捕, 陈志雄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处以死刑。1964年台北人吴明丸、基隆人杨国太在金门劫取蒋军枪支, 准备建立"台湾民主共和国", 被判死刑。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 台湾岛内破获多起台独案件, 被捕判刑者数以千计。这些案件的判处是否公允, 有无借反台独之名行排除异

已之实，有无冤假错案，暂且不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蒋氏父子对于台独从不姑息。

在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种种使台湾与大陆永久分离的主张，台湾当局也进行了抵制，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

在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国在战争威胁失效的情况下，试图说服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划峡而治"，或把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均遭蒋明确拒绝。1955年3月23日，蒋针对英国提议台放弃金门、马祖的意见表示：美国不应同意英国的意见。不论美国是否加入防守金门、马祖，他们都不应该企图强迫国民党放弃它们。他甚至说："我们将不对任何压力屈服。" "若因我们退出大陆，便以为我们将撤退马祖、金门，那是一个错误"。

在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战争边缘"政策再次破产，美极欲与大陆"脱离接触"，压蒋放弃金、马，以实现长期占领台湾的目的。1958年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获得"相当可靠的停火"，那么继续在金门、马祖这些岛屿上"保持这些为数不少的部队就是愚蠢的"。为了迫使蒋介石撤兵，杜勒斯还表示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义务"，美国"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对此，蒋立即作出反应。第二天蒋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反对从金马撤军或对沿海岛屿地位作任何改变，称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台湾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他"。据宋美龄1986年底撰文回忆，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秘密派遣好几个特使到台湾，"鼓励我们自金马撤退"，并且"希望此一想法很快成为蒋介石自己的想法"，但蒋明确地指出："无论有无美国协助，他都会坚决固守这两个外岛"。鉴于在坚持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大陆和台湾具有共同点，在金门炮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了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打半停，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的对式，既保持一定军事压力，不给美以撤兵口实，又网开一面，"使金门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传递政治信息，援助台湾当局，粉碎美"划峡而治"，使台湾最终脱离中国的战略企图，1958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毛泽东强调：我们同蒋介石都反对两个中国，都不放迫使用武力。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对于我们来说，不收金、马，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光是金、马蒋军，也不致开对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品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下达命令，决定对金门的炮击再停两个星期，以便金门军民充分补给，命令中说"这不是诈，这是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1958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在向党内发出的《关于当前对美斗争的通知》中指出："我们宁可台、澎、金、马多留在蒋介石手上一时期，决不能让美国拿去"。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同他的秘书林克谈话中也指出："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内，海峡两岸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原则问题上已达成某种共识和默契。以

至在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国不得不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不幸的是，自80年代末李登辉执掌台湾权柄以来，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急剧后退。李一上台就对大陆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以所谓“一国两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为基点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试图在一个中国的名义下将海峡两岸的“主权”与“治权”相分离，淡化主权，突出治权，着意谋求台湾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搞事实上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曰“独台”。为此台湾当局一方面接过台独运动的政治主张，对内修改“宪法”，让台湾省省民“直选总统”，时外大力推行所谓“弹性务实外交”，在国际上搞“双重承认”，开拓所谓“国际生存空间”，力图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实；另一方面放台独势力出笼，借助台独将力推动岛内政治本土化、独台化。在台湾当局独台政策的鼓励与召唤下，栖身海外的各派台独组织掀起“还乡运动”，纷纷“迁盟返台”，与岛内台独合流，致使台湾岛内台独势力迅速膨胀。1990年6月28日到7月4日，台湾召开“国是会议”，李登辉以个人名义邀请“FA P A”（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重要成员彭明敏、陈唐山等人回台“共商国是”，此时彭明敏尚是列在国民党“黑名单”上的通缉犯，彭明敏以此为由拒绝与会。直到1991年6月4日，台湾当局“高检署”正式宣布撤销对彭的通缉令，这位“台独理论之父”才大摇大摆地回到台湾，成为李登辉的座上宾。随着台独重心由海外移向台湾本岛，台独活动也由“言论”上升到了“行动”阶段。1989年11月台湾县、市长、增额立委、省市议员竞选展开，台独势力积极参选，在780万选其中，获得260万张选票，并夺得6席县、市长，21席增额“立委”和37席省、市议员，标志着台独势力在争夺台湾权柄的道路上急剧迈进。1991年10月13日民进党悍然通过“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建立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订新宪法”的“台独党纲”。尽管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声明谴责民进党把“台独条款”纳入党纲是一项不负责任祸国殃民的行为，表示“坚定支持政府依法严办之决心”，但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比喻这只不过是“5岁的小孩乱说话”，似不必介意，所谓“严惩快办”最后也不了了之。为了利用台独势力，说出台湾当局想说而不便于说的话，想做而不便于做的事，1992年5月15日，台“立法院”对以“内乱罪”惩治台独活动的法律依据“刑法”第100条进行了修改。修正案于通过后次日上午以“最速件”送交“总统府”，“总统府”以“特速件”“火速配合作业”，于收文当晚即予公布。

这就为台独活动解除了禁令，使台独活动完全合法化了。台湾当局放纵台独势力，利用台独势力为起鸣锣开道，风助火势，火借风威，互相勾结，唱开了分裂中国，分裂中华民族的双簧戏。台独关于“直选总统”“独立实体”“务实外交”等一系列政治诉求几乎完全由台湾当局替他们付诸实施了。台独势力与独台为主流的台湾当局事实已经合流。1994年4月李登辉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中毫不掩饰地渲泄“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声称自己“22岁以前是日本人”，“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主权这二个字是危险的单词”，“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把台湾省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份是奇怪的梦”，宣称自己是《出埃及记》中的“摩西”，负有带领台湾人“出走”的使命。李登辉已完全把自己置于中国人之外，甚至自外于国民党人。无怪乎民进党前主席黄信介说“我（民进党）搞台独，他（国民党）搞独台，他只做不说，我们只是比较老实，说出来而已。”至此，两股势力，

一阴一阳，一明一暗，异曲同工，使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日益恶化。

台独和独台势力的泛滥严重威胁着台湾的政治前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威胁着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与稳定。这是对包括台湾2100万人民在内的12亿炎黄子孙的严重挑战，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前途的挑战，是对地区和世界和气的挑战。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曾经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进行过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决不能容许任何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罪恶企图。

第一、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长期执著追求的崇高目标，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民族的愿望，是极起神圣的民族感情，决不容许任何人亵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伟大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在开发自然、抵御外侮的斗争中，形成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血浓于水的骨肉深情。这是千百年来中华各民族在民族家庭中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坚强纽带，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迭经劫难而不衰的强大动力和重要保证。在中国历史上，纵然出现过民族之间或民族内部的割据与分裂，但中华民族都始终把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当作自己神圣的责任，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如果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算起，两千年间，分裂时间充其量只占这段历史的三分之一。每次短暂的分裂后，总是复归于统一，而且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规模越来越大，统一的程度越来越高。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世代追求的崇高目标和历史发展的主流。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能够承担起导致国家分裂的千古罪责，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在导致国家分裂之后能够逃脱历史的惩罚。腐朽的分裂势力最终总是被历史所抛弃。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统一，这种民族感情什么制度也改变不了。台湾不是哪一个人的台湾，也不是哪一个小集团的台湾，确切说也不只是台湾2100万人的台湾，而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2亿中国人民的台湾。任何人如果能把台湾作为私产，从中国分裂出去，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公敌，就是汉奸卖国贼。所有炎黄子孙，包括大陆12亿人民，台湾2100万人民以至5900万海外华人是决不会答应的。

第二，台湾是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扼守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战略枢纽，是确保大陆安全的海上屏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人民绝不会容许任何分裂主义势力和外国势力窃踞台湾，把台湾变成威胁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反动据点。台湾作为大陆的海上前哨，位于东海大陆架的东南缘，东北邻接琉球群岛，南经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延海峡与菲律宾相望，西部与福建最近距离仅130公里，处于西太平洋阿留申群岛、日本诸岛直到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诸岛构成的岛链的中心位置和这条岛链向西最靠近大陆的突出部，不仅扼守中国南北交通要冲，而且是控制西太平洋的战略咽喉点。它历来与大陆唇齿相依，互为拱卫，攻防一体。台湾离不开大陆，没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作为依托，仅台湾一岛孤悬海外，在太平洋的惊涛恶浪中只能成为霸权主义者的猎物，只能听任列强侵吞瓜分，重演昔日沦为殖民地的历史悲剧。同时，大陆也离不开台湾，一旦台湾沦于外敌相分裂主义势力之手，台湾不但失去了屏障作用，使中国大陆大门洞开，整个海上战略防御纵深顿失，而且台湾将进而成为外敌进攻大陆的跳板和据点，形同长在大陆腹部的一个毒瘤，严重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中国人民绝不会允许这种毒瘤的存在和扩散的可能。

第三，台湾和台湾海峡不仅事关中国的安全而且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在当代的复兴与腾飞。对于分裂主义势力和外国势力利用台湾窒息中国的经济发展，扼杀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任何图谋中国人民绝不会听之任之。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曾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的重要原因。只有保持统一局面才能为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融合创造必要条件，使社会发展、国家繁荣和民族昌盛成为可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南北大运河的开通等，都是与国家的统一分不开的，很难设想，一个真正富强的中国会是一个分裂的中国，一个真正繁荣昌盛的中国会是一个主权和领土破碎的中国。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争夺下个世纪战略主动权的激烈竞争，全体中华民族子孙再次面临严肃而且不容回避的历史抉择，是统一，还是分裂，是进步，还是后退？只有统一起来才能集中华民族之合力，迎接时代的挑战；而两岸分裂的唯一结果只能使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资源徒然消耗于对立和战乱之中，痛失发展时机，最终失去中华民族在下个世纪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应有地位。尤其是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大陆与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与窗口，是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生命线。一旦分裂主义势力和外敌控制台湾，就扼住了这条生命线的咽喉，中国大陆将完全被封闭在台湾海峡以西的内陆地区，不仅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窒息，而且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将遭到扼杀，永远化为泡影。

这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重大威胁，在这个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根本问题上，除了以鲜血和生命战斗到底，全体中华民族子孙没有任何后退的余地。即使为此中国要被迫暂时放下经济建设，经济发展为此要推迟五十年，一百年，也只能作此抉择。

面对全体炎黄子孙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坚强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当局一个时期以来虽然口头上不再公开以"独立"为诉求，但在骨子里仍然存在种种"独台"幻想。最近台湾当局就公开声称：要进一步推行"中国大陆最害怕"的三个"战略"：提升武力，开展"务实外交"，推行"民主化"。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就是台湾当局企图进一步扩张军备，以武力保独，进一步拉拢某些国际势力，借外力保独，进一步强奸民意，平民保独。显然，这都是一厢情愿自欺其人的幻想。

首先武力保不了"独"。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每年都编列数百亿新台币向世界各国采购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向美国采购150架F—16战斗机、42架AH—1W"眼镜蛇"攻击机、26架OH—58观测直升机、4架—2空中预警机，DET160辆M603战车、200枚"爱国者"导弹、1600余枚"毒刺A"导弹、100枚"地狱"导弹，3艘远洋拖舰、4艘MSO远洋扫雷舰、150枚MK46小型鱼雷、41枚"鱼叉"式反舰导弹、10架70SMI反潜直升机、租借9艘"诺克斯"级护卫舰和两艘"新港级"登陆舰；向法国购买60架"幻影"2000战斗机、960枚"迈卡"式空空导弹，550套"西北风"便携式防空导弹、480枚"魔术"导弹、2000枚"云母"导弹，6艘"拉法叶级"护卫舰；向德国采购4艘MWV—50级扫雷舰，36辆狐式装甲车；向荷兰购买2艘潜艇；向以色列购买40架"幼狮"型战斗机。此外还投资2000多亿新台币自己研制生产"经国"号(IDF)战斗机、第二代舰、48装甲车和MH"雄风"、"鹰式"、"天弓"导弹等，简直把台湾岛变成了一座火药库。这种疯狂采购无异于一种自

杀行动。如果有人想凭借这些武其实行"独立",除了加速分裂主义者的自我毁灭过程没有任何作用。中华民族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决心是任何洋枪洋炮挡不住的。即使某些分裂主义者能凭洋枪洋炮顽抗于一时,也逃脱不了最后灭亡的厄运。当年康熙能以2万清军230艘木制战船一举攻占澎湖,统一台湾,今天如果有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把握、有决心把猎猎战旗插上台湾岛。中国人民一向有以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原子弹的传统,即使坐原始木舟,12亿军民万船启发,八面围攻,也一定能渡过台湾海峡,把分裂主义者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彻底解放台湾。何况台湾作为只有3万平方公里的岛屿,与大陆人口之比为1:60,面积之比为1:300,战略纵深短浅,作战地幅狭小,且战略资源匮乏,产业结构脆弱,能源供应不足,生计依赖进口,根本不具备以武力与大陆12亿人民抗衡的条件。仅就1993年台湾全年消耗能源计,95%以上依靠从中东等地区运抵,全岛生产总值的80%来自对外贸易,进出口货物绝大部分经由海上运输,少量高价位产品依赖空运,现有油轮16艘,矿砂船15艘,商船队共有8条定期国际航线,2条不定期航线,高雄、基隆两大商港占台总装卸量的91.1%。早有分析家指出,一旦台湾海峡海域遭致封锁,即使是局部短暂性的能源进口中断,都会对台造成无与伦比的冲击,导致社会动乱,民心浮动。即使如有些谋士提出的改变能源供应结构、增加原油煤炭等战备存量,扩充船队,机动变更航道也难以从根本上医治这一天生痼疾。台"经济部"次长也曾坦率承认:一旦危机出现,台湾粮食可维持7个月,但煤炭只可维持73天,汽油2个月,医药1个月,电力大约60天。不要说两岸开辟战端,就是关系紧张下去,房地产股票不稳,什么"基金"也托不了市,人心不安之下,金融风暴随时可能发生,"亚太营运中心"无法启动,工业升级受阻、外贸锐减,威胁日后生机。以这种不堪一击的脆弱基础,试图凭港武力独立割据简直是痴人说梦。

其次,外力更保不了"独"。自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仍有少数非洲和美洲国家与台湾保持着所谓的官方关系,但要靠这些国家来支持台湾某些人从事分裂活动,实在无能为力。真正有资格、有实力而且有可能充当台独后台老板的一是美国,二是日本。美国某些人历来觊觎台湾,这已不是什么新闻,而日本军国主义从未放弃分裂以至并吞中国之心。一直到今天,美日都在或明或暗地为台湾撑腰打气,支持台湾当局与大陆分庭抗礼,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台湾某些民族分裂主义者也始终把美日的支持当作他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幻想在美日的羽翼下有朝一日建立小朝廷,正式"告别中国"。这些分裂主义者又一次打错了算盘。美国和日本某些当权者虽然一直在幕后插手,岂不及待地希望看到台湾的独立和中国的分裂,但一旦需要他们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而且这种代价远远超过其支持分裂活动所得时,他们就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得失了。当年出于对苏冷战的全球战略需要,美日先后忍痛与热恋中的台湾当局"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明证。未来一旦某些民族败类窃踞权位公开宣布台湾与中国决裂,中国人民不得不举起正义之剑挥师东征时,有谁能相信美国或日本当局会置国家的重大战略利益于不顾,只是为了几个汉奸的一己私利而与12亿中国人全面对抗呢?又有谁相信把自己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美国士兵会不远万里跑到台

湾海峡为台独分子不负责任的行动白白送死呢？退一步讲，即使真的像台独分子们所希望的那样，美、日的某些决策者一时利令智昏，不惜出兵台湾海峡与中国一战，那也救不了台独的命。历史早已证明，中国人民向来有为了真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了祖国的尊严，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即使一只温顺的绵羊也会变成一头无敌的猛狮。蒙哥马利元帅就说过，不要进攻中国，这是战争的禁律之一。像中国这样的伟大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当年日本帝国主义打破禁律发动甲午战争，曾得逞于一时，全面侵华战争初期也曾踌躇满志，但最终还是被彻底扫出中国大陆，并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中美之间也曾不幸交手，结果以美军退出“三八”线和印度支那半岛而告终。在美国军事史上，中国是美国在战场上唯一未能击败，也不可能击败的对手。50年代毛泽东曾经说过一段名言：“帝国主义侵略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个警告对一切分裂主义者和外国敌对势力都是适用的。

最后，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欺。民主化决不是台独化，台湾当局某些人试图打起“民主化”的幌子推销分裂主义的私货，愚弄民众，强奸民意，这也是不能长久的。台湾2100万同胞的心永远和大陆12亿同胞的心连在一起，血管里流的都是鲜红的中国人的血，胸膛里跳动的都是火热的中国心。虽然由于长期的隔绝和台湾当局的某些欺骗宣传，其中有些人对大陆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对大陆实行的社会制度和某些具体政策也不完全同意，甚至还有一些历史的积怨，但这些都并不妨碍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的关心。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决不会允许民族分裂主义者在岛内胡作非为。就在台独势力在台湾当局的怂恿下日渐猖獗之时，我们也同时看到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投入揭露、批判、反对台独逆流的正义斗争，越来越多的人从台独分子的欺骗宣传中清醒过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与台独势力拉开了距离，不久前在岛内“大选”中，以台独为诉求的民进党遭到惨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欢迎岛内的真正的民主化，而反对有人借民主以售起奸。我们相信岛内爱国力量终究是多数，岛内民众觉醒和真正的民主成熟之日便是最后敲响台独丧钟之时。

4. 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事实说明，美国至今不肯放弃对台湾事务的干涉是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源，也是中美关系时期时伏，难以正常发展的症结所在。

美国一天不从台湾彻底松手，台湾问题一天得不到和平解决，台湾海峡地区就始终存在台独势力和某些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事端引发地区危机的可能性；美国一天不从台湾彻底松手，台湾问题一天得不到和平解决，美国就会始终为台湾这个沉重的包袱所累，就始终存在被人拖下水，堕入战略陷阱而难以自拔的危险；美国一天不从台湾彻底松手，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美国同12亿中国人民的疙瘩解不开，中美关系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太平洋两岸这两个具有巨大的共同战略利益的伟大国家就走不出猜疑——磨擦——冲突，再猜疑——再磨擦——再冲突，从而危及两国根本利益，危及地区乃至世界和气与稳定的怪圈。

只有早日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才能真正甩掉包袱，获得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动地位，才能最终消除亚太地区的这个危机爆发点，才能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越来越重要的安全利益与战略利益。

台湾只有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才能有稳固的政治地位，才能真正享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国际尊严和广阔的活动空间，才能从大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从根本上克服市场狭小、资源缺乏、国际竞争力日渐减弱的天然缺陷，才能集两岸合力迎接世纪性的挑战，真正成为亚洲和西太平洋经济发展的新星。

只有早日实现台湾的和气回归，中国才能真正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才能早日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伟业。

可见，台湾问题早日解决对各方都有利。

然而，作为中国的内政，台湾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舍此没有第二条办法。美国如果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他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什么也别做，让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台湾，不但无助于两岸的直接沟通，反而会导致台湾问题的更加复杂化，更增添和气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

为了尽快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的和气统一，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表现了极大的和气诚意和对台湾同胞的骨肉深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国民党势力退踞台湾，海峡局势处于国家内战的延续和战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交叉点上，形成极其复杂的斗争局面。鉴于美军占领台湾，扶植国民党当局与中国大陆为敌，中国政府基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除了坚持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外，别无选择。

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定，国际紧张形势有所缓和。为此，中国政府开始考虑“争取和气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在万隆会议上，中国政府在提出同美国谈判以缓和海峡局势的建议的同时，向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国共举行谈判，以和气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倡议。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气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气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气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它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7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提出：国共可能第三次合作，解决统一问题。他说：“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离谈，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50至60年代国共两党通过秘密渠道，曾经就第三次国共合作，和气解决台湾问题有过多​​次接触。据有关资料披露，1956年春，经毛泽东同意，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与国共双方均有私交的章士钊先生携带中共中央致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通过《香港时报》负责人许孝炎先生转交蒋介石先生。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也就是被称为实现中国统一的“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即台湾必须回归中国。“四目”即：第一，台湾回归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员人事安排悉委于蒋；第二，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发展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商定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做破坏对方之举，以利两党重

新合作。信结尾处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蒋介石收信后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1957年选派“立法委员”宋宜山自香港抵京就国共再次合作问题与周恩来、李维汉等进行了商谈。5月宋返回香港即向蒋递呈万言报告书，由于宋在报告中对新中国成就颂扬过多，蒋深为不悦。两党谈判暂时搁浅。

1965年，蒋介石在台北会见长期往来两岸之间担负传递两岸信息任务的曹聚仁。经过密商，拟定国共双方均表同意的六项条件，即：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权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起，期满再行洽商。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本来，按照上述协商结果，两岸关系将很快出现突破性进展，统一祖国大业不日可成。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进程中断。

进入80年代，大陆逐渐恢复被十年“文革”打乱了的秩序。两岸关系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1981年9月30日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具体方针。其要点是：1、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2、实行“三通”（通邮、通商、通航），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3、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及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台湾民众可移居大陆，来去自由；8、欢迎台商回大陆投资，保证其合法权益、利润；9、欢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是。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提出了用“一个国家，两个制度”的构想，实现中国统一的“六点意见”，这六点意见的基本精神是：1、和平统一，核心是统一；2、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不同意台湾“完全自治”3、台湾可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司法独立，享有终审权，并可保留军队，但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4、台湾的党、政、军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给台湾留出名额；5、和气统一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6、举行两党起等会谈，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

1995年1月30日在中共中央台办举行的新春茶话会上江泽民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气统一进程的八点主张，即人们通称的“江八点”。这八点主张的要义是：1、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气统一的基础和前提。2、对台湾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不持异议。3、进行海峡两岸和气统一谈判，作为第一步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4、努力实现和气

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迫使用武力，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5、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两岸共同繁荣，造福中华民族。6、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气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7、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做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8、欢迎两岸领导人相互访问，共商国是，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办，无需借助国际场合。

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和气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是真诚的、一贯的，所提政策、主张也是合情合理、宽容无私的。在这一和气统一政策的感召与推动下，近10多年来，由于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两岸关系冲破重重阻力，取得了积极进展。台湾同胞于1986年底、1987年初兴起的声势浩大的“返乡探亲”活动，打破了两岸近40年的人为隔绝状态，迄今台胞每年回大陆探亲、旅游、观光的人数在百万人次以上，台湾官员对大陆的“考察访问”接踵不断，两岸学术、文化、科技和体育交流日益频繁，两岸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两岸间接贸易从1979年不足0.8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5.2亿美元，1995年更激增至21.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39%。台顺差100多亿美元。1995年台湾对大陆出口总额占台整个出口总额的23.44%。大陆已是台湾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台湾是大陆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据统计，截至1995年底，台湾到大陆投资的大小企业共有3.1万余家，实际投资金额.5亿美元，协议投资金额27.6亿美元。所有这些对于促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密切双方的同胞情谊，营造有利于统一的良好气氛，推进和气统一进程无疑是积极的、富有成效的。

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领导人，如果他真正富有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真正关心和尊重别国的人权与国权，真正关心世界的和气与稳定，那么他一定会满腔热情地欢迎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在和气统一道路上所取得的每一个新进展。

然而美国却不是这样，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和行动令人十分失望和不解。

人们不解的是既然美国十分关心台湾问题的和气解决，为什么又一再违背中美之间签署的三个公报，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支持台湾当局以武力与大陆相抗衡，甚至直接将航母开到台湾海峡，向中国大陆示威，毒化两岸祥和气氛，加剧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呢？既然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为什么又不断提升美台之间事实上的官方关系，极力扶植台独势力，纵容台湾当局的独台倾向，公开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呢？既然美国开口闭口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力图将中国纳入西方的所谓“国际体系”，为什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却不讲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以美国的国内法否定或凌驾中美之间签署的国际约章之上呢？既然克林顿总统把拥有美国梦，保持美国国家统一，确保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作为美国进入21世纪的三大任务，为什么不能对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和拥有一个中国梦的良好愿望给予应有的尊重？说到底，美国有些人就是不甘心失去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这支“不沉的航空母舰”，不愿意彻底放弃染指台湾的野心，不愿意海峡两岸人民真正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像美国国务卿助理洛德曾在私下透露的：“美要把台湾作为对华关系中的一个棋子。如果中国统一，中国便可掌握对南中国海和日本海的制海权，很容易冲出太平洋成为取代前苏联

的世界霸权大国。故而美国要打台湾牌以牵制中国。"这种帝国心态和霸权政策不仅是不合时宜的，不明智的，也是违背美国的根本利益和两岸中国人的利益的。

1700多年前，美国著名政治家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指出：“美国深知，一旦投到他国的旗下，即使是投到争取独立的旗帜下，便会卷入战争，不能自拔……一旦卷入，美国便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不再是自身精神的主宰”。当代美国人从这段历史警告中是否能获得必要的教益呢？

第六章 西藏：谁搅乱了这块雪山净土？

1. 中国的土地

1995年7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一法案公然称西藏为“被占领的主权国家”。

根据这个法案和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采取的一项措施，美国国会竟要求提名派一名美国特使前往西藏。

该法案称，按照国际法，西藏是“被占领的主权国家”，其真正代表是达赖喇嘛和西藏的流亡政府。并声称“应当让西藏人民拥有自决权，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中国人的统治下，他们的人权遭到严重践踏。”美国国会的这项法案真是荒唐透顶，因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早在统一的藏族形成前后，她的各部分就和汉族以及中国西部、西北部的其他一些民族有着密切联系。公元7世纪前半叶，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藏族诸部，建立起吐蕃王朝，与唐朝皇室交往频繁。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金城公主的先后两次联姻，标志着藏汉民族间一步一步建立起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9世纪中叶，统一的叶蕃王朝崩溃后，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各部分分裂成许多互不相属的地方势力集团。宋朝开国后，这些地方势力集团中的一部分（原吐蕃王朝所属藏族部落）归附宋王朝，进一步密切并发展了藏族与汉族的各种关系。

公元13世纪，在蒙古人创建中国领土内各族空前大统一的元王朝过程中，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元世祖忽必烈赋予萨迦政权在元朝的管辖下统治西藏地方权力，并开始建立了对西藏地方的许多施政制度，蒙、汉、藏等各民族开始结成了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政治联合体。14世纪后期开国的明王朝，基本上承袭了元朝治理西藏地方的各种制度，并实行“重建多封”、先后敕封藏区各地的八个政教首领为“法王”或“王”；以茶马互市、朝贡回赐两种形式为主的藏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藏族与祖国各民族的关系有了全面的增进。17世纪以后，满族人统一全中国而建立起来的清王朝前期，先后册封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任命了噶伦，设立了驻藏大臣，颁发了规定西藏地方政府体制和法规的钦定章程，对西藏的治理进一步加强，形成了西藏与祖国更为紧密、牢固的关系。

自清朝起，西方为分裂中国，不断制造所谓的西藏“独立主权论”和“宗主权论”等。但历史不容置疑，法律无从篡改。西藏从不具独立国家的地位，中国一直对西藏地方拥有主权。

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已有很多的科学论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

由王贵等编著的《西藏历史地位辩》和由张植荣著的《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在此，我们姑且引述两位先生著作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给美国国会不知西藏历史的议员们补上一课。

(1) 西藏的"宗主权"纯属虚构

1903年，英印政府外务部在致英国印度大臣弥尔顿的一封信中，认为中国对西藏地方的权力是一种虚构的"宗主权"。后来，在1907年的《英俄协定》和1987年范普拉赫的《西藏的地位》中都提出过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问题。"宗主权"在国际法中是相对于附属国而言的，起源于封建社会领主与附属国之间的关系，并且由于后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得到发展。附属国的外交全部或部分地被宗主国控制，附属国的成立实际上意味着被分割了主权的国家的出现。"按其历史发展情况来说，一般是取得完全独立的第一步。"因此，"宗主 - - 附属"的关系包含着如下含义：其一，附属国必须曾经是独立主权国家但没有被完全合并到宗主国版图中去；其二，附属国并不因地位的原因而丧失主权，只是主权被分割。因此，附属国的最高权并不是源于宗主国；其三，附属国本质上是殖民地的一种形式，其前途是获得独立。典型的附属国存在于19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如从土耳其帝国分离出来的附属国有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埃及（埃及1914年脱离土耳其后又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

而史料证明，自元代以来，西藏一直是中国版图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既不是被保护国，也不是什么其从国或自治领等。西方列强将其殖民国家的概念引入西藏问题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更是对西藏人民的侮辱。

(2) 中国对西藏的历史权利之确立

显然，有关国家领土取得的国际法上的各种规定，乃是基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取得的经验的。在传统的国际法上，这些经验被总结为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和征服。但是，西藏正如中国其他边疆地区一样，并不是简单地用以上几种方式就可以解释它如何从法律上并入中国的版图的。实际上，在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自成一体领土取得方式。首先，中原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凝聚力，为边疆各民族融合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来奠定了基础。其次，被吸引和融合进来的土地及人民，在中央王朝看来，他们自然地成为自己的属地和人民，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最后，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当然也是不可少的。明确地指定某个时间中国取得了对某块土地的领土主权是不太符合中国的历史的。元朝对西藏的主权的取得乃是基于唐朝以来汉藏（或藏族与唐、宋的更多民族）两族之间不断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元朝只是明显地从政治上完成了统一过程。中国对西藏主权的取得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245年左右西藏地方萨迦派喇嘛萨迦班智达代表西藏地方向元世祖的皇子阔端的臣服，元朝扶持萨迦派并确立其在西藏的优势地位，以及元朝在西藏地方清查户口、设置驿站及兵站，在中央设置总制院管辖西藏，并将西藏作为一省委付于萨迦派传人八思巴，等等史实表明：一方面西藏地方结束了自唐朝以来的二百多年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元朝对西藏的行政管理确立了西藏以后的政教合一体制的基础。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源于中央。元朝如此，明清至今也如此。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西藏地方从历史上其根本不具备主权这个现代国家最基本的要素，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拥有主权。

（3）西藏历史并非处于"外藩"地位

根据国际法的"时际法"原则，统治的权利被划分为权利的创造和权利的存在两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权利的创造必须根据创造权利时的法律予以判断；第二要素：权利的存在必须根据涉及该权利存在的关键时候的法律予以确定。因此，确定中央对西藏在后来的历史中的有效统治则是十分重要的。

明朝"多封众建"的方式，使元朝在西藏建立的管理系统更加完备。这一政策使得更多的僧俗世家力图从中央获得优势地位。清朝在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几次平乱以后，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该章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内容上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各项管理，而且在以后长时间里受到尊重和遵守。就内容上而言，一方面，它规定了西藏地方的外务和边防听命于驻藏大臣衙门。如它规定从尼泊尔、不丹、克什米尔和哲孟雄等地来的商人和朝佛人员，必须登记报批驻藏大臣衙门备案，并且要遵守地方例俗；到外藩朝佛去的藏人亦得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至于防务，《章程》规定："共额设三千番兵"，驻边境要地，驻藏大臣每年5、6月间轮流前往巡视。西藏地方第一次有了正规军，并隶属清朝边防系统。另一方面，对于西藏地方的内部政治、宗教和经济等事宜，《章程》中也有详细的规定。

《章程》的各项定制，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间基本没有变动。"金瓶掣签"制度一直沿用到十二世达赖的认选（1856）年，并影响到十四世达赖的认选（1940）年。有效统治的持续性只是在中国边疆总危机出现以后才受到冲击。但它的松弛正如前面所说，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结果，并非是民族关系和主权认同方面的危机。

有趣的是我们将1793年与《章程》同年颁布的乾隆皇帝给英王的"敕谕"进行比较发现，西藏并不是处于与"夷国"英国类同的地位。而且从上面所述《章程》的有关外务的规定也可以看出，西藏与尼泊尔、不丹、哲孟雄（锡金）等国的界限。另外，由于在西方入侵以前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的是一种"朝贡"关系，这些"朝贡之邦"包括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朝鲜、琉球最恭顺，越南次之。其余之国不过是羁縻勿绝而已。因此，西藏既非夷国，也非外藩，也非"朝贡之邦"，而是中国领土的构成部分。西藏的地位，在西方国家入侵以前，是早已确定了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法律上来说，西藏的历史地位是明确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鼓吹"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观点，跟那种所谓"中国对西藏拥有保护权"的观点是一样的，是站不住脚的。其目的是在理论上生硬地将中国主权下的西藏民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也赋予它所谓的"民族自决权"，主张"西藏独立"，并把某些"藏独"逆流胡乱地说成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相吻合。这是对民族自决权的曲解，是对中国历史的篡改。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将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控制权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清除出去。西藏也不例外。这在1949年9月2日新华社以"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为题的社论中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一国内部的革命在其领土的全部范围内乃是合乎国际习惯的。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在任何一国内进行的彻底的革命都为这一点提供了实践上的先例。因而，一国内部的革命在本质上只要

不与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如人道主义）相悖，则不应受到外界的干预。考虑到西藏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民族上的特殊性——即考虑到殖民主义侵略的后果，地处边陲；和历代中央政府的平视性政策造成的汉藏隔阂，尽量谋求和平地恢复在西藏的完全主权则是必要的。这是革命过程中的方法问题。

藏独进军西藏是非法的，构成了“侵略”。为此，严格分析“侵略”的法律意义是必要的。“侵略”在国际法上有明确的解释。首先，它适用于描述国家之间发生的一种违法关系，并强调以和气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规定：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定义》列举了七种侵略的情况。无论是1928年的《非战公约》还是1984年的《人民享有和气权利宣言》，以及在这漫长时期内国际法的其他有关战争与和气的文献，都旨在强调以和气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其次，《关于侵略定义的决议》又规定安理会有权断定某些其他行为是否构成侵略行为。这样，发生在一国内部的革命战争并不与“侵略”有必然联系。何况，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基本上和气的。对此，联合国安理会当时尽管受美国操纵也没有宣布为侵略。“侵略”不能用来描述中国恢复在西藏的完全主权的事实。

到此，不知美国的议员们是否明白了他们的错误。如果还不明白的话，我们再让加拿大汉学家谭·戈伦夫在其《现代西藏的诞生》中论点继续说服他们吧。

戈伦夫认为，仅从中国中央政府和达赖分裂集团之外的“第三方观点”看，“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戈伦夫1987年完成此书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印度在内）承认过存在了二十多年的达赖‘流亡政府’。”看来，美国的国会议员们真入前国务卿黑格所称的那样，“不懂历史”了。上了这堂课后，他们或许应该懂得他们要求设立的“西藏大使”原本上已是无驻在国的“外交游民”了，而且永远也无法派出了！

2．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

1995年11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周刊刊登了一篇记者克劳迪娅·德雷菲斯采访达赖的专访。

达赖喇嘛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一豪华高尔夫球场接受了记者采访的。

记者问：在西藏，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你的一位兄弟卷入了领导游击队反对中国人的运动。事实上，游击队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你对此有何感想？达赖答：我一直反对暴力，但西藏游击队员是极有献身精神的人。他们愿意为了藏族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们找到了接受中央情报局帮助的途径。中央情报局帮助他们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他们不是出于真正的同情、出于对正义事业的支持才提供帮助的，这种动机就不纯了。”一段多好的自白！恐怕这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听到后也会脸上无光，因为连达赖都承认中央情报局是出于政治目的介入中国西藏事务的。不过，著名西藏问题专家张植荣先生早在1994年9月出版的《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一书中已详尽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不光彩行动。

美国与西藏政府之间的第一次联系是在20世纪初，而充当这次联系

中间人的美国人——威廉·伍德维尔·柔克义第一次踏上西藏土地的时间则在19世纪末。此人1884年来到北京，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三年后，他辞去了外交官的职务，化装成喇嘛，经西藏东部踏上了进入拉萨的征途，开始了长达4年的秘密“调查”。在此期间，他走遍了我国西藏东部和西南其他藏族地区，广泛地收集资料并依此撰写了很多论文和游记，如《达赖喇嘛与清帝的关系》、《达赖喇嘛之国》、《释迦牟尼传》、《西藏》等。1891年，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西藏之行，并写了《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的调查报告，此书在国外藏学界备受推崇。

1908年，柔克义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同年5月，他首次以美国官方代表的身份见到了当时正因印军入侵而被其逃至山西五台山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见面是为了讨论达赖请求美国帮助他设法返回西藏掌权的问题。虽然最后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但是自这次美国与西藏拉萨当局的第一次联系之后，美国政府插手西藏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从此以后，美国的教会、团体和个人对西藏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地方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们不顾万里途遥，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大陆，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进行所谓的“传教”与“科学考察”活动。他们通过“调查”与“研究”，搜集了大量的科学和情报资料，并著书立说，宣扬西藏已经“取得独立”的反动观点，为以后美国政府染指西藏做文字和舆论上的准备。其中，器具代表性的有以“传教士”为名的间谍艾伯特·L·谢尔顿，有刺探情报的“地理学家”J.F.洛克，还有三次旅藏的“博物探险家”苏依姆德·卡廷等。这种假借各种名义，以所谓非官对身份来藏的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2年，中国军队赴缅远征军在日军手下吃了败仗后，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以调查另一条可替代滇缅公路的陆路可能性为由，派出一个两人赴藏使团。这个团到达西藏后，根本没有对替代公路进行调查，反而与西藏地方贵族取得联系，向其赠送美国总统捎去的礼物，并对西藏地方军队、国民党政府驻拉萨代表情况广泛搜集情报。西藏地方政府见美国人对西藏感兴趣，便趁机向美国情报人员提出要求美方提供二台设备齐全的远程无线电发报机。美战略情报局局长道诺温认为，用不值几个钱的发报机换取西藏对美国进一步扩大影响将具有战略意义，便不顾国务院的阻拦，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了三台无线电发报机。

当时，出于战略考虑，美国一方面不作出任何改变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一立场的表示，另一方面又避免提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便尽可能得到行动余地，进行对西藏事务的干涉活动。

1946年5月下旬，一个宣称为巩固与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西藏代表团带着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礼物和信件，拜访了美国驻印度新德里的大使。随后又于次年8月，西藏地方政府背着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组织了一个以孜本夏格巴为团长的6人“商务代表团”，名义上是准备赴美英等国作商务“考察”，实际上却是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幕后策划支持下，西藏亲帝分子的又一次分裂祖国行动。他们企图与美英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借以造成一个实际上已经“独立”的既成事实。这个“商务代表团”的头子孜本夏格巴在20年后承认，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表明西藏的独立与主权。该商务代表团在赴美国之前，于1948年初到达南京，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曾劝阻其出国，并称如一定出国应拿中国护照。但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却阳奉阴违，

在印期间一再向美国外交人员表示，出外访问将不使用中国护照，并与美国商人及美驻港总领事暗中勾结，由香港美领事馆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和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给签证，于1948年7月17日飞抵美国。在此期间，他们受到了美国政府格外"慎重"的接待。当时的美国政府出于染指西藏地区的野心而又迫于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盟友关系的压力，对"代表团"采取的政策是："避免可能激怒中国政府的任何行动，使中国政府抓不到可解释为有辱于它对西藏的主权的任何把柄"，"既不想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也不愿伤害西藏人的感情"。为此，"代表团"在美国大失所望地呆了两三个月之后，又飞往伦敦，受到英国首相的亲自接见。

在当时的美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扩张工具，必须加以反对、孤立和遏制。这种观点支配了它关于西藏问题的政策。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官员露丝·培坎曾发表长篇评述认为，在1949年，由于共产党接管西藏，该地区将"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她看来，西藏是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屏障；如果被中共控制，就会成为中共向南亚地区"渗透和颠覆"的基地。她又进一步论证说，一旦共产党在中国获得胜利，美国不应当继续认为西藏是在中国当局权力范围之内，她极力主张立即派遣美国官员赴拉萨建立秘密联系。并且应尽可能地阻止中共解放西藏。杜鲁门及其之后的几届政府（截止到1972年）关于西藏的政策和活动都是从这一基本考虑出发的。

1949年7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全国即将解放之际，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唆使下，西藏地方当局的少数反动分子发动了一场"驱汉事件"。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干涉西藏的阴谋更加露骨。合众社8月10日电讯称："西藏当局利用中国政府之困难（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惨败），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8月初，美国政府又派遣特务劳尔·汤姆斯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的名义进入拉萨，参与策划西藏的"独立运动"。对于外国势力公开暴露干涉西藏的活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爱国人士在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新华社于9月2日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彻底揭露了所谓"驱汉事件"的真相，以及近百年来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吞并西藏的阴谋活动，表达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坚强决心。

驱汉事件西藏的活动。在拉萨的两个月中，汤姆斯父子与西藏一些反动的上层人士密洽密商。作为美国当局与西藏当局的联系人，他还同印度驻拉萨代表理查逊一起，合谋策划了西藏"独立"的阴谋。1949年10月，唐姆斯父子离开拉萨取道印度回国。他们在机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大肆鼓吹"西藏脱离中国独立活动"，宣称"西藏是世界上最反共的国家"，并呼吁美国出兵"支援和保护西藏"。抵达美国后，他们接受了杜鲁门总统的召见。为此在以后他们给达赖喇嘛的信件中说："总统希望组织世界上的精神力量来反对不人道的势力。"小汤姆斯在回国之后，还写了《这个世界以外》一书，胡说什么："我们完全有意把我们所知道的西藏面临增长的危机公开告诉美国人民，西藏的危机也是自由世界国家的危机。"1950年11月，他们与印度讨论了是否派一名飞行驾驶员去拉萨将达赖喇嘛接出来的问题。此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又秘密勾结以达扎摄政为首的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挟持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亚东，准备随时逃往国外，再伺机反扑。

在策动达赖经亚东逃往印度的阴谋破产后，为了达到最终控制达赖和

分裂西藏的目的，中央情报局又转而收买了达赖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经过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扶植”，这两人分别充当了西藏与美国政府、台湾国民党当局之间的直接联系人。

1951年夏，土登诺布带着一封授权他可以代表达赖与国外谈判的信件来到了印度，与美国人进行了秘密的接触。随后，又在一个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的反共组织——美国自由亚洲委员会赞助下飞抵美国。在那里，他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以下四点协议：第一，美国方面将负责安排达赖喇嘛和他的120名随行人员去他们选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第二，美国方面将提供经费支援反对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第三，美国方面将同意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第四，美国方面将考虑提供其他军事援助。而美国承担以上义务的前提条件则是达赖喇嘛要离开西藏，并公开谴责“十七条协议”，这为1959年达赖集团流亡国外之后得到美国的支持奠定了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次年，开始了进藏的准备工作的。这时的美英政府和西藏上层统治者变得更加恐慌。他们阴谋毒杀了蒙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并散布将组建所谓“西藏亲善使团”出国谋求“独立”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早日澄清西藏局势，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950年10月17日解放了昌都。随后，西藏代表团到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污蔑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西藏是“侵略”，并称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美国政府也发表评论，督促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他们竟又协助以达扎摄政为首的一小撮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挟持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到亚东，企图逃往国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暗中支持西藏分裂分子设立指挥叛乱中心，帮助训练达赖集团的武装力量，秘密地给叛乱分子运送物资，策划援助康巴叛乱（1956年）和西藏武装叛乱（1959年）。

据约翰·F·阿维顿在1984年出版的《雪域逃亡记》揭露，早在1951年，嘉乐顿珠就与中央情报局签订协议，最初是由他在西藏搜集情报，1956年升级到策划游击战。

根据戈伦夫的分析，中央情报局全面介入西藏叛乱应始于1955年或1956年。当时，中央情报局开始在台湾等地设立训练营。嘉乐顿珠负责挑选藏人，并与中央情报局安排从西藏经中亚，到台湾的秘密通道。反叛人员经过四个月的训练后再由美国飞机空投回西藏，策划政变。

1958年底，在康巴叛军的一再呼吁下，美国开始空投第一批武器。这批武器的数量并不多，只有100支英制来福枪，20支半自动枪，2门55毫米迫击炮，60枚手榴弹和3000发子弹。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外国势力的大肆支持下，1959年西藏终于发生了武装叛乱事件。

叛乱被镇压后，达赖则由中央情报局一手安排逃离出境。

在达赖喇嘛出逃的两周里，他一直与设在印度的中央情报局联络站保持着通讯联系；在中央情报局受训的报务员与达赖喇嘛紧紧相随，他与华盛顿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在保卫达赖出逃的1000人康巴卫队中，有许多人都曾经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训练。

在达赖喇嘛出逃之后，美国开始抓紧措施促进西藏内部地区的反叛力量的发展。1959年秋天，中央情报局将在科罗拉多州的哈尔营训练的第二批分裂分子空投回西藏。哈尔营地的秘密训练一直进行着。据一份资料记载，从1958年到1962年间，大约有170名藏人和康巴人在这里接受了作战训练，而后派回中国，这些人都成了西藏拉萨和山南“四水六岗”叛乱的骨干力量。到1961年底，在美国训练的反叛分子空投回西藏的活动停止了，而哈尔营地的训练活动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营地直到1964年底因美国将在尼泊尔训练更多的藏人后才最后关闭。

到1960年，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支持西藏东部的叛乱徒劳无功。于是，中央情报局又帮助达赖集团在尼泊尔的木斯塘重新组建“四水六岗教军”，并为其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后援物资。第一批空投的物资就有两架飞机，包括可供475人使用的枪支、药品、食物和相当于1252美元的卢比现钞，另外还有4名经过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康巴人。

70年代，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在西藏问题上暂时保持沉默。但自1987年起，美国又开始插手西藏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1987年至1989年的拉萨骚乱，为美国指责中国不尊重人权提供了借口。

拉萨骚乱的消息传到美国，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美联社1987年10月5日报道了“西藏流亡议会”呼吁联合国干涉和西藏在国外的三寺庙呼吁联合国支持西藏独立的消息。10月9日又报道达赖致电世界各国领导人要求他们于沙拉萨事件。

美国国会的反应相当激烈。1987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98票对0票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要求里根在向国会提出向中国销售武器的要求时应判定中国正在有诚意地、及时地着手解决西藏的人权问题。决议污蔑中国继续无视联合国提出的停止在西藏侵犯人权和实现西藏人民自决权利的要求。决议敦促里根政府向北京施加压力，使其积极响应达赖为就西藏的未来地位进行建设性对话所作的努力，并呼吁里根会见达赖，建议美国向西藏大约10万难民提供20万美元的援助。1989年3月16日美参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决议要求布什政府对西藏的态度成为美国同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决议说：参议院谴责1989年3月5日、6日和7日对西藏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使用武力，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对在西藏的外国记者和人权监督小组实行的限制；参议院决定要求布什政府建议派一个联合国观察小组去监视西藏的局势等等。

到克林顿上台后，竟发展到美国总统会见达赖，支持西藏民族分裂活动。但做贼心虚，克林顿会见达赖时不得不躲躲闪闪，采取低调气氛。如1995年的会见，“同以往两年一样，克林顿是在达赖喇嘛在白宫会晤戈尔副总统时顺便见见他，时间很短。”连达赖喇嘛的支持者都对其未能与克林顿举行正式会晤“表示遗憾”。

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到克林顿对达赖来访的低调处理，更加说明了连美国政府也明白“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分裂活动只能在见不得人的地方，以见不得人的方式进行。

3. 转世灵童风波

1995年1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谈美国对班禅转世灵童的立场时，一方面说：“正式承认转世喇嘛的做法是宗

教问题，美国不宜发表评论。"但又表示"我们将继续表示关切的是中国政府和西藏宗教统治集团显然没有就班禅喇嘛这一具体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尤其关注的是这样的报道，西藏一些资深喇嘛上周被迫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我们认为，继续就挑选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问题展开争论，会使人们对中国政府做出尊重西藏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的保证产生新的疑问，我们注意到中国宪法保证宗教习俗自由，当然，所有美国人都认为宗教自由是许多有关人权的文件所承认的至关重要的权利，美国人民也常常感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重要性，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和西藏宗教当局以及流亡的西藏人本着善意和忍让的精神认真地磋商这个问题。"伯恩斯的讲话不仅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还有意混淆视听，攻击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其实，挑选班禅转世灵童本是件简单的宗教事宜，却被达赖集团和美国政府制造成复杂的事端。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公元13世纪，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首领圆寂后，该派推举一幼童为转世继承人，从而创立了活佛转世的办法。此后，各教派先后效法。公元16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并逐渐形成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经过中国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和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最小弟子根敦朱巴圆寂后，为防止内部分裂，于是袭用噶玛噶举派的转世办法，由根敦朱巴的亲属及部分高僧指定后藏达纳地方出生的一名男孩为根敦朱巴的转世，这就是二世达赖根敦嘉措。由此形成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的尊号始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

1578年，明王朝顺义王俺答汗赐与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此后，格鲁派依此称号追认根敦朱巴、根敦嘉措分别为第一世、第二世达赖喇嘛。1653年，清王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以中央政府的册封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和地位。此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才能得以确认，成为一项历史定制。

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克珠杰·格勒巴桑，即一世班禅，年长根敦朱巴六岁，且早拜师八年，对创立格鲁派有杰出贡献，因此连同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甲曹杰被藏族宗教界合称为"师徒三尊"。1645年，固始汗（清王朝驻西藏地方首领）赠与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是班禅名号的正式开端。其前三世班禅是追认的。四世班禅圆寂后，后藏托布加溪卡的一位幼童被认定是他的转世灵童。这样，格鲁派又建立起一个班禅活佛系统。

1713年，清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须由中央政府册封方得以确认，也成为一项定制。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与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具有平等的宗教地位。

活佛转世系统形成后，经过一系列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以"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在历史上，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存在着诸多弊端，转世活佛往往是由"吹忠"（即护法喇嘛）作法降神祷问指定。于是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之风盛行，转世灵童大多出自王公贵族之家或出自族属婚姻，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乘机操纵了宗教大权。更为甚者，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借故要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失败后竟勾结廓尔喀入侵后藏，危及国家、百姓安全。面对大活佛转世灵童最后认定中的这些弊端，清高宗接受西藏地方僧俗界"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在派遣官兵击

退廓尔喀入侵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1793年乾隆帝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至此，“金瓶掣签”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金瓶掣签制度确认了班禅转世灵童的产生办法，即按宗教仪轨，由有关寺院和地方政府寻访灵童，再对访到的众灵童逐一筛选，被确定下来的灵童人选的灵异情况禀报皇帝，请求准予“金瓶掣签”认定。皇帝恩准后方可择日在释迦牟尼像前由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转世灵童。而后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请求任命。皇帝批准后，由中央政府派大员前往看视并主持坐床大典。“金瓶掣签”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王朝为“整治流弊”、“护卫黄教”使活佛转世制度得到必要的整顿而制定的“万世遵循”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制度。它符合宗教仪轨，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免纠纷。

金瓶掣签拥护。1792年金本巴起制成送往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表达了对清中央政府的感激之情，他说：“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护送，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转世者）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正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也称“此次钦差大人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唯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对中央政府的册封，九世班禅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表达感激之情：“蒙大总统加封至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祇领跪谢。”十世班禅大师更是“金瓶掣签”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他在圆寂前四天曾言及“我想到在世尊释迦牟尼跟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灵童）是最好的。”体现了大师继承祖制，坚持“金瓶掣签”的决心。

至此，“金瓶掣签”成为一项必须遵守的国家法规和宗教仪轨，它对于顺利实现宗教权力的传承和延续、对于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均具有重大意义。

金瓶掣签式或细节后来有所变通，但活佛转世，尤其是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否则即视为非法已成定例。民国时期，内乱频繁，外患不绝，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仍是由中央政府册封的。七世、八世班禅转世灵童及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均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认定。由于特殊历史条件及其他诸多因素的作用，九世班禅转世灵童是免于掣签确认的、但仍是经中央政府特许的。无论是否掣签，最后决定权仍在中央，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决定。

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大师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因心脏病突发，圆寂于历代班禅驻锡之地扎什伦布寺。

出于对班禅大师遗愿的尊重，出于对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的尊重，出于对藏传佛教仪轨的尊重，国务院于班禅大师圆寂3天后作出《关于第十世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随后经中央批准，成

立了由扎什伦布寺主要活佛、堪布、高僧组成的寻访班子，通过占卜、观湖、秘密寻访等宗教仪轨于1991年2月至今年1月，在五省区46个县境内寻访出灵异儿童28名，最后筛选出3名班禅转世灵童候选人。正当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时，叛逃国外的达赖喇嘛又暗中插手，把圈定的一名儿童通过寻访班子的个别人强行塞进重点名单。就在中央催促将三名参加金瓶掣签的候选儿童名单上报之际，达赖又通过个别人提出取消金瓶掣签，把他塞进来的这名儿童作为唯一转世灵童。在这一阴谋被中央识破并遭到坚决抵制后，达赖岂不及待地于5月14日在国外擅自宣布他所圈定的儿童为“班禅真正转世灵童”。达赖破坏宗教仪轨，违背历史定制，否定中央政府在班禅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受到广大藏传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坚决反对。正是达赖的不断干扰和破坏，使灵童寻访工作迟迟不能完成。

中央对寻访工作始终十分关注，给予了及时的指导和多方面的帮助。六年来，中央对班禅转世灵童寻访工作是高度重视、认真负责的，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的，是充分尊重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的。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过问寻访工作的进展情况，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中央还划拨专款，从各方面为寻访工作提供保障。在中央的积极推动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到1995年初，灵童寻访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1995年11月29日上午，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由国务院派员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主持举行的“金瓶掣签”仪式上，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6岁男童坚赞诺布中签，被认定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真身。当天下午，国务院批复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请示，特准坚赞诺布继任第十一世班禅。至此，历经6年的寻访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的佛门盛事宣告圆满完成。

4．西藏的人权

美国国务院每年一度的人权报告均指责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不少美国政治家还表示要到中国考察西藏人权状况，要求中国政府“保护西藏的人权”。

西藏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让我们还是先听一听一位到过西藏的美国记者如何说的吧。

1995年6月14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该报记者伊丽莎白·格林斯潘发自拉萨的一篇文章，题为《西藏》，副题为《中国人正在调整该地区的社会结构》，摘要如下：一位摄影记者和我由北京飞往常常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西藏，因为它位于一座平均海拔超过1.3万英尺的高原。

据中国政府说，西藏是一块原始的土地，是北京慷慨相助和英明的领导才使它得以进入20世纪的现代化社会。

我们发现，西藏不像一些人权组织声称的那样受到严重压制。许多西藏人声称，近几年，人们普遍享受到宗教权利。大部分西藏人声称，目前的生活水平比汉人入藏前提高了。

一位参与修复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木匠说：“西藏的境况要比汉人入藏前好多了。那时，西藏没有一座（混凝土的）多层大楼，而现在有许多这样的建筑。那时，我们缺吃少穿，现在这个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按计划1995年将拆掉许多破旧的藏式建筑，与此同时，数百名能工巧匠正在忙

于修复大昭寺。大昭寺每天都挤满了前来朝圣的信徒。

在拉萨，藏族雅皮士经常光顾的一家饭店里，一幅真人大小的迈克尔·杰克逊的招贴画高高地挂在达赖喇嘛的小型画像上方。这些雅皮士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和四轮小型货车。

替经贸部工作的藏族青年身着黑色皮夹克，并佩带闪闪发光的珠宝，与乡村农民朴素的着装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们手持大哥大操着流利的北京话就进口紧俏商品的配额同中国各省作生意。而进口这些紧俏商品本来是为了促进西藏现代化的。这些特殊的配额是根据政府的一项向少数民族和落后地区提供优惠政策的计划发放的。

这些西藏人——是在共产党中国的体制下受教育的第一代西藏人——将他们的夜晚和金钱都耗费在了酒吧和夜总会这样的场所。

在拉萨拥有一家电子公司的中国商人余文华（音）说，自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后这两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最大。

余文华说：“现在，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但这个地方绝达不到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身着艳丽传统服装的藏族妇女背着孩子在纳木错湖畔的田间辛勤地劳作，这一地区的妇女也许已经这样劳作了几代了，但我从3个小伙子的口中了解到，纳木错湖地区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些男孩用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当他们长大成人后，他们分别想要当银行家、司机和警察。他们不做家庭作业时喜欢玩游戏机。他们希望生活在拉萨。

这就是美国记者眼中的西藏。

客观地说，自西藏和平解放至今，甚至在动乱的文革中，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发展西藏的地方经济。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帮助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的发展，使各民族能够逐步达到实际上的平等，是我们历来所主张和执行的政政策。”他还说：“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地方正是这样做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又强调指出，西藏的工作“关键是怎么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富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0多年来，国家对西藏地方的发展采取了进一步的特殊支持。

中国的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

从王贵先生的《西藏历史地位辩》及其他中外学者的著作中曾列举了大量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西藏的人权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西藏的经济取得巨大成就，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正不断改善。

今天，全藏有干线公路15条，支线公路315条，除墨脱县初通的公路尚需改善以保证经常畅通外，所有的县和77%以上的乡都通了公路。一个以拉萨为中心，青藏、川藏、滇藏、中尼公路为骨架的公路网络已经形成。

西藏地方的航空事业，同公路运输一样，从无到有，是旧西藏所不敢想象的。如今已经开通了拉萨至成都、西安、兰州、上海、广州等国内航线和拉萨至尼泊尔加德满都的国际航线，使西藏的交通运输更加便捷，促进了西藏向着现代化迈进。

1980年后，共产党、人民政府为使农牧民群众进一步休养生息，在西藏地方实行了一系列比祖国内地优惠得多的特殊经济政策，并采取灵活

措施，以利增强西藏农牧等业的内部活力，促进生产发展。如确定“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岂不变”，“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岂不变”；取消粮食、酥油、肉类的计划收购或变相计划收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群众摊派和提取任何财物，基层干部的补贴由地方财政开支。通过这些政策为西藏农牧区长久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开展大规模的农田、草场基本建设。到1994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64万吨，比1958年增长5.8倍多，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1993年增长3%。在旧西藏，现代化工业基本上是空白。如今全区已拥有电力、采矿、水泥、制革、机修、毛纺、食品、印刷等10多项现代工业。1994年，工业总产值为5.35亿元，比上年增长12%，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年份。西藏的邮电事业更是突飞猛进。当前，全区建成了拉萨邮政通信枢纽楼和6个地区的邮电通信地球站和话音V S A T卫星通信地球站，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区内通信骨干网。全区所有地、市和70%左右的县实现了市内电话自动化，电传设备在自治区、地、市和部分县的电报通信中普遍应用，95%的地、市建成了无线寻呼系统。全区共有邮电局、所125个，遍布所有县级以上政府所在地以及部分经济发达的乡镇；80%的乡和行政村通邮，20%的乡和3%的行政村通了电话。今天，从西藏向全国以至世界各地打电话，已经是方便平常的事。

经过40多年的努力，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显著提高，绝大部分农牧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一部分农牧民已经富裕起来。1994年，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555元，比1991年增加100元。

1991年末，全区城镇储蓄存款余额为49240万元，比1995年增长500多倍。农牧民家庭已经拥有数量可观的生产资料，平均每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6021元，牲畜75头（只）；每百户拥有汽车9台、大小拖拉机6台、机动脱粒机3台、马车12辆、农牧民人均实物消费量比解放前有大幅度的增长。1991年，人均消费粮食183.6公斤、食用油3.6公斤、肉类14.7公斤、奶类50公斤。

从1952年到1992年的40年里，国家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累计达157亿元，再加上西藏重点建设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42.7亿元，两项合计近200亿元。

1994年，西藏自治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1.7亿元，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比西藏和气解放前和改革开放前分别增长了10倍和140%以上。

美国国务院在其“1994年人权报告（中国部分）”中，也还承认了“中国政府的开发政策帮助西藏人提高了生活水平。”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西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相继在昌都、拉萨、江孜、日喀则等地建立了小学。1956年9月，在拉萨创办来西藏第一所现代化的中学。国家为发展西藏地方的教育事业，40年来累计投资11亿多元，并实施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到1991年，西藏已有西藏大学、民族学院、农牧学院、藏医学院等4所现代大学；邮电、艺术、体育、师范、农牧、卫生、藏医、财经等中等专业学校也有15所，中学63所，小学2474所。在校学生达19.6万人，绝大多数是藏族学生；教职工达1.6万人，藏族教师占三分之二。

如今西藏自治区实行"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为主"的原则，体现了《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关学习和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原则精神。目前，政府机关下发的文件都是藏、汉两种文字，新闻媒介如广播、电视等都使用藏、汉两种语言。编辑出版的图书则有70%以上全是藏文。全区50余种报刊中，藏文版占50%以上。自治区在招工、招干、招生中，平等对待使用不同语言文字者，并尽力优先照顾藏语文使用者。各种大型群众集会都使用藏语文。所有机关单位、街道、路标和公共设施的标记一律使用了藏、汉两种文字。各中学、中专、大学都很注意藏语文教学。

1980年以来，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以及全藏各地的佛教协会相继恢复，各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自主地组织开展各种正常的宗教活动。1983年，西藏佛学院由人民政府支持和资助成立，一些有条件的寺庙办起了学经班，学僧人数达3000余人。西藏佛学界每年还推荐一批活佛、学僧赴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深造。为了满足僧侣和信教群众学修的需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4年将档案馆珍藏的《甘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无偿拨给佛协西藏分会，并资助50万元在木如寺办起了拉萨印经院，几年中印出千余部《甘珠尔》大藏经以及一些仪规、传记、论著等，供给区内外各地藏语系佛教寺庙。1990年，人民政府又拨款50万元，在拉萨印经院开始刻制十三世达赖喇嘛当年未能付诸实施的《丹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木刻版。

现在，西藏有僧尼34000余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僧尼们自主进行学经、辩经、灌顶、受戒等仪式，开展念经、祈福、消灾、摸顶、超度亡灵等活动，均受到宪法保护。约有600僧人在人民政府的各部门中任职，或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佛协理事等。

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和僧人们，还同国内外宗教团体和僧人们在自主、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着友好交往。到1992年，他们已经先后派出4批20余人赴国外访问、考察、参观。同时，他们也接待了不少外国佛教界人士和信徒。

事实胜于雄辩。由此可知所谓的"西藏人权状况堪忧"之辞完全是美国政府别有用心捏造。

第七章 谁误导了美国公众？

1. 透过墨镜看中国

近几年来，大部分在美国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感觉，美国新闻媒体，包括电视、报纸、杂志和广播上有关中国的报道几乎是清一色的负面宣传。美国的新闻制造机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它在世界上其它国家中的驻外记者人数也是最多的。美国新闻界早就有两句用滥的术语，一是"没有消息是好消息"，二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我在美国两年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对美国的新闻界可以再加上这样一句："有关中国的消息不是好消息"。

美国建国200余年来，其本土从未遭到任何国家的侵略，和其它国

家相比，美国在地理位置上和自然资源上都有着得天独厚、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欧洲移民到达前，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主要靠狩猎和捕鱼为生。美国将印第安人的家园攫取为己有之后，接管的是北美大陆一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今天，初次去美国的中国人往往对美国无处不在的草坪、草原和森林发出惊叹，这是因为美国许多地方的可耕地至今仍然没有动用过，这些未开垦的处女地面积约为美国全国已耕地的一倍还多。本世纪内的两次世界大战，尽管美国都参加了，但战争一开始，美国总是袖手旁观，并向交战双方都出售军火，结果是欧、亚、非洲的一系列国家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的稀巴烂，而美国却大发战争财，聚敛了巨量财富。

在上述各种优势的基础上，美国经过100多年和开发发展和对外扩张造就了它今天以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完善的政治体制和日渐流行的大众文化为标志的世界第一形象。二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普通的美国人从孩童时代就习惯于听说他们的国家是最富有的、最强大的、最成功的，当然还少不了“最民主的，最自由的”。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人称为“二流演员”出身的里根上台后，推行“里根主义”的政治信条，让美国人放心，相信美国会把60年代蒙受的耻辱和挫折置于脑后。1981年1月20日里根在其首任就职演说中号召美国人：“让我们重新拿出决心、勇气和力量，让我们重新建立起我们的信念和愿望吧。我们完全有权去做英雄式的梦”。四年后他在连任就职演说中又慷慨激昂地说道：“一个在上帝指引下的民族，致力于实现上帝深植于人类心中的自由理想，现在已应召把这种理想传送到一个正在等待和充满希望的世界”。这种自封的“救世主”精神使美国人在里根年代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方面他们深信他们事事都干得十分出色，以至于他们不再看一看他们实际上干得怎样。另一方面，美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习惯于以蔑视的态度对任何一个——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敢于对帝国的优越性提出疑问的人表示气愤。

笔者在美国时，就有这样的一次亲身经历。有这么一对美国老夫妻，他们都曾在我所在的学校任教几十年，退休后曾于80年代两次来中国。他们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对一些初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很友好，比如邀请周末聚餐之类。有一次我应邀去他们家吃一顿便饭，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是否要延长给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饭桌上自然地中美关系成为最大的话题。记得当时我这样讲：“国会的议员们认为中国老是占美国的便宜。其实，如果没有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的商品进不到美国市场，你们就买不到这么多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这对你们也是一种损失”。这对老教授环顾一下他们的餐厅和客厅，微笑着不言。我这时又加上了一句：“从历史上看，你们美国还侵略过中国。”一听到侵略这个词教授脸色马上严肃下来，加重语气问我，“你说我们侵略过中国，美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你说美国什么时候侵略过你们？”我当时想了一下说：“再远的不提，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美国有一份吧？”“那是因为你们侵略了我们，义和团先包围了我们的公使馆。”我对这回答惊呆了。因为我从未听过这样的逻辑，但是既然辩论开始了，就接着来吧，那你认为义和团为什么要包围公使馆呢？难道不是你们侵略在先吗？”无论什么原因包围一个国家的外交机构都是不对的，那么朝鲜战争呢？”朝鲜战争我们是为了保护南朝鲜不受北朝鲜的侵犯，如此说，那越南战争就是保护吴庭艳的南越了？”对，我们并没有侵略过任

何国家,我们每次出兵都是为了保护受到威胁的国家,为和平、为民主而战。”对此我突然认识到我们是站在相反的方向看同一个问题,一个看正面,一个看背面,所以结论正相反。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为了不使这场不愉快的争论变得更糟,便起身告辞。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邀请过我进他们家的门槛。后来在其它一些场合遇到过几次也仅是寒暄几句而已。

这是我在美国的两年时间里记忆最深的一次辩论。随着与美国人交往层扩大,我感觉到这对老教授的这种观点绝对不是仅有的,持类似观点的美国人大大有人在。尤其是曾被美国过分夸大的昔日敌人——前苏联垮台之后,美国人认为他们成了绝对的第一。这种第一的感觉使美国人往往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该效法的“样板”,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其它国家民主程度的绝对标准。另外,再加上一种深深地扎根于美国宗教文化背景之中的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即认为美国在道德上胜过其它国家,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客观”的新闻报道以至“自由”的学术著作中随处可见。

最早的欧洲移民者飘洋过海前往美洲时,其主要原因有二——不是为了逃避宗教压迫,就是为了到新世界去发财致富。自从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在科德角登陆时期,宗教就一直是美国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宗教对美国的社会以及美国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美大陆被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认为是实现他们的宗教理想的“理想之地”。随着北美大陆的逐渐开拓,这里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净土”,逐渐成为多数白人移民的潜意识,他们认为上帝赋予他们一个“特殊使命”,那就是把他们的基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体系作为普遍真理而推行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世界上履行特殊使命的意识深深扎根于美国白人文化中,成为美国白人把美国与世界其它地区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准之一。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有的“美国道德优越感”和后天形成的“美国制度优越感”,使美国人在看待和对待其它民族时容易采取一种深藏于内心的傲慢的态度。换言之,美国社会的确崇尚民主、人权,不过,一旦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时,这些观念就会沾染上强烈的强权政治色彩。

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美国国内某些人士的需要,一方面是基于媒体本身的立场,近几年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极力夸大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上的分歧,连篇累牍地指责中国,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鼓动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这种不公正的新闻报道不但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慨,同时也受到了在美华人的谴责。在美国的很多中国学者和留学生都认为近几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媒体的片面的不公正的报道造成的。

美国《纽约时报》1988年至1993年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和吴洁芳夫妇曾对中国做过大量的报道,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比多数美国人要深得多。1994年他们合写了一本长达500页的有关中国的书,题目为《中国觉醒了》。在书中吴洁芳讲述了一个她在中国的5年间仅遭遇一次的故事,在一次舞会上,一个与她跳舞的中国官员“搂得她很紧”。在书中她对这个故事极尽紧张,然而,在该书的简介中,这个故事被高度概括为通过这个故事“吴洁芳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政府官员们对当地女性有不轨行为的中国”。不知作者对此以气概全的错误是由于作者应有的疏忽,还是故意给读者以什么别的印象?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过去4年内至少已涉及到两次“桃色事件”,他的

高级竞选助手默里斯最近因"绯闻"而被迫辞职，没有中国记者试图让中国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美国政府官员都是"不能控制力比多的人"。这种明显的舆论误导大概是作者对"新闻自由"的超高水启发挥。在书中作者还通过起同仁之口指责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说他"有一种沙坑意识"，因为芮效俭认为他们对中国持过于批评的态度，并且不公正地突出中国的不足之处。唯一可取的是作者在最后表现出了很大的自知之明，告诉读者不要认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可以说，新闻自由这个神圣的字眼在美国正在被越来越严重的庸俗新闻自由所取代，其表现是新闻从业人员日益丧失道义气判能力和责任感，为提高收视率、发行量、金钱、地位和名声而追逐丑闻和新闻的轰动效应，有时甚至在功利主义驱动下不惜编造新闻。尤其是对于与美国文化不同的社会，美国的新闻媒体往往随意妄加批判，有时又因以讹传讹、道听途说而错上加错。1995年9月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在报道在中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注意力大大超过了他们对世妇会议程本身的注意力。他们不顾事实，把他们所看到的一个点当成反映整个中国妇女状况的论据，编造中国妇女"不平等"的故事，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美国的《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都曾提到在中国每年大约有几十万妇女做人工流产手术。且不说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却被美国依阿华大学的一名教授拿来并做一番夸张之后用来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1995年10月18日，这个名叫文恩的教授应邀在另一所美国大学作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联合国应该怎样迎接新的挑战》的"学术报告"时极力指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什么由于中国的"一对夫妇起一个孩子"的政策，在中国每年有数百万婴儿无辜"消失"；以及很多家庭把刚出生的女婴弃之荒野，等等。更有甚者，还说什么在中国有很多地方立有这样的牌子："不要把狗和女婴扔进河内！"。该报告还被当地报纸进行了渲染性的报道，自然引起了当地中国留学生的不满和抗议。

即使在美国国内，人们对传媒和新闻记者的看法也越来越倾向于否定态度。大部分美国人对当今的美国新闻媒体和记者也啧啧烦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电影塑造的记者形象的逐步变化也足以说明，记者及新闻媒介的信誉在大众心目中已日趋低落。

30年代的电影塑造的记者形象是具有勇敢、坚毅个性的普通人；70年代，在《总统身边的人们》的电影里，罗伯特·雷德福和卡尔·伯恩斯坦仍属于收入较丰厚但又不畏权势、正直、敢讲真话的记者。

80年代以来，银幕中的新闻记者却被刻画成了比律师、政治家及商界大腕更令人讨厌的人物，这几种人在反映白领阶层的电影里一向是反面人物形象。在1981年制作的《不存恶意》这部电影里，野心勃勃的新闻记者萨利·费尔德居然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发表文章指控商人鲍尔·纽曼犯了杀人罪；1987年发行的名为《广播新闻》的电影中的新闻广播员威廉·赫尔特也是一名风流人物，他排斥一切事物而只追求个人利益；在从1988年开始播出的《死难历程》系列节目中，电视记者威廉·艾瑟顿是一个油腔滑调、令人厌恶的小丑形象，为了上电视、出风头，他宁愿以谎言来骗取观众；1993年上映的《升起的太阳》则把新闻记者描绘成了十足的罪犯。

在现实生活中，华盛顿记者圈里千方百计想挤进银幕演电影的大有人在，而他们在故事中的形象往往如同演滑稽戏的小丑：如此快速轻率地下结

论而不顾后果；如此热衷于猜测预料时局的变化，而不去关注、报道与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有价值的事物；如此惯于片面、偏激地批判某一焦点问题，而不清楚所发生的一切……尽管他们事先已知道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却仍对在此类电影中出现乐此不疲。这一事实从某种角度透视出了当今社会新闻界自高自大、玩忽职守、脱离现实生活的根源——名誉高于一切，名誉比信誉更重要。

2. 从"CBS的中国间谍故事"到"NBC的奥运会"

1994年5月19日晚，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由华裔主播宗毓华播出了一条有关"中国间谍"在美进行活动的报道。这条新闻是这样开始的：现在请看有关美国最大的间谍网的报道。在这个节目里，我将告诉你们到底是谁在操纵这个间谍网，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伴随着一幅幅闪过的美国华人工作时的画面，宗毓华接着说道：“每天，一飞机一飞机的中国公民合法地来到美国。他们看起来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未来的间谍。几年之后，无论愿意或不愿意，他们都会活跃起来，窃取美国军事和科技机密。”为了加强轰动性效果，宗毓华还特意邀请《中国的谍报活动》一书的作者到直播室，采用一唱一和、一问一答的方式向观众逐渐描绘出一个"中国间谍故事"。

这条充满歧见的新闻一播出，立即引起了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这种不负责任的报道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和中国在美人员的形象，而且还可能给在美华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于是，一些中国留学人员马上发动了一场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对中国学生的抗议，CBS并没有表现出它一贯标榜的新闻时效性。直到5个月后的10月20日，CBS总裁Eric Ober才代表CBS写信正式向在美的中国人道歉。第二天，CBS的新闻节目仍由宗毓华主播，在30分钟的节目中，她插播了一条简短的解释性说明，但并没有表示公开道歉之意。她说，“在5月的一个节目中，我们报道了一些有案可查的证据，显示北京政府正在在来美的中国人中招募情报人员。我们无意给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似乎被招募的不是少数，而是每年合法进入美国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访问人员和移民。如果我们的报道给人留下了不正确的印象，我们感到遗憾”。

宗毓华不负责任的报道终于在1995年得到了"报答"。她在报道一次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母亲的采访时，不守亲口许下的"绝不传于第三人"的诺言，将金里奇的母亲告诉她的金里奇曾用于评价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的一句脏话向美国观众播出，因而遭到美国全国的强烈非议，此后不久便不得不辞去了她在CBS的新闻主播职位。

无独有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电视台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对中国运动员和中国的报道完全是恶毒的诋毁和歪曲。NBC的体育解说员鲍勃·科斯塔斯不断针对中国和中国运动员作出不公正的评论，牵强附会地无端提出所谓的中国人权和知识产权等问题，还极不负责任地诋毁中国运动员"可能有普遍的"服用兴奋剂的问题。在对别国运动员的评论中，NBC也带有明显的平视。奥运会第一天开幕式当中国队入场时，鲍勃·科斯塔斯这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经济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每个经济大国，包括美国在内，都想打入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当然它也存在人权问题，侵犯知识产权问题，还对台湾构

成了威胁。在奥运会上，他们取得了巨大成绩，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共获54枚奖牌，包括16枚金牌，名列第四。他们在1984年结束了远离奥运的历史，体育运动成绩卓著。但人们依然存有疑虑，总觉得他们，特别是田径和女游泳运动员，可能是靠服用兴奋剂来获得好成绩的。虽然在巴塞罗那没有运动员被发现服用兴奋剂，但是1992年后的比赛中有好几名中国运动员被查出服药。”当一个非洲国家队入场时，科斯塔斯如此评论，“瞧，这又是一个连获一枚奖牌的希望都没有的非洲队”。

几天后，当科斯塔斯与一个美国刚获得女子自由泳50米金牌的运动员交谈时，注意到中国只拿到6枚奖牌，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说有关中国运动员服药的怀疑已经被证实了。这个事实只能说明一件，那就是以前他们靠服药取得了好成绩，现在他们害怕药检而不敢再服药”，所以成绩不如以前好。美国女队这回发现在中国队身上，无用药文章可做，就转而怀疑爱尔兰女泳将史密斯。这位28岁的爱尔兰妇女为她的国家赢得史无前例的游泳金牌，而且是三块之多。这使被淘汰的美国名将埃文斯愤愤不平，疑心重重。美国媒体也大肆散布流言。但在多次药检并无问题的情形下，只好承认史密斯的成绩大跃进是训练的结果，并非用药所致。

事实上，NBC的奥运会转播工作以及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当局的组织工作遭到了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广泛的批评。香港的一位记者赵景伦笔下的奥运会是这样的：奥运会的精神本来是让来自世界各国的健儿以兄弟情谊相聚在一起，进行友好竞赛，互相观摩，既褒扬赢家，也尊重输家。令人遗憾的是独家广播这次盛会赛事的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一开始，就把奥运会政治化，报道片面。甚至《纽约时报》在社论札记中也批评NBC新闻过分集中突出报道美国运动员，冲淡比赛的国际性质。它对中国女运动员、特别是女泳将的贬低和敌视，更使偏见影响报道的专业水平。NBC新闻在奥运会开幕的当天，就人权和西藏等问题攻击中国，并且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谈中国女泳将的所谓使用违禁药品问题，用心恶毒卑劣，令人不齿。

在本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中，美国电视在转播比赛实况时，从头至尾充满了一种浓烈的美国人自我崇尚、自怜自爱的色彩，而且做得十分坦然，毫无羞耻之心。例如，在转播非美国运动员比赛的精彩场面时，导播们会毫不手软地插进广告，这种做法甚至引起了美国评论员们的抱怨。法国《世界报》说，美国人只对自己感兴趣，奥运会反映了美国社会的负面，一个自大狂的美国，一个被金钱统治的美国，并认为过度膨胀的美国沙文主义最令人反感。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4.56亿美元的高价买下了独家在美国转播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权利，该公司利用这种特权，把电视黄金时间变成了赞扬美国运动员的场所，此时美国所崇尚的那种公平似乎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电视台在介绍美国的那些著名的或不著名的运动员时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体育评论员查尔斯·克劳萨默把这种作法称之为“难以忍受的、实际上是可耻的电视转播沙文主义”。他说在每一场比赛中，他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美国运动员做得如何？对奥运会的组织工作，甚至许多美国新闻媒体也颇有微词。《洛杉矶时报》上体育专栏作家迈可·唐尼这样写到，“亚特兰大的组织工作一塌糊涂，问题百出，要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亚特兰大市长对奥运会组织者的批评者恨之入骨，认为那些批评他的人“应该拉出去参加射击比赛并被射死”。唐尼半开玩笑说不可能有人能被送到射击场，“果真，第二天去狼溪射击中心的巴士半路抛锚，使几十人陷于困境”。

总之，美国人从N B C的新闻报道中了解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被歪曲了的中国。为抗议N B C在奥运会期间对中国运动员和中国的诋毁性报道，旅美中国学生和华人团体自发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谴责N B C的不公正的新闻报道。

纽约的中国学生、学者和侨界领导人于8月15日成立了“纽约抗议N B C特别委员会”，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大幅抗议广告：祝贺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时谴责N B C电视台解说员在奥运会期间对包括中国运动员在内的外国运动员带有敌意的评论。

广告词指出：“N B C解说员鲍勃·科斯塔斯对包括中国运动员在内的许多外国运动员所进行的敌意性评论，严重玷污了奥林匹克精神，深深地伤害了全球无数电视观众的感情。

科斯塔斯和N B C应该有勇气对其可鄙的偏见和不友好的行为作出公开道歉。”此前，加州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佛罗里达大学、俄勒冈大学等学校的学生学者联谊会、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及旧金山中华总商会等团体和组织曾于7月25日向N B C电视台发出了一封由5000多人签名的公开信，要求这家电视台公开表示道歉。

公开信表示：“我们在此对科斯塔斯先生违反职业道德、不负责任和煽动性的言论表示抗议。N B C这种不公正的言论不仅针对中国运动员，而且也指向其他国家运动员，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对不同国家的运动员采用双重标准。”公开信强调：“奥林匹克是圣洁的。

我们认为科斯塔斯先生所作所为，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无知背离。”据报道，这次签名活动充分利用先进的国际电脑网络，四名学生几乎日夜坐在电脑前工作。每秒钟都有许多签名涌入。另外，北美华人主要媒体，包括《世界日报》、《星岛日报》、美国加州的《侨报》、一家电视台、两家广播电台都以北美西海岸地区媒体的头版或第一要文给予连续追踪报道，大力支持在美华人的自发爱国行为。

至今，N B C已通过一封简短的道歉信部分地满足了在美华人团体的抗议要求，然而始作俑者鲍勃·科斯塔斯仍未公开表示道歉，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如此大胆攻击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人却如此羞羞答答地不愿意承认错误。至少，通过这件事我们希望科斯塔斯和像他一样的人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每个国家和文化都有它自己认为值得骄傲的价值观念和荣誉，他们应该学会尊重别人，以惟我独尊的态度去肆意评判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3．吴弘达事件与吴弘达现象

1995年7月，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了一个试图用化名非法潜入中国的名叫吴弘达的美籍华人，这个消息以及后来的进展连续几周出现在欧美各大报纸和杂志上，甚至造成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能否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都成了问题。人们不禁要问：吴弘达是一个什么人？吴弘达原本是一个中国人，原籍中国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弘达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被依法惩处。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他先后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三年。

1964年，吴弘达刑满释放后，到山西省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任教，不久又调到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

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经过7年苦心努力，他终于于1992年加入了美国国籍，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自1991年起吴弘达先后4次潜入中国一些非对外开放地点，从事反华活动。

自到美国后，吴弘达为了迎合某些美国反华政客的需要，就中国“人权”问题和劳改问题不断向中国发难，并因此取得了美国国会一些积极反华的议员的赏识。他不仅当上了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中国科科长，而且还兼任“劳改基金会主任”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等，可谓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吴弘达在美国曾写作并出版了两本所谓的“纪实体”小说：《昨夜雨疏风骤》和《劳改营：中国的古拉格》，（古拉格原为一个俄文单词，专指前苏联的劳改集中营），在书中用极其恶毒和肮脏的语言对中国政府进行猛烈攻击。为了在中国境内窃取、刺探用来诬陷和攻击中国政府的材料，吴弘达曾在1991—1994年间，先后以吴弘达、亨利·吴及彼得·吴等名字，以访友、旅游、经商等名义进入中国境内，从事非法活动。

1991年夏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了配合起反华宣传活动，有意制作一期关于中国劳改问题的节目，吴弘达自告奋勇，充当他们的马前卒，带领一支摄像队潜入中国境内。他们先后在6月16日和7月29日潜入山西省霍州监狱和阳泉第二监狱，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等一系列电视“特技手段”偷拍了大量有关这些监狱劳改犯人生活的影片。随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制作了一期60分钟的节目在全国放映，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1994年4月，吴弘达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指使，偕同该台一名女记者进入中国境内。他们携带微型摄像器材，以中国丝绸之路为名，先后到中国新疆和四川等地，偷拍了一些所谓中国出口劳改产品和移植出售死刑犯内脏器官的画面，并将这些伪造的材料提供给英国广播公司，由该公司向全世界反复播放，其恶劣影响比他们在1991年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专题片有过之而无不及。

吴弘达为了拍摄制作这些所谓的“劳改营专题片”，采取了一系列极为卑鄙恶劣的手段，特别是他们制作所谓的中国移植、销售死刑犯内脏器官的画面更是将他们所有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吴弘达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女记者于1994年进入中国后，随即以夫妻名义来到成都市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科。吴弘达向当时值班的医生说，他是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他的舅舅得了慢性肾功能衰竭，需要做肾移植手术。他还说，他早就听说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有很高的医学水平，希望拍一些有关中国肾移植方面的专题材料，以便回去向舅舅有个交待。为了取得这位医生的信任，吴弘达当场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关于其“舅舅”病情的假证明材料。由于他伪装巧妙，言辞恳切，医生们对他也放松了警惕，并破例让他进入该医院第十五手术室观看当时进行的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换手术。但是，正当吴弘达与医生进行交谈时，他的“妻子”却偷偷拍下了这次手术的全过程，这个镜头后来便成了英国广播播出的“中国移植死刑犯肾脏器官”的特写镜头。

在吴弘达与英国广播公司女记者拍摄的这部专题其中还有一个镜头，在新疆的一所监狱外面有一条繁华街道，那里正在出售琳琅满目的商品。当时播出这个电视画面时，还加上了一段解说词：新疆商店里有三分之一的商

品是由监狱生产的，其产品占新疆出口商品的一半左右。那么，这组镜头又是如何拍摄的呢？根据吴弘达本人供认，他先是来到新疆第二监狱，拍下了一些有关当地警戒设备的镜头，然后，再来到乌鲁木齐市区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拍下了一些商品的镜头，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监狱标志贴到某个商品上，用特写镜头拍下这个商品，于是，他们觉得非常理想的画面也就出来了。

1995年6月19日，当吴弘达再次试图通过化名从位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中国境内时被中国边防人员当场抓获。6月30日，武汉市公安局决定对吴弘达进行监视居住。7月8日，经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正式将吴弘达逮捕。

吴弘达被捕本来完全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因此中国司法机关将其逮捕法办，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权力范围内的事，但由于吴弘达被捕正好发生在中美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而且美国政界及舆论界的反华势力又乘机利用吴弘达事件大作文章，一时间浊浪滔天，真假难辨，致使中美关系再次出现新的波澜。6月30日，美国参议院在外交委员会委员赫尔姆斯——有名的共和党保守派代表和反华积极分子——的策划下通过了一项决议，严厉谴责中国政府逮捕吴弘达的行动，并要求克林顿总统“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外交手段”确保吴弘达安全回国。吴弘达所作所为触犯了中国法律，理所当然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惩，经过武汉市公安局近一个月的侦察，1995年8月中国司法部门已经掌握了吴弘达的犯罪事实，因此，武汉市公安局于1995年8月6日正式将此案移交给武汉市人民检察院。

吴弘达本人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8月9日他向中国司法机关呈交了一份亲笔签名的《悔罪书》，以求得到中国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在《悔罪书》中，他这样写道：“经过思考及反省，本人真诚表示如下：归纳一下，有以下一些事实，是由我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中国政府及人民，并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在这份“认罪书”中，吴弘达主动坦白了他用移花接木、歪曲事实等手段编造诽谤中国的宣传品的一系列犯罪事实。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于1996年8月12日依法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8月23日进行正式审判，并且按照美国驻华使馆提供的律师事务所名单，根据中国法律对辩护律师资格的有关规定，由吴弘达本人选择了他的辩护律师。美国驻华使馆的有关人员也到场旁听了审判活动的全过程。

在审判时，吴弘达对其所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吴弘达15年徒刑，并告知吴弘达如不服可以上诉，吴表示服从判决，放弃上诉。8月24日吴弘达被驱逐出境。事后吴弘达对为其辩护的律师写信表示感谢，并表示他对律师的辩护感到满意。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所有中国人以及绝大多数海外华人视为卑鄙无耻、跳梁小丑的吴弘达在美国反华人士的眼中却成了“敢于对抗中国的英雄”，美国的新闻媒体更是把他刻画成一个“人权斗士”，甚至吹捧他是一个“勇敢的天使”。吴弘达自称他在美国国会山上有许多“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北卡罗来那州参议员赫尔姆斯。赫尔姆斯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发言权。赫尔姆斯的强硬反华立场早已广为人知，1996年初，他作为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的提案人之一随着世界各国对该法案的强烈谴责之声更加臭名远扬。1996年3月5日，赫尔姆斯为他的制裁古巴法案辩护时大言不惭地指责加拿大与古巴维持贸易关系有如

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对法西斯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赫尔姆斯抨击当年英国首相的绥靖政策显得义正辞严的很，使人怀疑他是否了解他的前辈们的历史，还是他故意忘却了。

1939年英国正式与法西斯德国开战，美国洁身自爱，宣布中立。

1940年夏，英国打得吃不消了，向友邦美国求援。美国国会始终拒绝援助英国，通过了"中立法案"，规定战略物资要"现金购买，运输自理"。结果是英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大量流入美国，英国用8个海外战略基地换取了50艘过时的美国驱逐舰。等到英国山穷水尽，在邱吉尔的苦苦哀求下，美国国会花了三个月直到1941年3月11日经过激烈辩论才通过了"租借法案"，同意英国预支购买战争物资的款项，并保证战后归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国会实在并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表现可以大言不惭地指责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

为什么赫尔姆斯参议员要交吴弘达这个"朋友"呢？可以说是他们彼此需要，为反华而流瀝一气。请看赫尔姆斯参议员近年来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的言行：1984年8月，赫尔姆斯游说并组织参议院的保守派议员极力指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指责中国"侵犯人权"、"违反人道"，并向里根政府施压，企图以立法形式禁止美国政府资助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因为该组织援助中国的人口计划。1987年10月，赫尔姆斯和另一名参议员佩尔提出的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项修正案歪曲此前在中国拉萨发生的骚乱事件，声称美国"应该把对待西藏人民的态度作为它处理同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呼吁里根会见达赖喇嘛。

1991年5月9日，赫尔姆斯在美国参议院提出了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议案。

1991年5月17日，赫尔姆斯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文章，使用极为尖刻和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并提出立即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根据吴弘达提供的材料，指责中国没有移民自由，说什么"成千上万被不公正地关押在劳改营中的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这种移民自由"。还鼓吹"美国国会可以用拒绝延长最惠国贸易待遇的方式，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迫使中国就范"。

1995年6月，赫尔姆斯与其他人员一起去纽约欢迎到康奈尔大学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的李登辉，在机场致词时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们来到了锡拉丘兹，我希望很快就会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1995年7月，赫尔姆斯称赞吴弘达是他所知道的"最勇敢的人之一"；并在他写给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一封信中说，"如果吴弘达在中国被关押时受到任何伤害，美国国会将给中国以严重的后果"。

实际上，吴弘达不但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极大损害，而且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吴弘达所编造和提供的反华宣传品被美国的新闻媒体广为利用和散布。另外，截止到1996年7月，美国海关根据吴弘达所提供的所谓"信息"，已经扣压了23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

第八章 美国对华政策的短视性

1. "天赋使命观"的挽歌

1994年4月18日日本《读卖新闻》刊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篇文章，题为《在人权问题上不要强加于人》。这位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在文章中说：美国的人权政策与美国的传统一脉相承。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像美国这样明确地把拥护自由作为建国的理想，也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拥有各式各样的难民，这一点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带上了独特的使命感。另一方面，美国过于把自己看成是全世界的人权的维护者，所以我们往往忘记美国对人权的认识是美国独特的东西。其他主要大国都把外交政策看成是风险和成果并存的、给外国的行动以影响的手段。美国所提倡的人权一般都属于各国国内法制管辖之下的问题，所以人们一直不把它看成是外交对象。其他国家也不支持美国。

尽管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并没有施加让中国改变国内各种制度的压力，美国不过是要求中国遵守普遍的人权宣言，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在这个联合国文件上签字的国家在对华政策上提出人权问题。其他签字国都不提这个问题而只有美国单方面强制性地要求中国实行联合国的所有文件，这便令人产生了这到底是不是美国的义务的疑问。

总之，美国的对华人权政策几乎没有得到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中国遭受过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不断介入的屈辱，中国把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作法看成是过去西方介入的继续。

美国一味把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当作美中关系的基础，因此，这等于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和人权问题都拿来当抵押。这是不符合现实的。”基辛格博士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最大误区就在于美国人一直自以为是的"天赋使命观"。基辛格博士等美国有识之士以及其他大部分国家反对或不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唱起了"天赋使命观"的挽歌。

所谓的"天赋使命观" (Manifest Destiny) 的核心内容是：作为上帝最优秀选民的美国人，有一种宗教上、道义上和文化上的"义不容辞"的使命，要将美式文明从最初的13个殖民地传播到整个美洲大陆，乃至整个世界。

这种"天赋使命观"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对外殖民扩张中占有重要的思想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天赋使命观"也揉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道德基础。冷战时期，美国以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张"，宣扬美式的"民主"与"自由"为由，与原苏联争夺全球霸权。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又发展为向全球输出"民主"，"维护人权"。

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就提出了冷战后的美国"扩展战略"以取代"遏制战略"，而这项新战略的核心就是把"民主制扩大到全球"。按照该战略的设计者安东尼·莱克的解释，扩展战略可分为四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同心圆：即加强现存的民主国家；促进和巩固新兴的民主国家；保护所有这些民主国家免遭独裁国家的侵略；在那些未民主化的国家中支持人权运动。中国被列入第四层结构之中，成为被"扩展"的主要对象。

克林顿政府的一个重要官员沃顿在阐述其政府的外交政策时强调说："人权是我们政策的核心，美国将想方设法用其援助和影响力帮助这些国家促进人权和强化巩固法制的民主制度。"沃顿这番话如实地道出了美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的一种道德价值取向，即向外输出美国的"民主与人权"。

克林顿总统竞选时，就大谈上台后将比前任更加重视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执政后这方面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他宣称，“本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以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为根基”，“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是美国的一项首要战略原则”等等。冷战的结束尽管难以判定谁是真正的赢家，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美国朝野更加意识到向外传播美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克林顿就职演说中不无所指地说，美国最大实力就是它的思想力量。他提出了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扩大战略”，以取代冷战时期的全球“遏制战略”。这一战略在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特别予以强调，把促成国外民主与美国安全和经济发展视为同等重要，并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克林顿上述报告的“总统声明”中宣称，“民主国家不大可能威胁我们的利益，而更加有可能与我们合作，以对付安全方面的威胁，并促进持续的发展，安全的国家更加有可能维护民主结构并支持自由贸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说得更具体，“民主的传播将帮助解决所有其他的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穆拉夫契克也认为：“民主或民主运动的扩散必然有利于美国”。

克林顿在出席1994年于印尼召开的第二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发表讲话说，美国不必在人权与亚洲的贸易之间作出选择，“促进人权和民主价值也要求政府与政府之间加强联系，所以我将毫不后悔地在亚洲和全世界推动这些权利和价值。”他到雅加达后又说：“我们仍然深信，加强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能有助于砸碎专制的锁链，随着各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开放，它们在政治上也会变得更加开放”，他强调，美国在争取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背离这一事业，我们今后也不会背离这一事业。”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克林顿政府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把对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要挟亚洲一些国家，试图迫使它们接受美国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抵制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要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强其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在劳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试图以西方的标准和价值观来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将其变成干涉亚太事务的一个工具……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了美国的强权政治，也成为美国与亚洲国家发生争执的主要原因之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东亚国家确立人权和民主制度，是不希望亚洲国家强大并成为其对手。”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国《外交》季刊总编辑扎克雷采访时语气坚定地说：“告诉美国人民他们的制度存在什么问题，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的制度强加给那些无法适应这套东西的社会。”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亚洲人权问题只能由各自国家解决，西方国家国内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权对亚洲的人权问题横加指责。

从哲学与政治学意义上讲，美国的“天赋使命观”与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之后所形成的国家与民族意识更是格格不入。

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和56个民族的中国自有其强大的文化同化力和向心力。中国的文化不是外向型扩张文化，却以其“亲”、“和”及“柔”之核心将其境内的多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不仅没有异化中

华文化的核心，反而为其所同化。基于这种文化的中国外交政策历来以"和"与"安"为目标，也自以为是天下之"中央"，国家主权意识长期以来较为淡薄，但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不断欺凌。中国的现代主权意识和国家意识开始形成，并以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领土及主权完整为核心。历史及现实的外部压力使中国国家及主权意识中的反霸与反强权色彩更为浓厚，同时由于"有容乃大"的大国襟怀又使中国成为愿意接收外部各类先进文明的开放型国家。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方面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进行正常交往，另一方面又对任何有侵犯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行为极为敏感与反感。中国人民对外部势力干涉其内政的强烈反应并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特别是遭受过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天生具有的国家与主权意识。美国的"天赋使命"如要在中国完成，那所激起的将是这个东方大国整个民族的强烈抵制。

其实，美国政府的以"天赋使命观"为基础的对外政策不仅遭到中国等东亚国家的强烈反对，甚至在其国内也没有什么市场。1993年下半年，美国Times-Mirror中心进行的数次民意调查，集中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于当前国际事务的不同态度和观点。Times-Mirror中心的这项调查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内进行的一次最为广泛的外交政策民意调查。它是由1993年7月至8月对649名舆论领袖的抽样调查、9月对2000名普通成年人和10月末对1200名成年人问询所构成的，然后将三次调查综合比较得出结论。因此这项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比重和来源。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舆论领袖们的调查。从被调查者的构成中可以知道，他们是美国政府决策的主要影响力量。

其中外交界人士主要选自国务院以外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防务与安全界人士主要选自国防部以外的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众所周知，这两个机构实际上是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外交家和战略家所组成，他们的观点常常直接反映了美国政府外交和战略决策的要求；企业界人士是从《幸福》杂志上榜的1000间大企业和金融界行政首脑中选出，所谓政界人士则来自50个州的州长和8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市长，这两类人士往往是总统的后台老板或者是未来的总统，但又经常发出与华盛顿不一致的声音；学术界是由各大学校长和各主要思想库领导人的代表构成，科学界则是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学院的成员，他们代表着美国政府决策的思想来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为总统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取向；传媒界人士是由美国各大报刊、电视和广播的社论撰稿人、驻华盛顿处负责人和专栏作家所组成，由于他们对大众态度的重大影响力，可以称为"真正的舆论领导者"。此外，宗教界代表着美国各大教派，文化娱乐界则是出现在美国名人榜上的各类艺术家和文学家，这两部分人往往使政府和大众的选择上带上浓厚的感情色彩。所有这些人几乎都是成年人，2/3以上拥有较高学位，40%具有博士头衔。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中大多数人能够从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作出政策选择，从而证明了政府分歧的深刻性。

在这次测试中，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下层民众，绝大多数都改变了传统的美国外交战略目标，认为外交政策首先应当为美国的国内议程服务，而不是为了传统的国际战略概念诸如"地缘政治"、"遏制共产主义"等。这种大幅度的改变当然影响着对于具体外交政策目标的排列。无论是哪个集团，都肯定是把"加强美国经济竞争力"放在对外战略的最优先考虑的地位。这实

实际上是把外交政策从属于美国国内政策，与冷战时期大为不同。在这次调整中，美国的精英阶层对于外交政策中的传统价值观相当冷漠。在所列的11项外交政策目标中，“促进人权”所得支持率仅居第七位，“促进民主化”则居第九位。

哀钟长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天赋使命观”可以休矣！

2 .

二战结束后，乔治·凯南的“遏制苏联论”奠定了美国对苏冷战的理论基础。而90年代的今天，美国又有人制造“中国威胁论”，提出“遏制中国”，企图挑起新的冷战。

依据美国克莱蒙研究院向骏的分析，“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是奥根斯基等人提出的“权力转移论”。该理论认为当两个敌对团体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力量呈现均势时，战争的可能性便会增加。而发起战争者常为综合国力较弱又不满现状的一方。从国际社会现实分析，中国正在成为潜在的战争发起者，美国则是原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全盘泛起。

这种理论首先宣扬中国正在成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世界性大国，而且器具外侵性。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增长，美国一方面十分重视，一方面又十分担心。美国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1995年3月发表的调查报告说：1994年10月到12月调查时，美国国会、政府、企业界、报刊、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领导人中有91%认为中国今后10年将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1990年调查时，这些领导人中有73%认为“美国在中国有重大利益”，1994年调查时上升到95%；1990年调查时这些领导人中有16%认为中国发展成为世界性强国可能成为“对美国重大利益的严重威胁”，1994年调查时上升到46%。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皮尔斯伯利认为，当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在2020年超过美国时，“中国威胁”就可能成真。

制造“中国威胁论”，挑起新冷战的另一手是将中国列为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对手。由亨廷顿挑起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为此奠定了理论论据。而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5年春季号刊登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中央情报局全国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民主陷阱：冷战后世界的危险》一书的作者格雷厄姆·富勒写的一篇题为《下一个意识形态》的文章则在亨廷顿的理论基础上更进一步。他公然提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将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者。

富勒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提出：“我们生活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观念几乎毫无疑问地支配世界意识形态的明显时期。但是，由于美国寻求把它的价值观普遍应用于全球问题，西方原则目前所处的支配地位碰到了麻烦。基本的西方观念依据三项基本原则：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人权和世俗自由民主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单一民族独立国家。……既然共产主义已成为历史，世界上下一个意识形态对抗将是什么性质的呢？不大可能会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向西方提出挑战的下一个意识形态很可能是一种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的混合体。这种反对将是拒绝接受穿上西方外衣的‘现代化’以及所有随之产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混乱。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拒绝可能需要请求一个有组织的非西方国家集团提供领导。”一个可能处于领导地位的激进的国家理论将会呈现什么现象？

它很可能是深厚的历史文明的沉积、一种对本国文化的民族优越感、一种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某种延续、想当地区领袖的貌似有理的要求、或许还有过去在采取现状的理论的过程中的某些经验、以及由于西方的殖民主义使它未能实现它的文化——历史使命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受挫感的结合。在这一点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伊朗、埃及和俄罗斯。”关于中国，富勒特别指出，“中国有其幅员和人口方面的优势，有一支迅速发展的军队，另外，由于有了海外华人资本的输入，其经济已开始高速发展。今天，中国至少已经摒弃了马列主义的经济理论，在某些选定的地区搞自由市场，但是，列宁主义型的资本主义的成功可能已达到了顶点。中国对其在历史上所受的苦难记忆犹新，同时还有一种未能完成使命的感觉。它是不结盟运动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参与者，在50年代，它还把阶级斗争理论发展为贫穷的农业国与富有的工业国之间的国家斗争的理论。虽然中国显然已远远超越了比较简单的毛的意识形态阶段，但它依然极有可能成为被排斥的国家的领导的角色。使它可能扮演这个角色的有以下几种情况：不能实行政治自由化及随之而来的动荡和混乱的结果；新疆、西藏和内蒙的分裂引起恐外感并引发专横的反应；以及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说不能对付国营部门企业倒闭造成的大规模失业问题。中国现在直言不讳地反对民主化、人权和危及旧的共产党秩序的‘和平演变’等西方价值观，这也使它具备了成为这种角色的资格。”最后，富勒更加露骨地指出：“民主与自由市场的价值观将经历一个发展与修正的过程，既然是西方最先提出了这些概念，那就应该由西方——特别是美国——最新摸索修正这些价值观，这既是为了确保这些价值观能适用于尚未达到那个水平的国家，也是为了西方社会本身，这一三向趋同的过程可能会提供最佳手段，提供抗衡驱策下一个意识形态的力量的吸引力和重要性。”其实，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冷战后美国对其世界霸主地位的自卑感与自尊感同时增强。一方面，美国感到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加快，其第一超独霸的地位受到来自多方的挑战，美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自顾不暇，往日威风难以再现；另一方面由于原苏联的解体及美国今年国际经济与科技竞争力再居世界榜首，美国又想重温霸主旧梦。以此心态进行外交决策的结果必是先要寻找潜在对手，遏制其发展规模与速度，防止其对美国的一超地位构成威胁；继而全面推行新霸权主义，继续维护其霸主地位。

寻觅潜在对手的工作早在布什时期便已开始。布什在1991年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就曾指出：新时期最重要和影响深远的战略发展之一，是“日本和德国成为经济和政治领袖”，“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之间是竞争者，有些时候在经济领域甚至是激烈的竞争者”，“随着欧洲共同体走向在1992年后形成单一市场的新里程碑，我们正进入一场西方关系的革命”。布什政府时期，1992年美国国防部拟订的《1994—1995年度防务计划指导方针》内部稿中，更明确指出：苏联解体后，美国战略的一个“首要目标”和“主要考虑”是，要维护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防止重新出现过去苏联那样的新的全球和地区的竞争对手；美国要使其其他先进工业国家“不向我们的领导地位挑战，或是试图推翻已有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要保持“将德国和日本纳入美国领导下集体安全体系”的既有秩序；美国必须保持强大军事力量的“机制”，“威慑潜在的竞争者，使它们甚至不敢奢望发挥较大的地区性或全球性作用”。这个内部稿被美国报纸披露后，

在美盟国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后来，美国国防部在最后定稿时对上述段落进行删改。此后，美国官方文件竭力避免提到这些方面，但是，华盛顿决不会没有这样的战略考虑。

克林顿上台后，美国在欧洲着重依靠德国，把德国作为“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作为美国在欧洲的“领导伙伴”。美国在亚洲着重依靠日本，把美日联盟称为“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关键”。

对于俄罗斯，1993年克林顿政府还把俄罗斯与前苏联其他地区看作是“美国扩大‘市场民主制国家大家庭’，‘能起最大影响’的‘最重要例子’，要把前苏联‘变成一个有价值的外交经济伙伴的地区’”。

于是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便成了美国将要重点防范的唯一大国。因此，尽管克林顿政府不断表示不会围堵与遏制中国，而会更积极地“接触”，但无论如何，只要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进一步崛起，美国对中国政策中的冷战思维就不会告终。

对此，美国《世界政策杂志》1996年夏季号曾刊登世界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英国《卫报》驻美国分社社长马丁·沃克（他著有《冷战：历史》，一书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新霸权》。沃克在文章中对美国在中国东部沿海进行的遏制战略部署做了分析。“最初的迹象是在克林顿总统在台湾海峡部署第二个航空母舰特遣编队的同一个月显示的，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美国决心继续担任这个地区安全的主要保证人。克林顿在4月份访问东京时与日本达成的协定使1960年美日条约的战略意义大大扩大。这项新协定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将保持其在日本和亚洲的军事力量；日本将继续为此提供经费；日本将进一步帮助其盟国达到被认为是共同战略目的。在中国面临最大考验的前夕（指香港回归——作者注），东京和华盛顿共同向北京传达了这一重要信息。

尽管美国和越南恢复外交关系，美国海军舰只重新访问菲律宾以及在台湾海面上部署美国航空母舰，迄今尚未在中国周围建立遏制的机制。但是从在这个地区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做出的部署和经常不断的磋商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种预先遏制的战略。在必要时，它可能十分迅速地升级为遏制。”正因为美国以冷战思维构筑对中国的遏制攻势，才在中国国内引起对美国新霸权主义的不安与不满。1995年第33期的《瞭望》周刊曾以《冷战骑士的狂言呓语》为题发表AE 繇 f1 论指出：“在美国人当中，确实有一些冷战骑士式的人物，有一类抱有莫名片妙的种族优越感的人物，他们视中国为洪水猛兽，必欲扼死而后快。”文章预测，如果美国真的对中国围堵的话，“不仅亚洲人不会跟着走，美国的欧洲盟友以至很多美国人都都认为是一种空想。”此文一语中。美国人中确有有识之士反对搞新冷战、围堵遏制中国。

美国卡托研究所负责防务和对外政策研究的副所长特德·盖伦·卡特在《洛杉矶时报》上撰文指出，台湾不是欧洲、中国不是苏联，美国必须在对待中国威胁时谨慎。美国的安全保障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在西欧和东北亚地区。这两个地区对于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至关重要。尽管台湾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民主国家”，对美国有某种重要性，但是，台湾对于美国经济和安全的重要性与西欧和东北亚相差甚远。对北京来说，台湾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必争之物，台湾的地位牵涉到中国的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而且，中国并不认为美国会为台湾问题冒最大的风险。因此，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冷战态势，可能会使美国陷入蒙羞的退却或一场灾难。《纽约时报》刊登史蒂

文·厄兰格的文章指出，在最小程度上，美国与中国进行一场真正的冷战意味着美国军队在国外进行更多的部署，防务开支猛增；在经济和贸易方面发生重大破裂；令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爆发危机，联合国安理会更为分裂，核扩散增加，使整个世界更加危险和不可预料。《商业周刊》1996年3月4日一启发表题为《请不要对中国搞冷战》的社论说：“中国对美国深感失望。华盛顿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能履行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诺言、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威胁一人中国的政策。美国在种族、犯罪和毒平方面问题严重却在中国儿童福利院、西藏和人权问题方面大吵大闹，这种做法十分虚伪。”社论认为，美国对中国搞冷战对于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好处。“北京的领导人正拼命促进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中国就不会保持稳定。这也意味着要得到美国的市场。美国正拼命利用下个世纪可能出现的最大的经济机会。把中国排除在外意味着美国失去利润和就业机会。对美国来说，把一个现在不是敌人的国家当成敌人是愚蠢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希恩在2月18日《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写道：“在今后30天里，极起脆弱的美中关系很可能在三个对抗的压力下发生危机。”这三个对抗是知识产权、中国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和台湾选举。

文章说：“美国政府必须公开申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并且直接把这些原则告知北京的领导人。最重要的是，美国要清楚地表明，美国不是要对中国奉行江泽民所说的‘软遏制’，美国欢迎中国成为一个地区性和全球大国。”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有条件的接触政策，风险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好斗的国家。北京的领导人有充分的历史理由怀疑外国人。……对于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国来说，聪明的做法是对中国采取一种温和但又务实的原则，否则的话，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一种遏制政策，这种遏制政策不仅会带来可怕的风险和代价，而且最终可能造成中国旗命谋求实力的后果。”

3．对华政策：国内政治的筹码

记得作者在美国时，曾采访过一位美国国会研究室的高级专家，他竟批评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懂美国的政治体制，而经常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误解。作者当时便回敬道：“不是中国人不懂美国的政治，而是美国的政治家不懂国际关系，才经常闹出外交上的笑话。”的确，中国人，甚至包括许多普通百姓都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两党制的多元政治体制国家。美国总统具有很大的外交决策权，但决策过程受制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各种利益集团和宗教团体、思想库、权势集团和选民意志。对美国因国内政治体制问题而造成的外交决策混乱，对华政策难以明了等美国特殊国情，中国人是相当理解与尊重的，但中国人唯一不解的是作为美国这样一个外交大国，却经常将重大外交政策作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筹码，甚至置国际法或双边关系条约于不顾。这种为内部斗争而在国际社会经常朝三暮四的大国恐怕只有美国一家吧？中国人对美国政治更不能原谅的是，一些美国政治家视外交为儿戏，为国内政治斗争而损害中国的利益。

国会与政府的争执往往是美国政治家们打中国牌的最佳时机。1995年2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曾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国会将对华关系罩上寒气》，副题为《共和党人将把中国当作痛打克林顿的大棒》。文中说：那些记性好的人将会发现美国新国会对中国态度中的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

变化。

毕竟，在1972年首先同共产党中国建交的是一位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随后，另一位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又发展了这种关系。现在，在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上台以后，气氛已变得明显冷淡起来。

这不仅仅是因为诸如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争端——它将在下个星期达到高潮——之类的贸易纷争破坏了气氛。去年10月的国会选举把一些在中国问题上——从人权问题到核扩散和台湾问题——态度强硬的人物推上了显赫的地位。在共和党大多数看来，中国已经成了一根用来打政府的大棒。

这种喧嚣和狂怒有多少将会变成行动，现在还很难预料。但是分析家说，预言不会再沿着去年退让的方向继续发展准保没错。去年，克林顿政府同北京在导弹控制问题上达成了和解，并且决定不再在人权问题上大作文章。一个可感知的变化很可能是要求改善美台关系的强大压力，这将会激怒中国，即使实际没有多大变化。

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承认：‘国会中的权力转移肯定会影响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共和党大多数在更大的程度上倾向台湾，而不是中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参议员无疑就是这样。他因对北京的共产政权充满敌意而闻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本杰明·吉尔曼也反对克林顿政府去年作出的使人权问题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脱钩的决定，并且强烈批评中国对待西藏的态度。

阿拉斯加州参议员弗兰克·穆尔科斯基是台湾的积极支持者，他渴望看到李登辉总统今秋到安克雷奇出席美国——中华民国商务委员会会议。国务院可能发现它将处于不得不为拒绝给李发签证而进行辩解的尴尬境地。

如果真这样做，那可能会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危险的游戏确实发生了。1995年4月17日，美国政府官员还向中国信誓旦旦地说，即使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也是违反美国政府所持的“一个中国”立场的。但事隔不久，美众议院以396票对零票通过允准李登辉访美决议，参议院又以97对零票通过相同决议。美国方面忽然宣布将允许李登辉访美，并暗示这是在国会压力下同意的。一句暗示便将中美间的三个公报精神抛置脑后！

大选更是美国政治家念念不忘以中国牌换取政治资本的好时机。

1996年5月15日，美国政府以所谓“中国没有令人满意地履行1995年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为由，单方面宣布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服装和电子产品等价值30亿美元的产其实行贸易报复，关税将提高到100%，并将于30天后生效。这其中便与大选年有关。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无论是执政的民主党还是在野的共和党都力图在四年一届的大选中夺魁扬威，而在贸易问题上做文章最有助于加强政党在公众中的政治印象。因为美国国内舆论中有种倾向认为中国经贸实力的日益强大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存在形成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谁在对华政策上取强硬姿态，谁就会在大选中得分占优。美国政党由于国内选举的特殊需要，使得国内朝野在对华报复问题上奉行了更强硬的政策取向。

其实因美国国内斗争受损的又何止是中国呢？美国政治家为国内政治而在对华政策上大放厥辞，其后却得自己收场，真可谓“自作自受”。

1993年10月日本《读卖新闻》记者曾就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对华外交政策变化采访了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部长塞斯。塞斯认为竞选

期间，克林顿对中国采取了严厉的态度，但从当选总统以后的言行来看，他已发现同中国的交往方式并不那么简单，“总统已经理解到，通过实现现代化而变得富裕起来的中国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他的言论与行动往往是不一致的。他提出要举行美中首脑会谈，谋求改善美中关系，但他却又让国务卿出面讲，如果在人权问题上得不到改善，就不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克林顿政权内部存在着不同方向的政策，在没有得到统一的情况下彼此迎头相撞。对于这种情况，中国理应感到困惑。”时隔不到一年，多尔也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据1996年4月19日美国《商业日报》题为《多尔在中国问题上左右为难》的文章分析，自从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成为一个问题以来，多尔曾一直坚定不移地主张延长最惠国待遇。但是现在多尔的助手私下说，这可是一个能使他在政治上获胜的问题。他们建议他对延长最惠国待遇附加一些条件，如改善人权状况，或停止与核有关的出口。

但“一个作为少数派的领袖而领导了国会中的反对取消最惠国待遇的人所表示出的这种说教者的态度，是不会使人信以为真的。选举人有理由对参议员多尔的对外政策提出疑问，而且在他说他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创造高薪就业机会时，选民们也不会当真。对参议员多尔来说，在一个影响如此不好、争议如此之大的问题上同总统分道扬镳，肯定是很有诱惑力的。给任性而自大的中国一记响亮的耳光，会使许多议员和许多普通美国人感到痛快。但是，这种快感是短暂的，而它的后果在未来几年将给这个国家造成伤害。”

第九章 前景：携手共进 21 世纪

美国和中国，作为太平洋两岸隔洋相望的两个大国——一个是最大的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具有雄厚的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两国都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两个国家人民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两个民族——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在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及其伟大的人民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相处，没有任何理由走向对抗。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美关系的性质不仅直接影响两国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利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友好相处不仅将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进步，而两国之间任何不负责任的对抗，不仅是两国的不幸，而且将给整个地区带来危机与灾难。如何尽快走出对华政策的误区，避免本来可以避免的战略性失误？如何克服导致中美关系非正常化的种种人为障碍，理智地而不是盲目地引导两国人民走向充满希望的 21 世纪？这是一切对本国人民的命运前途和人类的福祉与进步有责任感的政治家不能不再三深思并作出果断回答的严肃课题。

1.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

中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曾经是遏止东西方冷战演变为世界性核浩劫的重要因素之一。

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处于全球性的尖锐对抗之中，中国也面临前苏联全面武装入侵的现实危险。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使毛泽东与尼克松于70年代初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中美两国在经历了20余年的对立之后开始走上相互关系正常化的发展道路，这是冷战时人类所能作出的最明智最重要的抉择之一。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和战略力量对比。中国作为世界战略三角中的一角，在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由此扭转了越南战争以来在战略上日益陷于苏攻美守的被动局面。世界性的反对前苏联的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由此初步形成。这一战略变化有力地遏制了前苏联霸权主义野心的恶性膨胀，使40余年来时刻高悬于人类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终于未能落下，人类终于得以幸免于全球核战争的惨祸。这一战略变化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预示了苏联霸权主义盛极而衰的必然趋势。今天回顾这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战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冷战的结束正是从中美关系的建立开始的。

前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冷战的结束是否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历史使命的完结？中美昔日共同面临的前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不复存在是否就意味着中美关系战略基础的消失？美国在世界上第一超独霸地位的形成是否就意味着美国从此可以毫无顾忌地粗暴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在美国政治圈内，的确有些人就是这样想的。某些人之所以一再叫嚷要“遏制”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冷战结束了，苏联威胁不存在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基础消失了，美国再也用不着中国了，对于美国来说中美关系已经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了，因此美国可以随意挥舞大棒“制裁”、“遏制”中国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

且不论这种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市侩哲学是否有政治道德上的缺陷，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以实用主义为特色的美国政治的惯常做法而不必大惊小怪；然而，果真冷战后中美关系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基础与战略价值吗？只要睁眼看一下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就可以看出所谓“中美关系战略基础消失论”“中美关系价值下降论”是毫无根据的，是极其短视的。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残酷现实是，虽然表面上美国赢得了冷战，但在冷战中美国已经元气大伤。

冷战的结束，不但没有立即给美国带来色彩斑斓的美国梦，反而使美国陷入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战略矛盾之中。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目前的美国正面临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和1900年之后的大英帝国同样的处境，即由于从历史上继承了大量难以履行的战略义务，它的强国地位正面临着两大考验：一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如何克服过度的战略目标与有限的战略手段之间的矛盾；二是在经济发展领域如何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制止其国际竞争力日益下滑的趋势。能否迎接这两大历史性挑战，避免重蹈历史上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等由盛而衰的复辙，一方面需要美国做出痛苦的战略抉择，放弃无限膨胀的帝国野心，改变“帝国战线过长”和“战略目标过大”的状况，同时也离不开国际相关因素的有效配合。在这里，中国作为正在兴起的亚太地区大国和战略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关系的性质将直接影响美国未来的战略发展趋势和国家的兴衰成败。中国在冷战后美国战略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战略基

础不是消失了，而是更加广泛了。

就经济战略而言，中国是未来可能给日益衰退的美国经济带来活力的最有潜力的新兴市场。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冷战时期，在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全面对抗中，美国不仅借机在政治上把欧洲、日本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在经济上把欧洲、日本变成了美国一家独占的特殊领地。美国视欧洲、日本市场几乎等同美国的国内市场。

对美国充分开放的商品市场、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高气质的人才资源对美国经济的成长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然而，冷战后，随着苏联崩溃、华约解体，美国在政治上失去继续控制欧洲、日本的依据，在经济上也失去了独霸这块风水宝地的凭借。欧洲、日本不再处于对美国的经济依附与从属地位，对美筑起了贸易壁垒，使美丧失了传统的经济势力范围，而且以其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代替美苏军事对抗对美构成了强有力经济挑战。一个时期以来仅美日之间的经济战就十分激烈。电视机制造业，日本进军美国，导致美国国内电视机工业全军覆没，目前美国销售的彩电几乎都是17家外国公司在美就地制造的。90年代初美国国内彩电市场规模超过每年2000万台，其中1/3为日本产品。在汽车制造业，日本不仅后来居上打破美国70余年独占鳌头的优势地位，成为世界汽车业第一巨头，而且抢占美国市场，把美汽车业逼到了墙角。1991年日本对美出口各种汽车207.6万辆，而同年日本进口美国车3万辆，除去1.4万辆系日本企业返销车，纯美国车仅1.6万辆，还不及日本对美出口的一个零头。有人曾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停车场和比肯大街沿街出租汽车站做过统计，在停放的177辆汽车中，日本车94辆，占50.1%，美国车52辆，占29.3%。在金融业，日本银行囊括了世界10家最大的银行。外国银行在美国的银行总资产占14的比份，其中大部分掌握在日本金融机构手中，在A向美国旗业发放的贷款中，20%是日本银行资本。1991年日本海外资产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其中海外净资产余额为3830亿美元，成为世界首富。1989年日本三菱财团购买了象征美国财富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1989年9月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高价买下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舆论界称之为“买走了美国的灵魂”，甚至有人称“日本要把整个美国买下”，把美国变成日本的“经济殖民地”。美国第50州夏威夷已经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旅游季节，饭店房客一半是日本人，全州110万人口中，1/4是日裔。檀香山的高级住宅纷纷易主，转卖在日本人名下。1991年12月1日，“珍珠港事件”50周年前夕，《纽约日报》发表题为《重新开战》的社论称：“一场争夺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战争已经酝酿了多年”。“这一次不会有空中偷袭，也不会有战舰和神风队飞行员。日美之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在镶有木质护壁的会议室里展开的，由于紧张激动、贪婪和恐惧而加剧的经济政策之政。”“美国在所有的大小冲突中都输了。”美国国会一份题为《日本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的内部文件称：“美国正在进行着两个正面的世界战争——对苏联的军事斗争和对日本的经济与技术斗争。”然而，对苏军事斗争似已告一段落，而对日本的经济与技术斗争刚刚拉开帷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美国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1980年美仅有762亿美元的政府预算赤字，到里根政府结束时的1989年，累积达1.3382万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目前，财政赤字已突破5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0%，人均2万美元，为世界各国政府赤字之冠。这一数字比美

国建国200多年间累积政府赤字的总和还要多。1981年时，美国还是拥有1400多亿美元对外债权的世界最大债权国。到1987年底，美国对外负债累积高达4000亿美元。目前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日本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竞争能力委员会1991年3月20日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在已统计的92项关键技术中，美国在显示材料、计算机存储芯片等15项技术落后于日本等国，在另外18个领域的技术也处于弱势。1990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55美元，比美国高出2997美元，是美国的1.14倍，而德国劳动生产率直逼美国水平。美国所拥有的市场份额也正在迅速缩小。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已经丧失。与此相联系，美国社会日益陷入各种危机之中，极大地抑制和困扰着美国的行为能力。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93年出版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列举了冷战后美国国内日趋严重的20大难题：1. 债台高筑；2. 贸易赤字；3. 低储蓄和投资；4. 缺乏工业竞争力；5. 生产率增长速度低；6. 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数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障，预期寿命低于日欧，而婴儿死亡率却高于日欧；7. 低质量的中等教育，大约2300万成人不能应付与日常生活有关的表格、文件；8. 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和城市衰败现象；9. 贪婪的富有阶级，最富有的1/5的人占总收入的46.5%，最穷的1/5的人只占总收入的3.8%；10. 爱打官司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世界律师的1/3在美国；11. 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1/3的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三个黑人青年就有一个在服刑；12. 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美国个人拥有的枪支比大多数国家军队还要多，美国杀人率高居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榜首；13. 大规模吸毒现象的蔓延；14. 社会上绝望情绪在内部滋生；15. 过度的性自由；16. 视觉媒体大规模传播道德败坏之世风；17. 公民意识下降，难再需求公民为民族、国家作任何形式的服务或牺牲；18. 制造分裂的多元文化抬头，多民族的美国日益巴尔干化；19. 政治制度出现上下脱节现象，政府高高在上，不负责和腐败；20. 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布热津斯基指出：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经济摩擦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以及西方国家将纵欲无度的生活方式灌输到自由民主的政治内涵中，得不到一点控制，这可能使西方政治观点的全球重要性丧失殆尽。1993年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问题专家爱德华·路特维克在《处于危险中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沦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及如何赢得确保经济优势的地缘经济斗争》一书中指出，美国患了一种严重的“自创症”，如巨大的预算赤字、金融市场的失控、面临崩溃的公共教育系统、失败的社会福利计划、吸毒和犯罪猖獗、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等等，都属于“自创症”的范畴，正是这种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治愈的“自创症”使美国一步步走向衰落，沦为新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政治学者大卫·卡里略甚至断言：由于经济竞争力的下降，美国“相对的衰落正在转化为绝对的衰落”。1994年底出版的美国政治学者凯文·菲利普斯所著《傲慢的首都：华盛顿、华尔街和美国政治的挫折》一书则进而从政治文化方面揭示了由于道德沦丧、文化堕落而导致美国衰落的趋势。书中写道：“华盛顿夸夸其谈而又傲慢无礼，它正在毁灭这个国家。华盛顿就像一个没落帝国的寄生的首都，正在步历史上已经衰落

的国都，如罗马、马德里和伦敦之流的后尘。”尽管人们对美国经济、社会、文化走向衰落的程度和速度估计不尽相同，但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趋势本身则是不争的事实。面对美国制度性的顽症，自然没有一付简单的起死回生的妙药。但目前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给美国注入活力的希望看来只能寄于“打开中国大市场”和吸取东方文化的营养。在当前世界市场几乎被瓜分完毕的今天，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尚在成长中的有潜力的一块大市场。中美之间密切的战略经济关系对于舒缓美国目前日益趋紧的经济难题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2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大约是美国人人口的5倍，是西方国家人口总和的两倍。

经过改革开放18年来的努力，中国已为21世纪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基础。从1979—199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3倍，平均年增长速度达9.8%，按照当年底人民币汇率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世界第10位。199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367.3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16.5%。外商在华实际投资到1995年9月累计已达1054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已达800亿美元。据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即使是低增长，中国也将在今后10年中以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面貌出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达5万亿美元。《中国商报》估计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不管采取何种方式，21世纪以前中国都会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1994年中国的劳动力是6.15亿，人均收入可望在2000年以前上升到6000美元。改革开放18年中，中国消费品市场扩大了12.7倍，消费品零售总额年递增率平均达到17.2%。1991—1995年，中国居民消费水起起均每年增长8.6%，进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9.5%，到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将达到4000亿美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具有难以估量的潜力。据世界银行估计，今后10年中国仅基础设施建设即需7500亿美元的资金。仅电讯一项，中国计划在今后10年内安装上亿条电话线，而这才不过是刚刚开始满足其庞大需要的一个零头。哪怕只是少量打入中国市场，也将会给美国创造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就业机会和丰厚的利润。美国麦当劳高级副总裁斯塔曼最近谈到为什么要向中国发展时说，只要有1。”10的中国人买得起大号麦当劳汉堡包，就是1亿顾客，足够500家连锁店卖的了。德籍华裔学者喻钟烈先生指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第一次在世界平面上置身于难得的机遇。世界商业中心的行程从15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经英国伦敦、美国纽约，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历时500年后正在敲响中国的门户。历时200年的国际分工变迁的历史行程也正在从西向东，从欧美老牌的工业国向远东新兴工业国转移。中国将随着世界商业中心与国际分工两个历史行程的东来，而掀起第二次影响巨大的东方“文艺复兴”，出现空前的经济繁荣。这一发展前景对任何贸易伙伴来说都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正如纽约投资分析家克莱门托女士最近所指出的：“任何经济大国如果想在贸易自由地区实现繁荣都不能忽视中国。”美国如果想制止日益衰落的趋势是不能错过这趟东方快车的。美国国会研究部1996年6月发表的一份专题报告表明，自1980年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以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急剧上升，已从当年的48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573亿美元，尽管从绝对贸易额看，中国还是美国较小的出口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以21%

的年增长率递增。199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达1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5%，比1990年增长144%。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还是中国的第三大投资者。1979年至1995年，美对中国的实际投资金额为107亿美元，占外资在华直接投资总额的7.8%。其中76亿美元是1993年至1995年期间投入的，而1995年一年新增的直接投资为31亿美元。自1990年以来，美国年投资额已增长了620%。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确认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有利可图。这些数据表明1993年的起均收益率为9.6%，制造业领域的收益率从1992年的9.1%上升到1993年20.8%。美中商业理事会称：中美之间的“这种商业关系给两国带来了重要的收益。美国公司面临国内和欧洲的老化市场，需要进入中国市场以求增长和保持全球竞争能力。中国需要美国所能提供的经验、技术和市场。美国的消费者受惠于中国廉价商品。”中美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美经济关系是一种互补和互利型的，而不是竞争型的，更不是美日间的那种对抗型的和争霸型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正面效应，而不是负面效应。中国经济愈繁荣，中美之间经济交流的规模与空间也就愈大；美国对华投资与贸易的市场愈加广阔，中国吸收和容纳美国资金和商品的潜力愈大，双方经济合作的层次与气质就愈高。随着双方经济关系的有序化与法制化，双方经济交流的渠道将更加通畅和安全。这对中美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而不只是有益于那一方的单行道。至于中美之间目前存在的贸易逆差问题，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美洲银行集团执行副总裁张之秀（Julia Chang Block）等许多经济专家都公正地指出：造成这一逆差的重要原因是美国错误的经济政策压制了美国的出口。美国对中国长期保持“经济制裁”，人为地妨碍了中美之间的正常经济活动，限制了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规模与层次。同时美国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也增加了中方对美国公司作为长期供货人是否可靠的疑虑。其次，据布鲁金斯学会报告，美中双边贸易的逆差至少被夸大了40%，因为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没有顾及美国公司出售给香港的产品有一半最终又出口到中国，美国从中国购买的产品有2。”3要通过香港企业家之手。第三，这一逆差中有很大部分是因为美国将其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部分进口算在了中国大陆的头上。随着香港和台湾公司将疲劳动为密集型生产转入中国大陆，美国与香港和台湾的逆差在1987年至1992年间减少了约13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和中国的逆差则增长了155亿美元。实际上是香港和台湾将其顺差转嫁给了中国。考虑到上述因素，中美之间的所谓贸易逆差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它完全在正常值范围之内。只要美国放弃错误的经济政策，这一逆差自然就会很快消失。何况在资本灵活流动和全球贸易时代，简单地计算双边贸易逆差已没有多少意义，反而容易导致误解。

就安全领域而言，中国是美国处理地区安全问题，维护亚太地区和其的特定的不可缺少的伙伴。冷战后，虽然苏联的威胁解除了，但美国长期面临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冷战后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动荡、更加不确定的世界，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而又难以预测。遍布世界各地的地区冲突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全球两极对抗的压力制约下的大量民族、宗教、领土和经济紧张形势随着冷战构成的强制力的解除而爆发出来。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如美国前国防部部长阿斯平所指出的，冷战

后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有以下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一元威胁为多元威胁所替代；二是威胁的程度由危及“美国的生存”，变为“危及美国利益”；三是威胁的地区由欧洲为中心扩散到世界各地；四是威胁由“公开”变得更隐蔽，由明确变得日益模糊；五是核武器的战略使用的威胁将被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所代替；六是美国面临的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为地区性政治军事力量的挑战所代替。在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先后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和《国防报告》也都认为，冷战后美国面临着若干新的安全挑战：一是新的核危险。一方面，世界上依然存在数以千计的核弹头和战略投射系统，即使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生效，俄罗斯仍将维持一个有3500枚战略核弹头的核武库。另一方面特别麻烦的是上述武器及有关材料有可能被偷盗或由存在着第三者获取的可能。目前除5个公开的核国家外，15个国家拥有弹道导弹，不出10年，拥有这种武器系统的国家将多达20多个。核武器恐怖使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二是地区冲突。地区不稳定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挑战，除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外，许多被严峻的冷战关系掩盖的对立大量涌现。古老的宗教、民族与领土争端的复活，与苏联解体而导致的当代紧张局势相结合，日益呈现一个更为广泛的威胁。

冷战后美国的安全与其他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日益紧密相连，如果亚洲或欧洲出现动荡，对贸易造成重大破坏，将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如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都与进出口有关，那些过去并非是美国安全关注中心的潜在问题在新的环境下，可能成为美国不得不关注的焦点。第三是跨国威胁。日益增强的全球相互依存性使每一个国家更易于受到不断增加的跨国威胁的危害，如国际贩毒、难民逃亡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由于这些威胁具有跨国性质，仅靠某一个国家是无法应付的。

亚太地区是美国重大地区安全利益之所在。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许多紧迫的安全问题和最有希望的商业机会”。随着美国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亚太地区在美国安全结构中的地位日渐突出。尽管亚洲昔日不是东西方冷战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不处在世界宗教的主要重迭带和不同经济水平的民族的主要结合部，两极体制崩溃没有在亚太地区引起像欧洲那样大的主体震荡，但冷战后在欧洲引起动荡的基本因素在亚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太平洋并不是“太平无事”的洋。特别是以下趋势不容忽视：一是核技术、核武器在亚太地区日益扩散的趋势。在中亚，哈萨克斯坦上千枚核弹头及其失控的可能性日益引仆人们的关注。

在东北亚，日本拥有发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足够能力，据专家估计，未来5年内日本可储存5—10吨钚，如果需要一年内即可实现核武装。朝鲜半岛的核风波至今尚未平息。在南亚，印度不仅储存了足以制造50枚核弹以上的武器级钚，而且成功地试射了射程为2500公里的“烈火式”中程弹道导弹。在西亚，除以色列已拥有核能力以外，伊朗、伊拉克也极力寻求掌握核技术。此外，台湾当局从1966年开始核研究，据报道目前已有生产核武器的技术能力。二是增加军事开支，增加军事科研和武器进口投入，不断扩充军备的趋势。80年代以来，日本军费急剧上升，目前已突破500亿美元，成为亚洲头号军事大国和世界第二军事大国。韩国、东盟国家军费都有较大增长。亚太国家武器装备进口已超过素有“军火库”之称的中东。在世界进口武器最多的15个国家中，亚太国家就占了7个。其中印度、日本和阿富汗是世界5个头号武器进口国中的3个。三是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

日益激化的趋势。在领土归属方面，不仅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纷争，而且有两极格局崩溃带来的新问题。日本与俄罗斯围绕千岛群岛的争执，日本与韩国之间的竹岛之争，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立，印度对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9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公然侵吞，印尼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领土争端，日本对中国钓鱼岛事实上的占领，中国南沙群岛被多国瓜分的局面，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对阿姆河地区的领土要求等等，都可能成为危机爆发点。在海洋权益方面，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各濒海国在海域划界领海开发上的主张互相交叉、互相重叠、互相对立的问题日益突出，也随时可能导致局势紧张化。四是宗教矛盾和民族冲突日益扩散的趋势。伊斯兰世界涉及40多个国家10多亿人口，其中80%在亚洲，西亚和南亚是伊斯兰两大中心。伊斯兰势力与其他势力的冲突，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传播，都给亚太地区的稳定带来重要影响。五是经济领域的摩擦日益上升的趋势。日本已对美在亚太地区的经济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美国中央情报局题为《日本2000年》的报告称“对美国来说，目前正面临着2000年前独立战争时一样的危险。日本经济正威胁着美国的生活方式。”美日经济冲突的恶化将成为影响亚太安全形势的一大隐忧。

战后40余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安全取决于美苏关系的性质，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性质。当中美处于敌对状态时，亚太地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当两国关系处于建设性的正常状态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就能从总体上得到保障。战后美国在亚洲进行的两场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在中美对抗时启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亚太地区就没有和平与稳定可言。而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20余年中，尽管亚太地区发生过一些局部动荡，但总体上看，基本保持了和平与稳定的局面。如果说冷战时期，在两极对峙下，美国苏联两个国际警察还能勉强靠核恐怖维持冷战共处的局面，那么在冷战后，面对上述如此复杂的形势，美国要想单枪骑马地充当国际警察，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只能是一种神话。1996年7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部长付立民在有关亚太局势的研讨会上指出：中国的力量和重要性越来越不可小觑，越来越多的议题，必须靠中美合作方能处理。越来越多的问题必须靠中国出面才能解决。例如：一、亚洲权力均势的转变，日本在区域安全中的角色以及俄罗斯在2010年重新崛起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二、如何减低朝鲜半岛、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波斯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三、中美如何合作使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发挥效用？在中国同意中美合作之下，美国领导联军在波斯湾行动，中国参加的联合国在柬埔寨的和平任务，无往不利；但中国掣肘，联合国和平部队在海地的任务就成效不彰。这是一项警讯：国际制度若没有中美合作就发挥不了作用。四、在高科技输出的国际管制上，没有北京合作，也难以处理。五、导弹技术、核武器技术、化学武器的转移如无中国的合作与参与，就谈不上控制。六、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贸易组织如无美国的参与无法发挥效力，将来中国成为最大经济体后，世贸组织无中国合作，无作用可言。七、全球与区域环境问题，也需要中美合作——同管理。1994年10月18日美国防部部长访问中国国防大学时发表的题为“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和平的影响”中谈到有四大原因证明中、美两国安全关系的重要性。第一是战略上的原因。中、美位于太平洋两岸，两国的面积、人口、丰富的

资源和人民的创造性精神使美、中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美中两国在经济和安全上发挥着共同的积极的作用。第二个原因是中美有许多一致的利益。中、美都认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两国的经济发展可以互补支持两国合作的量不断增长。第三个原因是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危险。中、美两国必须密切合作和积极参加，否则就不能建立起全球不扩散体系。第四个原因，美、中都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国家，因此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地区威胁。没有中、美在各方面的合作，就无法对付新时期的各种挑战。中、美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影响力，每一方都必须适当地使用这些影响力。维持地区稳定是中美合作的任务，这也是中美发展关系的战略基础。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1996年7月23日在演讲中指出“中美双方都需要评估双边关系，努力避免升高敌意。冲突无益于区域安定。摆在面前的基本现实是：中美合作则可两利，美国是中国科技革新的重要源头，也是约束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有效因素；中国对区域平衡有一定和有用的影响力，它对印度、俄罗斯有平衡作用，对维护中亚国家的独立亦有作用。”“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是美国全面区域安全政策的两大擎柱之一，它既可确保亚洲成功的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又能保持稳定的区域和平。”“没有任何人怀疑，如果没有世界核俱乐部五大成员之一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拥有12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国的参与，没有中国的有效合作与战略协同，美国在亚太地区将寸步难行。中美关系在建设亚太地区冷战后新的和平结构和保持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其中的重要作用和战略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与以往相比，中美关系在冷战后的战略环境中，其战略基础更加广泛。建立在这种新的战略基础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更现实、更理智、更稳定、更持久和更具有生命力的平等互利关系。

2. 遏制中国：白日梦

尽管冷战后中美关系有着巨大的战略价值，尽管保持和发展健康的中美关系不仅对双方有利，对整个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美国有少数政治家对此却故意视而不见。他们死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他们的脚虽已跨出了冷战门槛，但他们的身子和头部却仍然留在了冷战大门后。苏联解体之初，他们曾一度希望发生连锁反应，希望中国也会步苏联后尘很快分崩离析。在这一希望落空后，他们又以所谓“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谎言为依据抛出了“遏制中国”的种种谬论。

1992年美中传统基金会在《政策研究》秋季号刊登题为《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危险来自中国》一文，声称中国将对美国的经济和当前利益构成威胁。这似乎是美国诬指中国为威胁的第一声喇叭。在一片渲染“中国威胁”的噪音中克林顿政府就建立“亚太安全机制”问题致函东盟各国，不惜推波助澜四处宣称“中国已有取代前苏联在亚洲构成主要安全威胁的迹象”。公然在国际上推销其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使这股浊浪日益高涨。

政府吹喇叭，极右势力立即跟上。

1995年7月31日一个名叫克劳萨默的专栏作家，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的反华文章，歇斯底里地鼓吹“遏制”乃至“颠覆”中国，这位专靠摇唇鼓舌吃饭的极右文人在文章中说道：“如今的中国更像是个旧式独裁专制国家而不是执行救世主似的任务，它一心追求权势。它更像是19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对于它所处的欧洲

大陆来说是太大和太强了。"因此他叫嚣整个西方应该像当年召开维也纳会议，结成"神圣同盟"，遏制法国一样，也结成侵华十字军遏制中国。他声称遏制并不是进行冷战干涉。遏制是几个世纪以前就有的一项强权政治原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建议建立遏制一个联盟体系旨在遏制咄咄逼人的法国。当代，大西洋联盟曾经遏制侵略成性的苏联。在这两个时期之间，西方未能遏制住崛起的德国，其结果是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在这个21世纪新兴的大国身上出现。"这位先生在扬言遏制中国后似乎言犹未尽，他继续说"仅仅中国还是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金里奇无法明确鼓吹的事情，即颠覆侵略成性的独裁专制政权。"如果说克劳萨默歇斯底里的叫嚣还只是一介书生的空论，那么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麦凯恩这里，就开始扎扎实实地付诸行动了。这位曾在河内度过5年半战俘生活的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人，伙同参议院另外两个曾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积极策划提出一项议案，敦促政府尽快抛弃在美国历史上的"那个可怖时刻产生的长期敌意和怨恨"，遏制给予越南以正式的外交承认。麦凯恩先生180°大转弯，并不是对当年越南战争的悔悟，也不是出于对中南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关心，而完全是出于利用越南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他直言不讳地说道："美国和越南有共同的利益，即遏制中国的霸权。让经济上有活力和稳定的越南强大起来，达到可以抵制其北方强大邻国的地步，这绝对是符合我国的安全利益的。"麦凯恩先生还想象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有朝一日再次回到金兰湾，这一次是作为河内遏制中国的盟友而不是作为敌人回到金兰湾的。

1996年4月，克林顿风尘仆仆的飞到日本，与日本共同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声明"，结成了以应付冷战后"远东不测事态"为核心的新的军事同盟。还是那位克劳萨默先生闻讯激动不已。对于克林顿政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他的主张付诸实施，他情不自禁地高呼"克林顿的东京之行会作为一个重大的开端载入史册"。他一语道破天机。指出"不言而喻，美日的重新结盟就是针对中国的。"他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写道："尽管美国在军事上有能力单独对付亚洲的任何侵略者，但在心理上它没有这种能力。如果日本在发生冲突时采取旁观态度——例如台湾——那么将来的任何一位总统都将很难获得渡过难关所需的国内支持。"现在可好了，美日重新结盟"向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向中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日本终于准备考虑太平洋地区与美国间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了。""这是重要的新闻"。"新的对日本政策分清了敌友。它开始把日本作为与美国一起监督太平洋地区的伙伴——虽然小伙伴，但最终成了伙伴。最重要的是，它为迎接21世纪的重大挑战——遏制中国奠定了基础。"1996年5月2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题为《结束同中国的冷战》的社论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华盛顿"接二连三地对北京表示愤怒和进行威胁"，在这场大合唱中"国会中共和党强硬派、经济民族主义分子、自由的人权鼓动分子以及昔日的冷战分子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正在发展的反华运动的核心。"对冷战后美国某些人掀起的这场"遏制中国"运动的荒谬的理论依据、卑劣的政治伎俩、虚妄的历史逻辑以及种种自欺其人的谎言，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一一作出评论，对于克林顿政府匆匆与日本重新结成军事同盟以及与越南恢复外交关系，其真实的战略意图也最好留待克林顿先生自己去披露，至于那位把90年代的中国与30年代的德国荒谬地相类比的克劳萨默先生浅薄的历史知识也不值得一评。我们只想提醒的

是：在当今世界，这场反历史、反时代、反理性的遏制中国运动到底行不行得通？这到底是一场维护美中利益的“圣战”，还是一场害人又害己的恶作剧？摆在它面前的到底是一条光明大道，还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客观地讲，在美国，并不是人人都盲目附和这场遏制中国的闹剧的。就在克劳萨默、麦凯恩之流狂热地叫嚣要遏制中国时，当年曾经跟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基辛格博士就无情地指出：“在当前情况下遏制中国的政策只不过是一场白日梦。”1996年3月31日基辛格博士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两党中极力要使美国走上一条同这个人口最多、可能成为亚洲最强国的国家发生冲突的那些人应当考虑一下后果。如果同中国敌对将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永久的方面，那样我们就找不到盟友了。正如美国的声誉曾经随着对中国开放而日益提高一样，到那时，大多数亚洲国家将会指责美国挑起了一场人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同北京的冷战。”“那些念念不忘美苏冷战时代的人必须记住这样一点：北京不是莫斯科。如果美国同中国对抗，中国将唤醒亚洲的民族主义，并使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成为一个争论问题。它还会争取同日本以及欧洲和西半球的其他工业国实行经济合作，而所有那些国家也都求之不得地要抓住我们可能放弃的机会。”“早在1959年，中国在政治上毫无选择的时候，它就同苏联人决裂过，而且这种冷淡关系持续了30多年。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它今天还会为它的自尊付出必要的代价，而且会长期坚持这样做。”在另一次谈话中，基辛格博士还指出：“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的战略是要阻止在欧亚地区出现一个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大国。那么，我再说，没有力量能阻挡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美国如果想遏制中国，这将超出美国的能力，耗尽美国的财富。而且也没有国家站在我们这边。”基辛格博士作为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它的认识是深刻的。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主任，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在1995年11月21日的一次研讨会上检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指出：“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考虑曾有分裂中国的战略、对华‘遏制’战略、对华‘接触’战略及新近的‘全面接触’，这些战略考虑在某种程度上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具有致命缺陷。‘分裂中国’的战略是危险的，幸而该战略已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逐渐被忘却。对中国国内政策目标和实际国力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对华‘遏制’战略。对华遏制战略的目的在于控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扩大影响，迟滞中国向大国发展的速度。对华遏制战略将迫使美国面对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敌对的中国。此外，在此战略的施行上，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台湾、越南在内，不会有一个亚洲国家或地区政府与美国站在一起，从而导致第二次冷战。”哈丁作为一个学者，分析问题无疑比许多政客坦率得多，客观得多。

1996年《华盛顿季刊》春季号发表的戴维·香博先生的文章，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指出遏制政策的严重后果。文章说道：“同中国的合作是关键，因为对抗态度往好里说会使北京成为凶猛的对手，往坏里说会使北京成为敌人。如果美国把中国当作对手，中国就会成为对手。美国再也不能把对华政策建立在有缺陷的遏制上。那种遏制在冷战期间遭到了可悲的失败，使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丧失了10万多条性命，也使美国一代人丧失了商业和文化上进行有利接触的机会。今天，这样一种受误导的政策可能由于缺少资金和美国在亚欧的盟国和伙伴都不会跟着美国走而夭折。”“中国并不谋求同美国对抗，但如果这就是华盛顿所追求的，中国随时准备给予回报。

因此，美国和中国必须在各方面（包括人民解放军）并在多种论坛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以便解决双方之间的所有难以解决的问题。否则，误解会迅速加深，华盛顿和北京总有一天会很快觉醒而发现他们自己陷入双方都不想、不需要、也受不了的敌对关系中。”美国现任国防部部长佩里也曾经多次指出：“总是试图遏制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发展中的经济巨人是危险的。”1996年2月2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俱乐部和硅谷世界论坛上佩里发表讲话指出：美国为数不少的人认为，美国不应与中国进行接触，而应像冷战时期对苏联那样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日益发展的中国对美国无疑是一个威胁，因而确认我们必须处处与中国作对。佩里认为“上述观点是有缺陷的。

从实践角度来看，它行不通，因为遏制政策可能会实际破坏我们自己的安全。一个感到受美国遏制政策包围的中国完全不可能在美国重大的安全目标上与其合作，而且遏制实际上还可能为美国制造安全难题。此外，它还可能促使中国加快国防现代化，继而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增加在台湾、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和朝鲜半岛等地区热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遏制政策还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相互关闭市场，使我们旨在敦促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开放而不是关闭其市场的努力受挫。最后，遏制政策只会引其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中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倡议采取条件反射性的、而且是我们难以应付的反对态度。遏制论点从哲学上讲也有缺陷。它假定接触就等于姑息，这是完全错误的。接触并非姑息。接触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其所不赞同的政策和行动如人权等问题采取默许的态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孤立中国。你不可能孤立一个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佩里在这里完全是从维护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尽管他把中国国防现代化与地区军备竞赛、地区紧张局势武断地扯在一起，尽管他们没有放弃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作为政府官员，佩里比起那些头脑发胀的极端冷战分子，还是较为冷静的。

显然，时代发展了，90年代不同于50年代，今天一个开放的、进步的、理性的中国也不同于昔日与美争霸的苏联，更不同于昔日制造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遏制中国不仅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认识。但愿某些死硬分子能早点从白日梦中清醒，但愿美国政府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与这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彻底决裂。

3. 面向21世纪的战略抉择

历史即将走完它在20世纪的全部行程，跨入21世纪。20世纪是人类文明大有进步、科技和生产力大放异彩的世纪，也是战乱频仍、很不安全的世纪。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为祸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冷战对峙，经历了无计其数的其他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

20世纪的中美关系，既有过友好的交往，也有过不幸的对抗。5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曾经相互支持，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为维护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陈纳德将军（Clairel Chennault）领导的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在中印缅战区对日作战的业绩；不会忘记美国空军开辟由印度经喜马拉雅山到中国的“驼峰”运输线，向中国运送军用物资的艰苦的“驼峰”飞行；不会忘记史迪威将军、戴维斯、谢伟思、范宣德（John Vincent）

等美国友人和美军赴延安观察团——“迪克西使团”(Dixie,原指美国战时南部各州)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客观评价与道义支持;不会忘记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对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长期的友好感情;不会忘记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助手基辛格博士以战略家的远见和平力,毅然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揭开两个伟大民族交往史上的新篇章。不会忘记多年来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过贡献的美国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专家学者和一切友好人士。美利坚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美国人民是善良的人民,即使是在中美处于对抗的日子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也未曾中断。

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八国联军”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列强对中国首都北京的武装占领的国耻中开始蹒跚而行的。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结束了屈辱的历史,正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振兴中华民族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奋进。改革开放18年来,中国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伟大变革。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一个崭新模式。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已经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第一、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开放格局。各国旗业家和投资者越来越看好中国的市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正在出现新的局面。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促进了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得到健全和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和其他社会事业都有了很大进步。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生机勃勃的局面。中国社会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产业模式以至人们的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正在和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国社会已进入了全面的转型期。一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向以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所有制结构由以往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企业由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分配方式由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供给制方式,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政府经济管理方式也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二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第三产业急剧扩张,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到1/3。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等第四产业也呈现异军突起之势。三是生活方式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实现,人民生活的数量水平与质量水平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四是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化,中国法律体系日益完善,公民法制意识日益增强,法律已成为人们维护正当权益,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公正的主要手段,社会日益法制化、有序化。五是价值观念向现实性、多元化方向转化。“左”的僵化思想被摒弃,官本位受到冲击,自立、自尊、自强、守信等意识增强。

六是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型社会转化。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向深度发展,把中国与世界、沿海与内陆、乡村与城市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变使古老的中国焕发了空前的生机和活力,使中国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使社会资源配置得以进一步优化,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成为世界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再生，进一步奠定了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旗等友好交往的基础。中国的开放、繁荣、稳定与强大不仅是中国的福音，也是世界的福音，对美国无疑也是有利的。

一个开放的中国而不是封闭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地球日益变小，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很难脱离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单独发展。任何一国的繁荣都离不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美国也不例外。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离开了中国的参与，无论如何也是残缺不全的，不可能具有真正的世界性。中国作为最大的东方发展中国家与美国这个最大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开放，更具有特别的意义。中美两国从相互开放和相互交流中，可以实现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相互借鉴，两大市场的相互交融，两大资源的相互补充与流通。如果美国硬要推行所谓的"遏制"政策，千方百计拒中国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社会之外，迫使中国不得不再次关闭已经打开的大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美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从中国关闭的大门里，美国除了得到相互对立、相互猜疑、相互防范之外，不可能获得任何益处。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具有自给自足传统的中国将有比美国大得多的生存能力。因此，受遏制政策之害最大的不一定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

一个繁荣的中国而不是贫穷落后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不可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基础之上的。竭泽而渔的原始积累方式早已不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性质。如果美国动不动就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动不动就要取消最惠国待遇，力图阻滞中国的发展，以致中国民族经济长期得不到有力的振兴，那么美国也不可能获得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和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只有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中国。只有中国发展了，美国才会有一个可靠的贸易伙伴。

中国经济发展愈快，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规模、互惠程度就愈大，对美国就愈有利。一个12亿人口的中国如果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2亿人吃饭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等基本的生存条件的解决就会成为一个严重困扰世界的难题和沉重的包袱。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亚太地区未来经济起飞的重要发动机，没有中国经济的繁荣，整个亚太地区的繁荣就是一句空话，所谓"亚太世纪"也永远不可能到来，美国日益倚重的亚太地区经济利益也将不可避免地因之走向萎缩，从而使美国业已呈现的衰落趋势更加严重。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展望21世纪论坛"的贵宾演讲会中，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就指出："到2020年，一个拥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美国四分之一的繁荣的中国，只会比一个拥有13亿人口、贫穷和不稳定的国家对世界更有利。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增长将为西方提供机会，经济上和战略上都会取得更好的全球平衡。"西方一些人散布中国的崛起会使世界秩序变得不稳定的论调是毫无根据的。

一个稳定的中国而不是动乱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动乱将是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动乱，整个亚太地区就不可能安宁。而中国的稳定就保证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稳定和亚洲近半数人口的稳定。一旦中国动乱，亚太地区没有哪一个国家经受得其中中国动乱潮的冲击。不要说大规模内战，即使是局部的骚乱带来的消极影响也足以打乱亚太地区的正常秩序。美

国有些人迄今还在支持台湾某些分裂主义势力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还不愿意停止对中国西藏的干涉，还在收罗培养反政府的“精英”，总希望给中国找点麻烦，制造点动乱，直至看到中国的解体。不要说这是对中国的粗暴干涉，就是对美国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而言也是背道而驰的。1995年11月俄国学者雅科夫列夫在《远东问题》上撰文指出：“巩固中国国内的稳定，实际上等于为巩固东亚的和平与安全作贡献。

因此，在中国制造混乱的任何做法，不管是内部势力还是外部势力，不管有多么‘崇高’的愿望，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段论述是中肯的。

一个强大的中国而不是衰弱的中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近百年来中国之所以屡遭列强侵略和平侮蹂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国力太弱，在当今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世界里，大而国力弱小的中国必将成为大大小小的强权主义者争夺瓜分的猎物，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诱因。一个虚弱的难以自保的中国不可能对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一个大国本应作出的贡献。中国只有具备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综合实力和足以覆盖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的防卫能力，才能慑止和防范对中国可能的侵略，才能有效制止任何分裂活动，有效地维护国家的安全，才能有足够信心从容处理亚太安全事务，在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戴维·香博最近指出的：“中国的领土和国家安全对亚洲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不受外国威胁或胁迫的中国能充分自卫，也能保护其合法的主权，这对亚洲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都有好处”。中国的强大根本不会对美国 and 任何人构成威胁，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并行不悖的。

作为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对于发展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友好关系历来是积极的，并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从美国建国初就开始了。近年不少学者研究认为是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今日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早经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中国移民的后裔。1784年即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的第二年，广州人民曾热情欢迎了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的到来，揭开了近代中美友好交往的第一章。19世纪中叶，30万中国移民曾对美国中西部的早期开发、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过巨大贡献。当年加州的矿工有半数以上是华工，他们把先进的淘金技术带到这里，仅1848年到1883年，就生产了价值12亿美元的黄金，占有全美黄金产量的三分之二。在加州占农业工人75%的华工，披荆斩棘，使550万英亩榛莽荒原变为肥沃的农田，连美国参议院的报告都承认“没有华工，就没有西部的垦殖”，“是华工”使整个加利福尼亚变成一座花园，“给他们”带来了牛油和面包。”历史学家凯里·麦克威廉也指出“如若没有华工在加州的贡献，那么从种植小麦到改种水果的这一转变肯定要推迟四分之一世纪。”历史学家贝蒂·李·宋（Betty Lee Sung）也认为是“勤劳其实，吃苦耐劳的中国移民拯救了西部亿万英亩肥沃的农田和无数城镇。”在被称为“19世纪工程史上最伟大的一项成就”的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的修筑中，浸透着四、五万中国筑路工人的血汗，其中1万多人为之献出了生命。他们奋战在荒无人迹的崇山峻岭，风餐露宿，打隧道、炸山洞、架桥梁，仅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至少需要14年才能完成的艰巨工程。1865年10月10日中央太平洋铁路首任董事长、加州共和党州长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在致约翰逊总统的报告中说华工“作为一个类型，他们其实、和平、忍耐、勤

劳、节俭……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全国性工程的西段。"今天在美国内华达州的维吉尼亚市，一座纪念碑上用中英文两种文字镌刻着这样一段碑文：“华人先驱，功彰绩伟，开矿筑路，青史名垂。”这段话概括了一百多年前中国移民在美国经济开发中立下的历史功勋。今天在美国的一百多万中国移民已成为美国社会最富建设性与创造性的力量。

在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担任教授、研究员，在各大公司担任工程师的华人数以万计，在他们中间有世界一流的学者、专家、科学家，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以其东方人特有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献身第二故乡，推动着美国现代社会的进步，也推动着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成为密切中美关系的天然纽带和桥梁。美国学者梅克昂（Ruthanne Lum Mccunn）在其《美国华人史》中指出：“美国的中国人在一个2.2亿人的国家里，人数不到100万，然而他们持续了130多年的影响和作出的贡献对美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0年代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友好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经贸交流规模日益扩大，军事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中国学者、学生赴美留学达十万之众。中美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已经和正在继续造福于两国人民，深刻影响着两国历史发展成为两国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自中美正式建交以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惜中美之间的友好情谊，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没有说过一句有伤美国人民感情的话。对于维护和发展中美友好关系，中国方面从来不存在任何障碍。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的波折完全是美国一手造成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的单方面的新冷战政策的直接后果。中美关系的波折是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1979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万斯曾经说过：“美中关系如不设法迈进，就会向后倒退，倒退将给美国在全球的地位造成严重的损害。”这句话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在当前新旧世纪的交接点上，如何维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如何避免中美关系的倒退和两国战略利益的损害，如何把一个健康的成熟的中美关系带进21世纪，这是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要克服中美之间的障碍，抵制破坏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有赖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需要美国的某些政治家以对两国人民和人类命运前途的高度责任感，放弃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尽快走出对华政策的种种误区，这里至少要尽快走出以下几个误区：第一个是尽快放弃冷战思维。冷战思维是一种非理性思维，是拿人类的命运和前途当赌注的对抗性思维。过去40年，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人类战争走到了核毁灭的边缘。如今旧的冷战虽然结束了，但美国有些人依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方式。苏联这个昔日的对手解体了，他们却要千方百计搜索和人为地制造一个新的敌手，旧的意识形态阵营性对抗不复存在了，他们却要继续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和以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异同区分敌友。这显然是违背时代精神的。在当今世界，各国人民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坚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权利。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传统不同，不可能削足适履，采用一个模式，同迈一样大小的步子。国与国的交往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仅要

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和地区的整体利益。要充分认识冷战后各国利益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性和各国安全的整体性。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不一定没有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同样存在友好相处的共同的利益基础。不要做把国家根本利益放在一边而从事意识形态战争的蠢事。要尊重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不能强迫别的国家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中国不要求美国实行中国的多党合作制，也不要求把美国国会改成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美国也无须强行推销美国的政治制度。即使这些制度在美国有它的可行性，如果硬要把它机械地移植到中国来除了造成空前的混乱，不会有任何好处。现代中国从来没有按某个外国的预想发展过，像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是不可能受某个外国或外来因素支配的。

即使某些外国管理经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要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造，并要有恰当的时机才被吸收。何况美国及西方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对大多数人来说正在失去其吸引力。美国不要以为自己的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都坏。谁优谁劣，谁汰谁存，可以让历史去作出检验，让人民自己去作出选择，这并不妨碍人民之间友好相处。至于美国一再提出的所谓人权问题，这也不应成为遏制中国的借口和干涉中国的工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都免不了有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中国有，美国更多。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对这些现象采取什么态度。中国政府对社会生活中一些侵犯人权的现象历来是坚决反对的。

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逐步改善之中。无论如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人权状况比旧中国好；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权状况比改革开放以前的要好。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中国人权状况还会继续好转。中美两国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本国人民的人权上，而不要放着自家事情不管，乌鸦落在猪背上，只见别人黑，专去挑别人的毛病，专管别人的闲事。另外不要把对那些危害国家和侵犯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的依法惩处与侵犯人权混为一谈。世界各国的法律包括美国的法律对这类活动都是明文禁止的。

美国一些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往往忘记了这个界限，这只能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 12 亿人民人权的改善，而是另有其他目的。中国人权的根本改善有赖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如果 12 亿人民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来人权可言？如果美国真心诚意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就应该少些经济制裁，多些互惠互利的交流，少拿人权作棍子打人，多坐下来进行平等的友善的讨论，并提供合理的可行的建设性意见。

第二个是尽快放弃霸权心态。时代发展了世界进步了，以往那种恃强凌弱，以大压小，以富压迫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早已行不通了。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一律平等。不要以为自己的原子弹比别人的大，自己多几条航空母舰就可以颐指迫使，仗势仆人，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冷战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美国更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应该对国际事务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以超级大国的实力为资本，充当世界的封建家长，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整谁就整谁。要知道强权并不等于公理，实力再强，也不会自然带来威信。无数历史事实已证明，以实力称王称霸蛮横无理，迟早要变成孤家寡人。大国要尊重小国，富国要帮助穷国，

强国要爱护弱国，有事大家一起商量，平等相待，以理服人，这样才能促进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在国际事务中历来以君子之交待人。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国际准则的倡导者和忠实实践者，在强权面前不卑，在弱者面前不亢。中国不欺负任何人，也绝不会对别人的欺侮屈服。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淫，这就是中国的行为准则。美国在和中國打交道时，要记住有三条禁律：第一条是中國的主权不容侵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受列强侵略和平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从1842年8月29日的《中英南京条约》到1948年11月14日的《中美航海条约》，中国与外国政府先后签订1175项条约，其中与英、法、美、日、德、俄签订862项，占全部条约的75%，这些条约绝大部分带有强权、奴役、欺凌的不平等性质。中国主权任人践踏，国家利益毫无保障。中国人民为结束这一屈辱历史，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中国人民对于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格外珍惜。任何人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将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正因为如此，对于“台湾独立”等分裂活动，中国没有退让的余地。如果美国有人想让中国吞下分裂的苦果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不会再出第二个李鸿章！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即使中美关系大倒退，即使中国被迫放下经济建设，中国也不会拿主权作交易。基辛格博士曾在1996年3月3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中正确指出：“每一个观察中国局势的人都确信，中国对于它认为是其领土的地盘，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捍卫，决不会放弃。”第二条中国的民族尊严不容侮辱。中国不承认世界民族有什么优等、劣等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每个民族都有权利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如果自诩为高等民族，对别人指手划脚，中国是不会买帐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有过辉煌盛世，也有过百年的磨难，但中华民族始终自强不息，以自己的不屈精神，开拓奋进，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愿意团结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而决不会容忍百年民族屈辱史的重演。任何人如果企图羞辱中华民族，奴役中华民族，他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已经振兴起来的12亿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壮志和决心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第三条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各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只能由各国自己去管。这是对一个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起码尊重，这也是最基本的国际法准则。任何人要想凭借强权对中国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中国是绝不会听之任之的。中国没有支持夏威夷或阿拉斯加闹独立，没有把中国军舰开到切萨皮克湾去炫耀武力，没有给当年内战中的南部联邦提供武器，也没有因为白人警察毒打美洲移民，严重侵犯人权而对美国实施制裁，也没有专门搜罗和豢养以颠覆美国政府为宗旨的任何“不同政见”人士；恰恰相反，是美国把航空母舰开到了台湾海峡。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了西藏叛乱，直到现在美国议会还不断通过一个又一个有关西藏的议案，是美国借口人权问题要中断两国互惠的最惠国待遇，是美国至今还在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准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美关系，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这种干涉行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

第三个需要尽快放弃的是极端的自恋主义。要正视世界多样化的现实。多元化的美国要接受多元化的世界。色有七种，构成多彩的世界；音有七声，奏出和谐乐章。各国情况不同，但不妨碍大家在同一个地球上互相借鉴，

取长补短，和睦相处，共同负责地建设一个有利于各国发展的良好环境。如果硬要将自己所偏爱的单一模式强加于人，只会人为地破坏社会政治生态平衡。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美国似乎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东方文化，理解深刻内涵。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之一，有她的优点与长处。而东方文化历数千年而不衰，证明她有着特殊的魅力与生命力。东方文化强调整体精神，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在天人和谐、物我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群体和谐中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对我们今天建立和平与稳定的亚太地区秩序有着深刻的启示。只有深刻理解东方文化，才能实现东西方的沟通。在不久前的一次调查中，美国国会有50%以上的议员承认自己并不了解中国。以这种大面积对中国的无知状态，怎么能设想他们能制定出正确的对华政策呢？美国《商业周刊》曾经指出：“华盛顿未能与中国建立起致力于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长期战略关系，其结果也许最终成为我们时代对外政策的悲剧。”1995年11月美国和平问题研究所所长理查德·所罗门也指出：“1989年至今，美国国内政治中延续着一种批评和丑化中国的普遍倾向。本人自70年代起曾20余次访问中国，中国国内当前的主流是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按现在的速度，中国必将成为一个既有合作价值又具有威慑力量的强大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停止批评和丑化，以免丧失与北京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机会。”40年代由于美国推行错误的对华政策曾使美国第一次被赶出中国大陆，并引发了“谁失去中国”的激烈辩论。今天如果美国某些政治家不迅速停止对中国的新冷战，那么美国将面临再次失去中国的危险，这一次美国失去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中国，而是12亿中国人民的人心。

在规划21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时候，美国领导人听一听基辛格博士的忠告是有益的。基辛格博士说：“美国政府应当重新信守其实行一个中国政策的默契”，并要做到：“1. 不再把对外政策作为一种取悦国内一些互不相容的选区的手段；2. 寻找并公开承认同北京之间的某种共同利益；3. 进行认真的对话来使这种共同利益具有生命力。”基辛格强调，舍此没有其他选择。美国报刊说“如果再次失去了中国，那就应当归因于那些更喜欢树敌而不愿彼此交谈的人。”1995年10月23日江泽民主席在美国——中国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六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发表题为《步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中美关系》的演讲时指出：5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曾经相互支持，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为维护世界和平，拯救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20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努力，毅然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揭开了两个伟大民族交往史上的新篇章。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美两国，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俱伤。中美关系出现停滞或倒退，都是两国人民不愿意看到的。正确的选择是，从两国关系的实际出发，放眼全球，面向21世纪，努力扩大共同点，排除干扰，克服困难，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这样才能造福于两国人民，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如果美国决策者希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不妨把这段话引为座右铭。

-----本书第四、五、九章由彭谦执笔，第二、六、八章由杨明杰执笔，第一、三、七章由徐德任执笔。

